



史文
料卫





我和张令德书记在瓦井搞“四清”

肖文奎 李志国 *

1965年八月份我被抽调参观了瓦井村的四清工作队。共22人，队长姓杨，叫什么记不清了，指导员方留碧，副队长王礼奇、刘廷洋（区委宣传部）。

刘廷洋同志分管生产，我归刘廷洋同志直接领导，不久，廷洋同志调走，我接替了他的工作。

为了把“四清”工作搞好，中共房山区委副书记张令德同志到瓦井村蹲点指导“四清”工作，他对工作队提出了六点要求：

一、四清工作要以中共中央“二十三”条关于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精神（简称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认真贯彻执行，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大体分三个阶段、五个步骤进行：一、准备阶段；二、四清阶段；三、建设阶段。做好动员准备，全面“四清”，对敌斗争，后期建设；抓革命，促生产。

二、要坚持实事求是，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意见和问

* 肖文奎：原周口店镇农机站站长

* 李志国：原宁夏宁光光电工厂经营支部书记



题，调查研究，抓主要矛盾，突出重点，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

三、要坚持教育，团结 95%以上的干部群众，以挽救干部为目的，严防逼、供、信。

四、四清工作、农业生产两不误，防止顾此失彼。

五、要从细、从严、从全，搞好“四清”，“四清”工作，最终要符合中共中央文件精神。

六、通过“四清”运动，推动农业生产，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粮食产量要增加。

“四清”工作队党支部按照这六项要求，以中共中央“23条”为原则，在市、县委和社教团的精神基础上，认真按这六项要求进行工作。

张令德书记非常关心农业生产。农业生产中的一些重要环节他都亲自过问，并做一些具体指示。我由于分管农业生产，接触书记的时间比较多，加上我在工作中认真按照他的指示去做，我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平时他总叫我“小肖”，我听了感到非常亲切，书记的言行，我受到了很大启发，得到了很大提高，有几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能说也能做

荀子说：“能说能做是国宝，不会说会做的是国家的人才，会说不做的是国家的工具；说的好听，做的丑恶是国家的妖孽。”张令德书记既会说又能做，真是我们党的一位好干部。瓦井村



的村民不论是年轻的，还是上了年纪的，对张令德书记的评价是“嘴一份，手一份”，能说也能做，不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他嘴怎么说就怎么做，从来不只说不做。1966 年春天严重干旱，春播作物和小麦返青受到严重影响，有两个生产队严重缺水，按照他的要求，这两个生产队经过社员讨论各打一眼大口井，开发水源，缓解旱情。

打大口井就是用人工挖，直径 3 米，挖到能供一台 4 寸以上水泵抽水为止。施工的全过程要经过黄土层、沙土层、红粘土层、河卵石层和岩石层，既要打眼放炮，又要称盘，是一项技术性强，危险性大的工程。由于我当时分管生产，每天夜里要到这两口井的工地检查安全工作，有时还要和他们一起干活。一次我在第四生产队的井下干活时，不慎扭了腰，需要休息几天，五天没去工地，我很着急，非常不放心打井的安全，第六天我还没痊愈，就赶紧去工地检查，当我到工地时，打井的社员告诉我：“张书记每天夜里十点钟以后，都有人陪他来工地检查，有时还和我们一起干活，给我们讲抗日战争的故事，一干就是大半夜。”我听了后非常受感动，他的行动感动了社员，都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来回报书记的关怀。一位叫陈怀玉的社员感动地说：“张书记这么大官，管这么多事，岁数这么大，还这么关心我们的安全 and 生产，我们如果没有点实际行动，真是说不过去，一点儿良心都没有了。我们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最安全的生产来回报书记的关怀。”我听了后立即找到书记表示：“我已痊愈，请您不要再去打井工地啦！”



书记见我的诚意，笑着对我说：“我不去可以，但你必须注意身体，否则，我会不高兴的！”我听了书记的简单两句话，一股暖流在我周身循环，我挺起胸膛对书记说：“保证没问题，请书记放心。”

这件事社员们受到了极大鼓舞，干劲倍增，他们自觉地缩短了休息时间，每班的复核运转由六个小时提高到七个小时，每天三个班增加了三个小时的有效运转。由于社员的干劲增加，加快了打井速度，原计划两个月完成的大口井，仅用一个半月就完成了，及时缓解了旱情，使小麦顺利地渡过了返青关，春播作物按时进行了播种。这两个队的水浇面积增加了 500 亩，提高了粮食产量。

他与群众心连心

“四清”工作队根据上级坚持“三同”的精神，工作队员在哪个生产队，就在哪个队的社员家吃派饭，通过吃派饭加深干群之间的感情，了解群众对干部的意见和对大队的建议。张令德书记也不例外，他每天都由大队的派饭员给派饭，只是不固定在一个队。第二生产队一户社员家庭人口多，劳力少，生活比较困难，家里卫生条件比较差，派饭员一直没往他家派饭，致使这户社员背上了思想包袱，非常希望能往他家派饭，书记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对派饭员耐心地做了思想工作，他对派饭员说：“干部到社员家吃派饭，是继承发扬党的群众路线优良



传统，是联系群众的有效方法，不是吃好吃赖的问题，挑挑拣拣的派饭是最脱离群众的，是一种特殊化的表现，一定要加以克服，否则，群众对我们要有意见，我们就要脱离群众。”他指示派饭员派他到这户吃派饭，他连续三天在这户吃派饭，这户社员深受感动地说：“几年来都没往我家派过饭，今天，张书记破了这个不合理的规矩，书记没把我们抛弃，我一定要热爱集体、维护集体！”他向领导提出了农业生产的管理、农田基本建设等建设性的意见十几条，为提高粮食生产，增加社员投入起到了重要作用。书记风趣地说：“拉锯就有锯末。”

重要的决策，宏伟的工程

瓦井村有近 30%的丘陵和山坡地，祖祖辈辈全靠老天爷掌握命运，因为此地下没有水源，群众叫它“累死老龙王，烫死蝎虎子，十年九旱八不收的累债地。”张书记根据这些情况，他带领大队干部、贫协干部、社员代表到现场进行了实地考察，商量对策。经过反复讨论，他集中大家的正确意见，果断地做出了“东水西调”的决策。即，在村东河滩打大口井，将水渠修到“西岗子”根，再用泵将水扬到岗上进行灌溉。水渠长 1300 多米，高挖低垫，最深挖下 1.5 米，最低垫起 1.2 米，全部工程挖土方 15000 多方，垫土 1.2 万多方。

在开工的动员会上，张书记到场向社员做了动员。他启发大家说：“愚公能移山，我们是新社会的建设者，为什么不能



修渠、打井、改造自然。”他接着说：“老龙王算个啥，我们的双手能战天斗地，老天爷想让咱们旱，我们就不信这一套，有我们勤劳的双手，有我们的智慧，有党的领导，什么困难都难不倒我们，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动员后，他拿起一把尖镐，为这项工程破土开工招下第一镐。

施工中他经常到工地和社员一起劳动，一次由于开展劳动竞赛，社员谁也没注意书记什么时候来工地和几个中年社员一起装筐。只见他满脸流着汗，用手一把一把地往下抹，我赶忙过去递给他毛巾，示意他擦汗，我刚要跟他说话，他把手指放在嘴边，向我“嘘”了一声，意思是别让我出声。我懂他的意思，没敢出声。他一直跟社员干了两个多小时才离开工地。待他走后，我把书记在工地劳务的事告诉大家，大家受到了极大鼓舞，都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来回报领导的关怀。50多岁的社员刘申和年轻小伙子一般一配地干，他说：“书记管那么多事，还到工地和我们一起干活，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干呀！”第二生产队长史玉珍农历十月天气，他只穿秋衣秋裤，在工地上，哪里危险，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哪里的活累，他就出现在哪里。在他的带动下，该队每天都超额完成任务。

干部的行动，激发了社员们的干劲和热情，社员们你追我赶，大干加巧干，经过三个多月的奋战，一条东西 1300 多米长的水渠，提前 20 天完成了任务，终于使西岗子这个“旱高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田。



关心爱护群众贵在真心

张令德书记经常对我们讲：“群众是强大的后盾、是水，干部是鱼；群众是土壤，干部是种子，没有群众事事都不好办。因此，我们必须时刻关心群众，爱护群众，视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我们是人民的公仆。伟大导师列宁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要防止国家工作人员由人民公仆变成欺压人民的老爷。’”一次他去县里开会，路遇一位本村李姓社员得了急病，家属十分着急，他立即叫司机停下车来，拉着这位社员去医院看病，对司机说：“看病如救火，一刻都不能误，我走回村就行了，顺便看看地里的庄稼。”司机很受教育，立即把病人扶上车去了医院。他却大步流星地走了几里路回村，感动的病人和家属热泪盈眶。病人得到了及时治疗，几天后恢复了健康，回到了生产队，逢人便说书记关心病人的事，一时成了瓦井村一大新闻。不少社员感慨地说：“旧社会时国民党的官害百姓，如今共产党的官爱百姓。”此事一直在全村传为佳话。

几件看起来不是很大的事，但它的影响面是很广的，对干部和群众教育是很深的，作用是很大的。此事虽已过去 50 多年了，不仅在我的记忆里，在瓦井的百姓心中也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张令德书记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崇高品德和精神，却永远印在我心里，他那颗共产党员的真心和矫健的身影经常涌现在我的眼前。

肖文奎（口述）

李志国（整理）



难忘的二十年

李秀琴*

1962年我从房山师范毕业后，分配到当时的崇各庄公社（乡）当小学教师，直到1983年调到城关学区，在那里工作了二十一年，可以说，我几乎走遍了崇各庄学区的各个学校。对那里的教育情况至今记忆犹新，我根据记忆把其整理出来。

教师工作全日制

教师工作人员实行的是延续多年的住校制，除家住本村的以外，教师都要住在学校，只有星期六下午放学以后才能回家。教师们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除中午休息一会儿，全天都在工作。早晨八点上课前是一个小时的学习或备课，八点以后到中午是满满当当的四节课，下午五六点钟放学后还是上课。晚饭后睡觉前是二个小时的备课、判作业或学习，一天从早到晚不得闲，是地地道道的全日制。

* 李秀琴：高级小学教师 已退休



星期六、日不得闲

在这期间我国实行的是六天工作制，只有星期日是休息日。实际上，对那里的不少教师来说，星期六和星期日比平时还要紧张，星期六下午本该休息回家了，但学区和学校往往又要开会或搞一些其它活动，让人该走走不了。那时这个公社从北京城里分来一大批女教师，当地教师有的离家也比较远，在六七十年代崇各庄还没有像样的柏油路，走的都是砂石路和土路，不通公共汽车。家住北京在崇各庄水库以北工作的老师，星期六回家先要走十来里的土路到云岗去坐 39 路汽车。家住北京在水库南工作的老师，要走十来里的土路到良乡去坐一小时一趟的长途车，或再走五六里到良乡火车站去乘市郊火车回北京。到了北京还不知要倒几趟车才能到家。其路上的辛苦可想而知。在果各庄学校上班家住通县的一个女老师更是辛苦，她要先和回北京的老师一样，步行十几里到良乡，再从良乡乘长途汽车或坐火车到北京，再从北京倒几次车到通县，再从通县坐汽车回农村的家。每次回家都累得她难以表达。家住房山本地的老师不少也不那么容易，如果各庄学校有一个家住长沟的老师，学校到家相距六七十里，好天气回家要跑二三个小时，遇上刮风、下雨、下雪那罪就受大了。

就是这样，很多老师星期六受了很大辛苦到了家，星期日上午抓紧处理积攒了一个星期的家务，有的处理完，有的处理



不完，星期日下午又要受同样的辛苦按相反的路程走同样的距离赶回学校。很明显星期六、星期日比平日还要紧张。

我自己的情况是：我家住四 0 一附近的公主坟村，我工作的学校是水库边的焦各庄学校，相距十里地左右，但 1962 年分到焦各庄，1965 年我才买了自行车。在这三年中我都是步行回家又步行回学校，但那时我倒没感到辛苦。

假期实行农忙制

现在，老师们每年有一两个月的暑假，近一个月的寒假，但那时教师们根本享受不到这么长的假期。在这期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段时间，根本不放暑假，而是改为农忙假，寒假只放一二十天，麦假放十天左右，秋假放二十天左右。老师放假期间不能回家休息，而是带学生或自己到生产队参加义务劳动，到农民家吃派饭，每天交一斤粮票和五角钱饭费，叫接受贫下中农在教育。这期间，我爱人在外地工作，我是应该有探亲假的，但有时请不下假，有时要限制天数。

学生上课复式制

这期间，有关部门对农村学生实行就近上学，每个村子都有学生，因为不少村子小学生少，一个年级没有几个人，就两个年级或几个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由一个老师教，这叫复式



制，一节课一个老师给一个年级讲完，再给另一个年级讲，不上课的学生就做作业或做其他的事情，只要不捣乱就行。当时、崇各庄公社除豆各庄、果各庄、大苑村、焦各庄等一些较大村子外，都是实行复式制教学。这种复式制，一个老师要教二个或几个年级的学生，比教一个年级多付出几倍的劳动。学生听课的时间也比较少，更严重的是，曾有一个时期，实行中学不出村，中学、小学在一个学校上课。老师从小学到中学的课程都要教。我本身是小学老师，有一段时间也交上了中学，好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的时间不是很长，很快，小学和中学就分开了。

以校为家，子女跟学

实行教师住校制，一个星期老师要六天住在学校。这种情况本身就把老师固定在学校，形成了以校为家的情况，实际情况是，当时老师有的有家有的就没有家，而是把学校当成了家。比如，我在豆各庄学校时和我一起的一个女老师，带着女儿和我一起在学校吃住，其女儿也在这个学校上学，她爱人在中学工作，吃住在中学，二人只有在星期六别的老师回家了有了地方才住在一起。我在果各庄学校时，我带着我女儿吃住在学校，还有一个女老师也是带着女儿吃住在学校。还有一个男老师带着他儿子吃住在学校。我在西庄户小学时，更是带着我女儿吃住在学校，我的爱人在外地工作，探亲回来也是和我和女儿住在学校。所以，以校为家，当时是一个比较多的现象。因为以



校为家，子女跟着父母在学校吃住，跟着父母在学校上学也就成了很自然的现象。

学生上学自行制

那时，学生由于就近上学，低年级都是本村上学，从一年级开始，学生上下学都是自己走，不用家长接送。就是年龄稍大，需要到邻村较高年级上学，上下学也都是学生自己走，不用大人接送，就是冬季天短，早晨上学天还没亮，下午下学天已黑了下來，学生也是自己走或结伴走，我在西庄户上班时，女儿和我一起生活，四五年级时，到果各庄小学上学，两村相距二里地，她也是自己走或和同学结伴走，就是夏秋要过很深的庄稼地，冬季要摸黑，她也是如此。有时冬天刮大风，下大雪，夏天下大雨，我也没接送过，我得上班教学生。



曾经辉煌的石山中学

高锋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年来，房山区的教育与各项事业一样日新月异突飞猛进。记忆中曾经辉煌的母校石山中学，像阳光下一滴水珠，折射出祖国滚滚向前的脚步。

突兀而起

1958年9月，良乡公社南上岗的村南旷野上，三间坐北朝南青砖红瓦的平房突兀而起，孤零零的，被附近村民称为“小庙”，这就是石山中学初建时唯一的教室。

这三间“红顶小庙”，是第一届的师生一起，搬砖和泥、帮助公社派来的瓦木工师傅盖起来的。与此同时，在“红顶小庙”西北百米外，打了一眼水井。水井南面五六十米处挖了两个坑、用棍棒苇席围起来做男女小厕所。此外，再没有其它附属设施，大跃进的年代、大跃进的速度，也是大跃进的产物。

石山中学隶属石山小学校，学校因石山坡得名。凸起耸立

* 高锋霜：北京市华龙总公司退休



的石山坡，坐落在良乡城西六七里的一马平川上。方圆十几亩，北侧是三四丈高的绝壁，向南漫坡而下，坡南是石山村、村东南是石山小学。

石山小学校建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是一所 1—6 年級的完全小学，当时有教职工近二十人，校长高文通，中共党员。学校行政、党团关系都隶属房山县教育局下设的良乡学区，学区校部设正副校长，统管学区中小学各项工作，学区办公处在良乡镇小学校里。

当时小学生源来自周边三个公社的十几个村子，即良乡公社的南上岗、太平庄、东阎村、黄辛庄、詹庄、安庄、固村、杨井；崇各庄公社的大马村、小马村；大紫草坞公社的大紫草坞、小紫草坞、张庄、前阎村、后阎村、公主坟等。此前，石山小学毕业生要读初中，只能考取良乡中学。一所中学满足不了周边的多所小学，录取分数线很高。又因路途远，一般农民家庭承担不起食宿费用，小学毕业生大都放弃升学回乡务农。石山中学的建立，满足了普及初中教育的要求，解决了石山小学毕业生就近升学的大问题。

第一批分配来石山中学四位教师，二男一女是市内高中和师范应届毕业生。一位青年女教师，是由别的学校调入的。

石山中学的“红顶小庙”，位于石山小学东南二里许，征用购买的是南上岗村的耕地。中学开学后设置有语文、代数、物理、地理、历史、政治，还有体育、音乐等课程，全部由四位教师分担，每人任教一门主课外，还要教一两门副课。石山



小学教导主任不负责中学的工作，课程表由中学的四位教师自行安排。教具除了粉笔满足供应，没有任何教学挂图和仪器，全部教学内容只靠口头讲解和板书。

石山小学的宿舍有限，只把两位女老师安排在学校住宿，两位男教师借住在南上岗村的民房里，回石山小学的伙房吃饭。校里校外都是土坯房，条件很差。四个人白天在“红顶小庙”教课，晚上借用南上岗村一间民房备课、写教案、批改作业。没有通电，用煤油灯，每晚把鼻、眼熏得黑黑的，直到 1964 年，用电问题才得到解决。冬天自己生煤火炉子，还要指导学生在教室生炉火，每天晚上灭掉、次日早晨生起来。

1958 年 9 月的第一届学生，按照年龄分为大小两个班。解放初为方便劳动人民子女读书，允许超龄学生入学，因而有的学生比任教老师还大一些。年龄较大的三十来个学生编为（一）班，正常入学年龄的四十来个学生编为（二）班。当时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开学后两个班都是“半农半读”，轮番在“红顶小庙”里上课，每班半天，不来上课的就在生产队或学校里参加劳动。

第一学期，师生们协助民工，在“红顶小庙”东面盖起两间坐东朝西的土坯平房，使得两个班都有了教室。人数少的（一）班在新盖的两间平房，人数多的（二）班在“红顶小庙”。接着，组织学生把教室北面一片三百多平米的黄土地，平整为简陋的操场，安装了篮球架。



1959年暑假后，第二届两个班学生入学，又组织他们和第一届学一起，配合协助瓦木工人，在与“红顶小庙”并列的西侧，盖起三间的青砖红瓦的教室，即学校的第三座教室。同时，在操场西北角盖了三间坐西朝东的砖瓦平房，做为教师备课室。

又分配来二男二女四位教师，都是市内高中、师范的应届毕业生。女教师人数多了，石山小学已容纳不下，便和男教师一样去南上岗村借住民房。那位从外校调入的女教师此后常年病休，其他七位教师分别担任两届四个班的课程。小学校长只是原则性领导，中学教育、教学的大事小情，均由教师自觉主动承担。中学、小学每天下午放学时间不一样，中学教师下课后回到小学伙房时，已经没有了晚饭，只得饿着肚子去周边村子零售店买饼干充饥。后来，经领导同意，借备课室南山墙搭建了一间做饭棚子，雇佣了一临时工为教师做饭，并负责上下课的摇铃。

第二届的两个班，（三）班（四）班，每班四十人左右，年龄差距比上一届缩小，但也有学生与教师同龄。两个班，（三）班在南上岗村借用了三间民房做教室，（四）班使用新增加的第三座教室。这两个班与第一届两个班一样，仍然“半农半读”，半天上课半天劳动。

举步维艰

1960年暑假，上级派来教导主任，委派县教育局财务科



一干部兼任会计。并陆续分配、调入了三四位大专、中师文化的教师。

教导主任张广茂时年 27 岁，党员，作为“调干”由保定师范学校毕业。学区领导明确，他到任后石山小学校长不再过问中学事务，张广茂主任代行校长职责。

第三届学生除了来自石山小学的两个毕业班，另外还有良乡公社顾村小学的一个毕业班，三个班混编成两个班，即（五）班（六）班，各四十多人。开学时，固村小学的学生，以过往刺猬河有困难为由，不愿来石山中学，要求去良乡中学。至 9 月 1 日开学时，仍有詹庄、安庄、杨井、固村等村八九个学生没有报到。经学校多次动员、家访，有的教师甚至做出许诺，保证该生能考入高中，他们才在二十天后陆续到校上学。

这时三届学生还是三座教室，还是半农半读。第一届的（一、二）班，因辍学太多合并为一个班，放弃了“小庙”东侧的两间土坯房，都在第一座“小庙”教室上课，在他们半日劳动时，第三届的（五）班进入上课；第二届两个班调整为“毕业班”和“升学班”，即准备参加中考的班和只求毕业不再参加中考的班。“毕业班”（三班），在南上岗村里的平房教室上课。“升学班”（四班）在第二座“小庙”上课，他们半日劳动时，第三届的（六）班进入这座教室。

两个月后，上级要求结束“半农半读”恢复全日上学，第三届（五、六）两个班没有教室了。经批准在第二座“红顶小庙”教室北面，加盖一排 6 间红砖瓦房、中间隔开为两座三间的教



室。

施工期间，第三届（五、六）两个班的学生参加建房劳动，搬砖、运土、拉沙子。砖墙砌好房椽上架，却没有椽木盖房顶，于是动员全校学生捐献椽木。到了十一月底，两班学生分别进入“新教室”上课时，只有墙壁，没有房顶，也没安装门窗，两个教室上课时互相干扰。阴雪天，片片雪花飘进来，学生一起跺脚取暖，无法集中精力学习。直到入冬前凑足了椽木，封盖了屋顶，安装了门窗，但以后多年一直无力加吊顶棚。

与此同时，操场西北角的备课室截出一间做主任室，在其北面，盖起一排坐北朝南的 5 间砖瓦平房，两间做理化实验室，1 间做会计、总务室，另外 2 间隔成单间做男女教师宿舍。拆掉斜搭在备课室南山墙的做饭棚子，把（一）班放弃的两间土坯教室改做教师食堂。拆除了简陋的小厕所，在操场东北角盖起一座较大的砖墙带棚的男女厕所。师生在水井周边开垦了菜园，在对称的两座“小庙”教室前，平整修建了一条南北向的通衢大道，并在道路两侧及教室周边栽上洋槐树。

从那时起，学校有了十二三位教师、三届学生、四座教室及零星附属设施，占地二十几亩。虽依然简陋，虽举步维艰，总算初具规模，为逐步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奠定了基础。

那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好，学生为坚持读书克服了许多困难，衣裳褴褛吃不饱饭，起早贪黑地给家里挑水、割草、起棚垫圈、放猪放羊干农活。上午早自习后有四节课，中午回家吃饭往返十分紧张，冬天有时过河湿了棉鞋、棉裤，没有条件更



换，下午就穿着冰冷的棉鞋、棉裤继续上课。极少数路远的学生带饭，没有热饭的地方，没有开水。学生一年四季喝水都是直接从井里打，趴在水桶上喝，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多年。课间，许多男生不愿与老师同去那间简陋的小厕所，就跑到操场北面大河沟里去方便。

全校十几位教师当时大都二十几岁，具有很强的工作责任心和政治责任感。教师住校或借住在南上岗的民房，周六下午可以回家，周日晚饭前必须赶回来。教师们都很自觉，有的教师离家只有二三里路，却常年住在学校里。

正值困难时期，教师伙食标准低，有时要以黄菜叶、红薯秧和玉米皮子做的“淀粉”充饥，但大家不畏艰苦乐观向上。教师轮流管理伙食，每人一个月，直到接替原教育局兼职会计的专职会计兼总务调入，才由他专门管理。

日渐辉煌

1961年7月，第一届学生毕业，入学的第四届学生（七）班，是石山小学的毕业班（固村小学的詹庄、安庄、杨井等毕业生，转入良乡中学）。

学校严格执行“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教育思想，把德育教育作为重中之重，教导主任亲自兼任三个年级的政治课。一年级教育重点是结合形式讲革命故事，进行传统教育；二年级开始讲社会发展史，学习马克思



主义的社会发展五个阶段；三年级加进政治形势和“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教育，即准备考试升学也准备回乡当农民。同时开展学习雷锋、收听重大时事有线广播、“大麦二秋”到周边生产队集体劳动等活动。初中一年级时还有少先队组织，从二年级起开始发展团员，第一届（一、二）班、第二两届（三、四）发展学生团员幅度较大，均有近一半学生入团，与团员教师组建了团支部，第一届团支部书记是第一批分配来校的高保瑞老师，第二届团支部书记是第二批来校的卢进贤老师。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发展团员速度放缓，第三届（五、六）班发展学生团员4人、第四届（七）班发展学生团员3人，均与团员教师编为一个团小组，组长是第一批调入的程继尧老师。

学校要求教师经常家访，学生教育要和家长紧密配合。农村学生家庭经济条件恶劣，动员学生坚持上学读书，是家访的重要内容。许多家长因老师家访受到感动，让已经辍学的孩子从农田返回学校。前两届保持了50%的学生坚持到毕业并参加中考，此后每届坚持到毕业并参加中考的学生保持在90%左右。

前三届，各有一两位适龄学生体检合格参军入伍。返回农村的学生，许多人当即成为村里的记工员、会计、学校代课教师，后来担任了生产队、大队、公社干部，多人转正为中小学教师。改革开放后，一位首届毕业生被提拔为房山区的区长助理。

智育方面以教学为中心，每周三次公开课，教导主任和有关教师听课，然后组织教师研讨、讲评、交流。还有校际业务



交流活动，与良乡中学、豆各庄中学、石羊中学互相听课，互相学习。教师还另外在早中晚加时，给成绩较差的学生补习功课，给学习尖子开小灶。第三届两个班的数学基础太差，分配来校的第一个大专学历的张顺老师，用一个多学期的时间，为他们补习了三个学年的数学课。窦春光老师指导所在班级每周写一篇作文，中考前的一个学期里，每天早晨加课五分钟学习汉语拼音。

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前四届毕业生升学率直线上升：第一届毕业生七十多人，参加中考近三十人，升学 4 人（含一师范生），升学率 13%；第二届毕业生约八十人。参加中考近四十人，升学 7 人，升学率 17%。第三届毕业 61 人，参加中考 55 人，升学 21 人（含一师范生一戏校生），升学率为 38%（据说当年全市升学率 11:1、即 9.9%），其中高庆尘、杨忠分别考进市重点第八中学、牛栏山中学，杨德山考进市戏曲学校；第四届毕业 34 人，参加中考 30 人，升学 13 人，升学率为 43%，在学区、全县名列第一，其中毛保存考进市重点师大附中，窦长海、郭建民两人数学满分。升学的学生参加工作后，大都成为行业骨干、评为中高级职称，还有人日后成为画家、作家。

体育方面也颇有成就。三年困难时期停了体育课，但一直坚持课间操，全校集中、教师带头，锻炼提高学生身体素质。从 1963 年起，每年举办学校运动会，1964 年以后恢复体育课。平日每位教师分别管理田赛、径赛、投掷等各体育项目小组，



给学生做示范，发现、培养和辅导尖子生。参加学区、县里的学生运动会，许多同学的参赛项目名列前茅，学校均获总分第一名。

建校后的前四届，分别在 1961—1964 年 9 月毕业，他们见证了石山中学从无到有的发展变化和日渐辉煌。提及那段艰苦奋斗的时光岁月，已七八十岁的师生们至今津津乐道、念念不忘于心。

终成记忆

1964 年，除接收石山小学一个毕业班，即第七届（十）班之外，县林业局在学校设置了一个农林业中技班，学制两年，招收三十多名学生，派来一位管理教师。课程设置与其他班一样，均由在校教师承担，教师工作量有增无减。

1965 年，为活跃文娱生活，在校学生组成二十多人的文艺演出队，排练演出了话剧《山村姐妹》，去豆各庄两处军队驻地进行慰问演出，并为周边社队村民演出多场，得到广泛赞扬。

坚持了每年一次的运动会，参加良乡公社、房山县中学生运动会成绩突出，第五届（八）班一位学生获径赛 200 米冠军，毕业时考取了市体育专科学校，日后成为一名体育高级教师。

此时，学校进行“四清”运动，从检查学校账目开始，到明确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教育、教学各



项工作受到很大影响。第五届（八）班四十多名毕业生，7人入团，中考升学的仅有5人。

1966年，第六届（九）班和“农林中技班”学生即将毕业、第九届（十二）班学生正在入学之际，“文革”开始。教师分属三派组织，各自联系一部分学生和社会人员“革命造反”，贴大字报、开展大辩论、批判片面追求升学率，轰轰烈烈的“停课闹革命”“革命大串联”，使学校陷入“无政府”状态。

1967年“复课闹革命”，第六届（九）班及农林业中技班学生毕业，自行回农村参加劳动。第十届招收的学生是石山小学的两个毕业班，与在校二、三年级学生一样，很长时间只学习毛主席语录。1968年海军四四九三部队派两三位解放军官兵，驻校实行军管到1969年。成立学校革命委员会时，选举张广茂为主任，南上岗村、石山村各派一位贫下中农代表参加革委会，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学校改秋季始业为春季始业。

使用北京市自编教材，代数、几何、三角合并为数学一科，物理、化学合并为工业基础知识，动物、植物、生理合并为农业基础知识，语文教材由教师自选，设有体育和音乐课。坚持了每年一次的学生运动会，参加良乡公社、房山县的中学生运动会，多名学生在田赛、径赛中取得很好的成绩。

1973—1975年，虽然大紫草坞村、太平庄的学生去了更就近的中学，但增加了苏庄小学的毕业生。每届学生3个班，每班四十人左右。

教室不够，加盖了四座（三间一座）的教室，还把2间原



备课室与 1 间主任宿舍打通改做了三间一座的教室。加盖了一排五间教师备课室和宿舍，与原宿舍之间，打了一眼机井。

当时，许多中学举办“带帽”高中，初中教师担任了高中的课程，初中毕业的学生只要有升学要求，都可如愿以偿，不再有中考升学难的问题。

1976 年文革结束以后，石山中学招生不再接受苏庄小学、只接收石山小学毕业生，每届两个班，每班四十人左右。1978 年颁布新修订《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改春季始业为秋季始业。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重视在学生中发展团员，每班毕业前发展十几个团员。学校建立了团支部，书记由教师中的团员担任。

“文革”中因大专院校停招，教师队伍无法补充，陆续从周边村子招聘数位高中学历代课教师和队派教师，1975 年有三人转正。“文革”后，李辉、张顺等大专学历教师调归原籍，窦春光、邓茂金、万良翘、梁玉琴等教师辗转调到良乡第二中学，成为教学骨干，邓茂金、梁玉琴评为中教一级教师。窦春光、万良翘两位评为中教高级教师，并相继提拔为该校副校长。

1978 年，石山中学的上级单位由良乡公社文教组，回归县教育局良乡学区。学校第一任领导张广茂主任 1970 年调离，第二任领导李普昌 1976 年调回原籍广东，第三任领导景立庄 1981 年调出后，由第四任领导闫国继任。

1983 年暑假，根据国家教育部《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



教学计划（修订草案）》，房山县政府决定调整中学布局，每个乡只保留一所条件较好的中学。因为良乡镇已经有了良乡中学、良乡第二中学，石山中学被撤并。

撤并时，学校有教师 20 人左右，分别调入良乡二中和南梨园中学。在校的第二十五届学生毕业后参加中考后，或升学或还乡。第二十六、二十七届四个班的学生，分别升入良乡二中的二、三年级。

同年，石山小学因土坯房年久失修坍塌破损严重，迁入石山中学校址。1990 年石山小学撤并到东阎村小学，石山中学原校址复归南上岗村，如今经村里“招商引资”盖起一片厂房。

1958 年建校到 1983 年撤并，存在了 25 年的石山中学，写进了 25 届近两千莘莘学子的人生历史。几代师生的艰辛与付出、学校曾经的发展与辉煌，成为他们和十里八乡村民心中永远的记忆。

【衷心感谢提供史料的张广茂、邓茂金、万良翘老师！衷心感谢提供史料或给予各种帮助的张宝德、李克芳、杨忠、任德山、任宝森、姜玉卉、孟昭宏、董祥泰、李淑荣、窦长海、李玉敏、张志国、韩贵、高秀、高辉、高巍等诸位同学和校友！】



北京农校当年的“演讲热”

林宗源*

30年前，即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所在的北京市农业学校（2000年后升格为北京农职院），掀起了一股“演讲热”。

那个年代，北京市中专各校都在搞演讲，共青团北京市委大中专部，从1988年起，搞起了一年一度的全市演讲大赛。为展示一校之风采，由校团委组织，团委书记是薛有才，他从学校各个专业中层层选拔出演讲尖子生，组建了农校演讲队。于是，我这个语文教师，就派上了用场，作艺术指导。由此，结识了许多热爱演讲的学生，甚至结下了几十年的师生之谊。

1988年参加市级比赛，选拔了果林专业的王玉春（果林专业 房山人）、田万利（果林专业 昌平人）和经管专业的刘洪亮（经管专业 延庆人）三位同学。王玉春是学生会干部，经常练嘴皮子，脑瓜灵通，文体活跃；田万利是由村镇干部选派来的两年制班级学生，是果林专业学生党支部书记，他话语凝重，略带口音，有一股山里人的倔强劲儿；刘洪亮谈吐幽默，喜欢唱个京剧选段。为发挥所长，凸显三人各自特点，大家对

* 林宗源：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原基础部语文教研室主任、教授



稿件反复雕琢，修改时尽量朝合乎每人性格的语言个性靠近。王玉春批评一些学生买饭加塞儿的现象，这样说：“（在买饭窗口）就是三个人，也要排成一条横队”。用“横队”说学生买饭加塞、争抢，辅以态势，加重语调，更具讽刺意味。田万利的稿件，对家乡落后现象深表痛心：某些村里人迷信到“就是老母猪下崽儿，也要选一个黄道吉日”。有了这种痛心，才激发了这名青年回乡后要去竞选乡长，立志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刘洪亮的演讲稿，把一些同学上了中专、转了户口，就优哉游哉的情态，描绘得惟妙惟肖。

经几次指导，自己练习，他们不断给讲演内容添加“作料”，好像请人吃饭，听众是客人，演讲者是厨师，变着法子使端上的菜更合客人胃口。王玉春找到我说：直直地站立着，有些呆板，能不能拿着话筒，来回走动讲，可以调动听众的视觉，活跃场上气氛。一试，果然不错。又建议插入一首歌曲，结尾用歌声结束，截取了《为了寻求美》的一段。

我们为了寻求美，排成一条队，
美在前面等着你，把美来品味；
我们为了创造美，汗水湿衣背，
假如你要怕吃苦，美将要引退；
美在那青青的山，美在绿绿的水，
美在那云雾里，和你来相会——
我们为了寻求美，排成一条队，
满怀希望和理想，向着朝阳迎着晨风，



追着春天飞——嘿！

歌词内容正好能够配合演讲结尾积极向上的情调，与众不同。

刘洪亮喜欢滑稽的语言，把严肃批评的语调改换成滑稽的腔调，加之他语言节奏的紧凑和音色的特别，增加了感情色彩。田万利经过认真思索，把题目改作《大山的儿子》；删除了开头的平铺直叙，介绍自己家乡在大山深处，紧跟一句：“要问我毕业后有什么追求？告诉大家：我想当乡长。”他为什么想当乡长？开篇就“锁住”听众的心，想不听都忍不住。

这年深秋一日，北京市“今日中专生”演讲大赛在北下关电力专科学校（现在是北京交通大学分部）拉开序幕，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莅临现场。大赛取前十名选手，全市几十所中专校的参赛者汇聚至此，竞争激烈异常。演讲者的表演，异彩纷呈，掌声不绝于耳。我校三位，抽签后分别登台，因在校做足了功课，各显神通，尤其田万利讲时，那是从大山深处传来的悲沉与凝重，最后一声谢幕刚一落地，在场学生纷纷拥来，举着笔记本让他签名留念。他的得分，也仅以零点零二分屈居第二。王玉春第四、刘洪亮第七，都以精彩表演，跻身十佳之列。当时那位团市委书记（数年后在某省任省委书记）讲话中用“穿透四壁”来赞扬选手们的演技。

全市中专演讲大赛十佳中占取三名，获得了团体总冠军，不亚于在校园放了一颗卫星，成了爆炸式新闻。团委又安排三位获奖选手在全校演讲。三人声名鹊起。全校教师元旦联欢会



上又让选手们登台表演。不想刘洪亮最后竟然面对台下说：“我取得的成绩，要感谢的是我的班主任林宗源老师！”我听了一惊，心中暗怪这学生太唐突。也许，正是因为那句话，校团委薛有才书记又聘我为全校演讲总指导。以后的团委书记郑荣生、徐洪飞等还有学生科科长赵仲英，以及各个专业的专业书记，都热心抓演讲。每年两个学期，学校各开展一次演讲赛，层层选拔，从班里选拔到专业，从专业选拔到学校演讲队。不少班级和专业书记也经常邀请我去指导他们的学生。演讲爱好者自己，不论哪一个专业的，甚至来敲我办公室的门，让我改稿、辅导。这些演讲者，不管是男是女，都有“大将风度”。一次，我在 9108 班组织了一次班级演讲，其他班级的同学也来捧场，教室挤得满满的。女选手叫焦春阳（牧医专业 房山人），下面却有男生起哄，问她慌不慌呀？是不是怕我们了呀？该忘词了吧？面对男生们的“挑衅”，她眉头不眨，说：“慌什么？在我的眼里，你们就是一堆烂白菜！”话音一落，激起一片响亮的笑，震动屋宇。她从容不迫，完成了自己的段子。

一时间，演讲成风，火爆异常，能在人前讲上两句，几乎成了一种炫耀的资本。

一次全校举办演讲比赛，我坐在评委席上。果林专业赵晨霞主任带着一个身材不高却目光明亮的选手走过来，我见他瘦弱的身上别着一个大大的椭圆形选手号牌，很有意思。赵主任介绍了他的姓名，夸赞他音色好。比赛开始，轮到这选手登台，他讲《圆我经理梦》，果然音色纯正，音域宽阔，不慌不忙，



轻重疾徐，有分寸、入板眼。演讲一结束，我把他叫住，祝他取得第一，告诉他：“邹文利同学，你就加入校演讲队吧。”他这颗演讲的苗子，值得培养，在当年全市的演讲大赛中，和另一位选手薛琛娜双双杀入了全市的十佳，名次列前，捧得了桂冠。

不久，我担任市中专语文研究会理事后，负责学生工作，由指导本校演讲到指导全市中专学校的演讲活动。我参与了编选演讲集工作，邹文利、薛琛娜两个人的作品都入选了。

有一位不忍再次提及的校演讲队员，叫付艳辉（昌平），因为有一年参加者只能去三位，落选的她大哭了一场。第二年，第三年，她不负众望，两摘十佳桂冠。学校保送她上大学，不到半年，却因绝症不治而早逝。还有一位同事，水利专业赵如革老师，小我几岁，却叫我“兄弟”，教师休息室里一见面就“总指导”“总指导”地开玩笑。他为如何辅导好演讲建言献策，却也不幸英年早逝。直到逝世的前一个月，还坚守在教学岗位。这些逝者，每每想起，仍感痛心。

学校举办过一次本校的大型演讲比赛，赛场设在学生宿舍后成片高高的白杨树下，场地开阔，沙柔风软，空气清新，绿荫如伞，白云在天。各专业学生有的坐马扎，有的席地而坐，风儿吹动树叶的沙沙声响和演讲者动听的声音交汇。我负责评委工作，遇到了麻烦，并列最高分的是两名女同学。果林专业867班周子燕（果林专业 门头沟人）《为女生鸣不平》，有一段说得精彩：



还记得，11月23日团支部举行了小型体育比赛，很多同学积极给支部出主意，想办法，主动帮助搬运器械，维护秩序。我们看到那激烈角逐的场面，曾由衷地高兴。可谁能想到，比赛后，有的男同胞竟因为自己的名次不佳、奖品不多而大发牢骚，把奖给的手绢撕掉了。至今，那撕裂手绢的清脆之声，还回想在我的耳畔，这也同时撕裂了我们女生的心啊！

讲得真纯坦诚，细节感人，满有情意。场下的男生却多有怨言，而所有的女生倒是鼓掌称赞，由此高潮迭起。而农学专业王××（我记不得本人大名，还望见谅）同学的《我们的宿舍最活跃》也不示弱，她把自己宿舍中的伙伴娓娓道来，有人活泼开朗，有人天真烂漫；她描绘这些女孩们在这小小而温馨的斗室中，演绎出多彩多姿的生活。她讲的是同学，也是自己的姐妹，真实可信，激情涌动。场下的“粉丝”，叫好不断。结果，几位评委们最后给出的两人最后得分都是9.80分，不分胜负。团委书记和我商量，要分个高低，要求每人选出演讲稿中最精彩的一段，各演讲1分钟。等两分钟争夺战结束，场下翘首以盼，都希望自己赞成的选手荣登榜首。评分结果让人大感意外——比分依旧相同。这不仅是两个选手的比拼，也是两个专业谁能得到第一的争夺战。最后的结果我忘记了。但那场面的火热，演讲者和听众的感情的融合，台上台下的澎湃激情，却永远留驻我心。

那一时期，提倡教学改革。我在课堂上开始搞一些口语训练，比如《应用文写作课》，上课先训练两分钟口语，学生轮



流准备，一个学期能把每个人都训练两遍，大受学生欢迎，争抢着上台发言，给班级演讲打下基础。在学校阅览室搞一些阅读与评析，开发学生阅读能力和口语能力。

进入北京市中专语文研究会任理事后，和同事一起，与北京市教委职教处和共青团北京市委大中专部合作，编辑了《北京市中专生演讲集》《党、祖国和我》



两本读物，我所辅导的优秀选手的演讲稿大部分编入其中。特别感谢北京经贸大学出版社赵颖君编审，全力支持了研究会出版的工作。再后来我主编《应用文写作》教材，把“演讲”作为重要一章来推出，同时把优秀的演讲稿作为例文编选入教材。又把辅导演讲的心得写了两三篇论文，发表在省级刊物上。特别是2000年后，得到学校张京生教务主任的支持，开办了演讲的选修课，还编写了一本《演讲与口才》的小册子。

当然，不能贪天之功，自夸如何；演讲辅导中，校团委辛勤的组织，电教室老师认真地录像，还有很多老师在各班、各专业挖掘演讲的人才，年复一年，才使得校学生演讲的队伍成长壮大。

三十年过去，头脑中还活跃着那些演讲者的言谈举止及声性并茂的演讲，时时念起，不知他们现在怎么样了？生活好吗？还热爱演讲吗？事有巧合，2017年秋，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除了王玉春常联系，还在一个月內，联系到了数十年不得音讯的邹文利和田万利。我十分惊喜，好像捡到久已丢失的珍宝那样。

最近，邹文利看了我的这篇稿件，不仅为文章作了精心修改，还连夜写了他在校训练演讲的往事，兹录于下：

2018年岁末的一个清晨，微信的铃声响起。“夜猫子”的我，懒懒地伸手打开手机，屏幕上赫然出现“塔园居士”的对话框。原来是恩师林宗源的消息，发来热乎的新作《我和演讲活动的始终》，回忆了



作者在校的演讲大赛中担任
评委 徐洪飞 摄

他与演讲结缘的往事，要求我提些建议。心中顿时一蒙，原本都是老师帮学生改稿，岂有本末倒置之理？业已满头白发的我，早已疏远了笔耕的乐趣，岂敢妄自执笔涂抹。在手指上下翻弄间，眼前又浮现出近三十年前的那桩桩往事。

1989年，我考入了北京市农业学校果林专业。寒假前，学校举办一年一度的演讲选拔赛，居然捡到了一个“大偶尔”，获得了专业第一名。可惜的是，偶尔就是偶尔，参加校级比赛时，只获得了三等奖。后经班主任赵晨霞老师的引荐，被林宗源老师吸纳为校演讲队的一名队员，才有了那三年“打比赛”的人生经历。自1990年至1992年，在共青团北京市委大中专部和



北京市中专语文研究会联合举办的中专生演讲比赛中，先后获得过三等奖、二等奖和一等奖。与其他比赛项目一样，领奖台上的闪亮，源自台下汗水的汇聚。

记得每次市级赛事前的两个月，是林老师和我们选手最为辛苦的时候。一般都是按照比赛通知要求，先由选手写出初稿，然后再按林老师的建议反复进行修改——我当时起的名字叫“选材”。一般三、五遍后主体结构基本确定下来了，再由林老师结合每位选手的特点，针对每一句、每个词甚至标点符号进行细致修改，此时讲稿才算基本完成——我美其名曰“抛光”。后面的事情就是选手在反复练习中，结合预讲中的体会和感觉，再进行个别词汇的调整。最后一道程序就是熟练程度和语言表达的检验，选手先把稿子交给林老师，由林老师随机挑选一句话，然后由选手马上接出下茬——我当时偷偷地给这个环节起了一个很实际的称呼叫“找茬”。通篇熟练程度检验过后，就是对语气、语调、感情的运用等方面的细致润色——像是在“打蜡”。现在盘手串的时候，盘着盘着就不由得想起了当年准备比赛的环节，这也许正是万物间都有因缘，事物间都有关联的缘由吧。

载着最后一次比赛的胜绩，我被分配到了国营北京市十三陵农场成为了一名技术员。一年后，代表农场团委参加团县委的演讲比赛捧冠而归，不久被抽调到农场宣传科工作。以后的工作岗位几经变动，演讲的情缘渐渐尘封。但演讲比赛的经历以及由此给我带来的影响，却挥之不去，思之不尽。我钟情演讲，



感恩林老师，感激每一位关心过我的师长们……。直至今日从事区委的党建工作，每每想起演讲，都为自己曾经是一位年轻的演讲选手而感到欣慰——青春没有付东流。

（邹文利 《青春——没有付东流》）

田万利毕业后可能没有当乡长，但是他依然扎根在山区，有时候工作相当艰苦。他也没有放弃演讲的爱好。2017年刚重新联系上，就发给我一篇《青春在奉献中燃烧》的演讲稿，是作为区里的演讲团成员到乡镇宣讲，让我帮助修改。他在一开头就说：

我叫田万利，一个在基层工作三十多年的乡镇干部。首先我非常感谢镇宣传部门给我这次宣讲的机会，让我用最平实的语言

来讲述一群工作在大山里普普通通的乡镇干部，他们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奉献给了党的农村基层工作。

里面写了他怎样在穷乡僻壤的大山之中为他的乡亲服务，去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改着改着，我头脑中又浮现出这位“大山的儿子”的身影，又似乎听到他倔强而洪亮的声调。演讲，伴随着他去开辟新农村的远景，去温润他热爱的每一寸家乡的田野、河流、山峦……



“大山的儿子”田万利同学至今仍坚持在演讲一线，这是他参加昌平区宣讲团的演讲照



2001年北京农校与香山农干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形成了一院四区的大格局，培养大专以上学历的高职生。我由于教材编写忙碌，兼之有新的科研目标，和我多年的演讲辅导工作作了最后的告别。

屈指算来，我辅导演讲的学生，在全市中专生演讲大赛中取得十佳选手荣誉的，共有17个名次，其中四五个人获得十佳中一等奖。虽然我个人没有获得什么荣誉，但北京市多所中专学校，都知道北京市农业学校的演讲队厉害。那些在学校演讲队获得奖项的学生，早已毕业，但他们定会记住那一段让口才得到进步的多彩时光吧。



辽《孟初墓志》考

杨亦武*

内容提要：本文考孟初生平，兼考女真伐辽初期战事。天庆二（1112）年春，天祚帝到长春州春纳钵，阿骨打蒙反状，当年十二月孟初受命戍黄龙府。天庆五年（1115），扈从天祚帝统兵七十万亲征女真。天庆六年（1116），赴东京平高永昌叛，阵亡于沈州。墓志记载，可补正史之阙。

关键词：孟初 黄龙府 东征 沈州 王鼎 虞仲文

导 言

1997年9月，在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大十三里村出土了辽代孟初墓志一方，题：“大辽故翰林学士金紫崇禄大夫行尚书提点大理寺上护军平昌县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食实封贰佰户诸路汉军□□孟公墓志铭并序”，现存于北京市房山区文物管理所。墓志为青白石质，正方形，边长78厘米，厚8厘米。志文用楷书书写，字径2厘米，竖刻35行，满行36字，共存字1224

* 杨亦武：原房山区政协文教委主任 已退休



字，墓志中间略有磨损，右边及下边略残，盖佚。该墓志主人孟初生于辽道宗时期，墓志详述了墓主孟初生平，其中涉及辽金初期战事，可补正史阙略，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墓志提及的王虚中，墓志撰者虞仲文，为辽金之际的重要人物。

一、辽季英杰 两朝良佐

墓主孟初，字子元，正史无传。墓志载“世为上谷龙门人”。上谷龙门，今属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赤城县古属上谷郡，辽代置望云县（治今赤城云州）、龙门县（治今赤城龙关）。

其曾祖父孟彬、祖父孟克忠，都是平民。到了父亲孟载，步入仕途，任开远军节度副使，官至将作少监。

《辽史》^[1]卷四十一·志第十一·地理志五〇·西京道：“云内州，开远军，下，节度。本受降城地。辽初置代北云朔招讨司，改云内州。清宁初升。有威塞军、古可敦城、大同川、天安军、永济栅、安乐戍、拂云堆。兵事属西南面招讨司。”辽清宁初，设置代北云朔招讨司，后改云内州，辖境约相当于今内蒙固阳县、土右旗、土左旗一带，治所在柔服（今土左旗西北）。领柔服、宁仁两县。

州节度副使，是军州的军事次官，辽代的州节使副使品级不详。

将作少监，为将作监次官。将作监，辽代官署，掌管宫室建筑，金玉珠翠犀象宝贝器皿的制作和纱罗缎匹的刺绣以及各



种异样器用打造。一般设有：监 2 人，从三品；少监 2 人，从四品下。

看来孟初父孟载，先做开远军节度副度，镇守云内州，后为将作少监，是官居从四品，“为时闻人”，是个知名人士。

孟初 7 岁，善作文章，读书过目成诵。辽道宗时，宣懿皇后萧观音召进宫内，命他作诗，孟初提笔而就，皇后非常高兴，当即赏赐黄金。一时，有名望的贵族、达官争相与他交往。

翰林学士杨辅之称道他有操守气概，一见成忘年交。曾官居观书殿学士的王虚中慨叹道：“孟初若不出生，吾道又由谁来继承呢？”大康九年（1083）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校书郎，这是一个掌校讎典籍，订正讹误的职分。

大安二年（1086），授涿州军事判官。涿州，今河北涿州市。大安三年（1087），徙永州观察判官。永州，在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东北。大安六年（1090），升劝农县知县，劝农县，辽开泰二年（1013）析京民县置，治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西南二台子村。属中京大定府。

在劝农县任上，孟初“举制策入优等，超授右拾遗。”制策，皇帝有事书之于简策以问臣下，称为“制策”。后为科举考试所采用，成为国家取士的科目之一。唐·刘肃《大唐新语·举贤》^[2]：“张柬之，进士擢第为清源丞，年且七十余，永昌初，勉复应制策。”宋苏轼《策别二》^[3]：“国家取人，有制策，有进士，有明经，有词科，有任子，有府史杂流。”《宋史·苏轼传》^[4]：“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超授，越等授官。



孟初应制策试成绩优等，由知县破格提升为右拾遗。右拾遗，右谏院僚佐。辽代设左、右谏院，右谏院主官为右谏议大夫，属吏为右补阙、右拾遗。就此，孟初由一介小知县，一举成为道宗身边的谏臣。

从此，孟初渐居显要。再授史馆修撰应奉阁下文字，加尚书左司员外郎。史馆修撰，负责掌修国史。应奉阁下文字，《辽史》无此职，在辽代墓志中屡见。看来《辽史》漏载此官职。尚书左司员外郎，辽代尚书省僚佐。据《辽史》尚书省官员有：尚书令，左仆射、右仆射，左丞、右丞，左司郎中、右司郎中，左司员外郎、右司员外郎。

母亲去世，孟初依例去官守孝，改任中京银绢库督监。寿昌元年（1095），官复史馆修撰，迁任司勋郎中。司勋郎中，吏部司勋司长官，掌校定勋绩及授予勋官告身等事。不久，再次破格提拔，任乾文阁侍制，权勾当史馆修撰事。乾文阁侍制，为乾文阁僚佐，负责起草诏书。在这项主责外，孟初又兼主修撰国史。

寿昌三年（1097），任迎伴宋朝贺生辰使，授知制诰，拜中书舍人。知制诰，为翰林院僚佐。翰林院设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翰林祭酒、知制诰等。知制诰，掌管起草诰命。中书舍人，中书省僚佐，为皇帝最亲密之近臣，掌管诏旨制敕与皇宫财政，负责执掌诏诰、决策政令、辅佐朝政。

至此，孟初从道宗大康九年（1083）登进士第，仅用14年时间，由秘书省校书郎一位微不足道的小吏，一步步走向辽



国权力的中心。

天祚帝即位，为贺生辰使，出使高丽。乾统三年（1103），同知礼部贡举，掌礼部贡院。岂料，科举失意的举人，散布流言蜚语，造谣诽谤。天祚帝尽管素来知道孟初清白，还是不得已罢黜孟初。翌年，起用孟初为乾文阁待制。乾统八年（1108），升昭文馆直学士。直学士，为昭文馆主官，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参议朝廷制度沿革、礼仪轻重。

乾统十年（1110），改授知制诰，加左谏议大夫，进封开国公。左谏议大夫，门下省左谏院长官，属南面官，乃辅佐皇帝的要臣。掌侍从赞相，规谏讽谕。

开国公，实为“平昌县开国公”。

辽代爵位最为为亲王，次为郡王。受爵为契丹皇族和后族。次为公、侯、伯子男五爵七级，分别为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郡侯、开国县伯、开国县子、开国县男。孟初为开国县公，居五爵之首，次居三等。也算是人臣之显了。

二、先期效命 忘身死国

天庆二年（1112），成为孟初的官场生涯的转折点。

“天庆二年，提点大理寺，奉使南宋，寻受礼部侍郎，擢翰林侍读学士，□□提点大理寺，别诏经历馆阁文字。十二月，管押中京路汉军，戍黄龙府。”

他先是继续做他的朝官，由提点大理寺，受礼部侍郎，擢



翰林侍读，其间还曾奉使南宋。提点大理寺，大理寺长官，专门负责刑狱案件的审理。礼部侍郎，礼部僚佐，掌礼仪、祭享、贡举之政。翰林侍读，翰林院僚佐，为皇帝进读书史，讲释经义，备顾问应对。经历馆阁文字，《辽史》无此职，或是临时应命，掌馆阁奏章、诏命的起草。从上述职务上看，孟初身为天祚身边的要员近臣。

当年十二年，作为文官的孟初，忽受武职，管押中京路汉军，戍黄龙府。这一变故耐人寻味。

原来，是年春，天祚帝到长春州春纳钵，千里之内的女真酋长都来朝见，头鱼宴上天祚帝令各部酋长依次起舞，惟独完颜部阿骨打抗命，天祚帝大怒，险些惹来杀身之祸。

《辽史》卷二十七·本纪·第二十七·天祚皇帝一：“（天庆）二年春正月己未朔，如鸭子河。丁丑，五国部长来贡。二月丁酉，如春州，幸混同江钓鱼，界外生女直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酋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他日，上密谓枢密使萧奉先曰：‘前日之燕，阿骨打意气雄豪，顾视不常，可以边事诛之。否则，必貽后患。’奉先曰：‘粗人不知礼义，无大过而杀之，恐伤向化之心。假有异志，又何能为？’”^[5]

阿骨打触怒天祚帝，天祚帝本想借故杀了他，由于萧奉先的劝阻，天祚帝只好作罢，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完颜部不臣之心已明。

天庆二年（1112）十二月，孟初受命统领中京路汉军戍东



陞重镇黄龙府。这说明，天祚帝对阿骨打有所防备。黄龙府的战略地位首掘一指，向北与宁江州、长春州成犄角之势，向南衔咸州、沈州，为东京东北边门户。同时为上京、中京东北边战略屏障之重要支点，确保着东京、中京、上京安稳无虞。黄龙府若失，三京门户顿开。天祚帝在备女真之初，将如此重要的责任授与孟初，足见孟初在大辽朝中的分量，和天祚帝对他的信任、倚重。自此，孟初的命运更和辽金战事连在一起。

两年后，女真人果然起兵抗辽。天庆四年（1114）十月，阿骨打率女真人攻破宁江州，十一月，败辽都统萧紉里、副都统挾不野将步骑十万于出河店。女真将吾睹补、蒲察复败赤狗儿、萧乙薛军于祥州东斡。斡鲁古败辽军于咸州西，斩统军实娄于阵。完颜娄室克咸州。^[6]墓志开章云：“天庆四年，挾娄渤海秽种，首尾畔换。”亦即指此。

天庆五年（1115）正月，阿骨打称帝立国，国号大金，改元收国。同月，金兵下益州。阿骨打率兵，败辽都统耶律讹里朵、左副统萧乙薛、右副统耶律张奴、都监萧谢佛留步骑二十七万于达鲁古城。八月戊戌，阿骨打亲征黄龙府。九月，克黄龙府。^[7]

《辽史》卷二十八·本纪第二十八·天祚皇帝二：“（天庆五年）冬十一月，遣驸马萧特末、林牙萧察刺等将骑兵五万、步卒四十万、亲军七十万至驼”门。^[8]

《金史》本纪·第二·太祖：“（收国）十一月，辽主闻取黄龙府，大惧，自将七十万至驼门。附马萧特末、林牙萧查刺等骑五万、步四十万至斡邻泺。上自将御之。”



辽天庆五年即金收国元年（1115）十一月，天祚帝见黄龙府失陷，非常恐慌，亲率七十万大军东征，行军驼门。墓志：“（天庆）五年，扈驾东征口当诸路汉军。”与正史记载相吻合。

据墓志，孟初天庆二年（1112）“十二月，管押中京路汉军，戍黄龙府。”至天庆五年（1115）九月黄龙府失陷，戍守黄龙府为时两年零九个月。当年十一月，他再次“扈驾东征”，应是历黄龙府城破，侥幸逃脱，又奉命扈天祚帝御驾东征。其间，孟初在黄龙府困孤城，败讯不断，宁江州失守、出河店败绩，祥州东、咸州西相继败闻，至娄室克咸州，辽都统耶律讹里朵、左副统萧乙薛、右副统耶律张奴、都监萧谢佛留步骑二十七万败于达鲁古城。最终轮到自己，兵败黄龙府，苦战得脱。

无奈王命难违，未待喘息，扈驾东征，再次卷入空前的浩劫。天庆五年（1115）十二月，阿骨打在护步答冈大破天祚帝，孟初无疑亦在军中，经历了辽军的惨败。

天庆六年（1116）正月，一件不测之事发生，渤海高永昌据东京叛，自称大渤海皇帝，称隆基元年。天祚帝先是命萧乙薛、高兴顺招前去招抚，高永昌不为所动。闰正月又命萧韩家奴、张琳发兵讨伐。张琳军还算顺利，一路攻到东京辽阳城下。张琳东征高永昌，孟初在军中为将，张琳攻辽阳城失利，退守沈州。不想为女真阁母攻破，孟初与刘思温等将士惨遭杀戮，不幸遇难。张琳缢城苟免。此役，《金史》《辽史》记载甚略，《契丹国志》^[9]却有详述。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之十·天祚皇帝上：“宰相张琳，



溇州人也，天祚命讨之。……夏五月初，自显州进兵，渤海止备辽河三叉黎树口。张琳遣羸卒数千，疑其守兵，以精骑间道渡河趋溇州，渤海始觉，遣兵迎敌。旬日间三十余战，渤海稍却，退保东京。张琳兵距城五里，隔太子河札寨。先遣人移文招抚，不从，传令留五日粮，决策破城。越二日，发安德州义军先渡河，次引大军齐渡，忽上流有渤海铁骑五百，突出其傍，诸军少却，退保旧寨，河路复为所断，三日不得渡，众以饥告，谋归溇州，徐图后举。初七日夜移寨，渤海骑兵尾袭，强壮者仅得入城，老幼悉被杀掠。是时军伍尚整，方议再举，忽承女真西南路都统阁母国王檄：‘准渤海国王高永昌状，辽国张宰相统领大军前来讨伐，伏乞救援。当道于义，即合应援。已约五月二十一日进兵。’檄到溇州，众以渤海诈作此檄，不为备。是日，闻探东北有军掩至，将士呼曰：‘女真至矣’张琳急整军迎敌，将士望见女真兵，气已夺，遂败走入城。女真随入，先据城西南，后纵兵杀戮几尽，孟初、刘思温等死之，张琳与诸子弟等并官属縋城苟免。”

文中分明记载“女真随入，先据城西南，后纵兵杀戮几尽，孟初、刘思温等死之。”这是天，是天庆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孟初阵亡于沈阳之役，而墓志记载却语焉不，对照《契丹国志》的记载，即可厘清端倪。墓志云：“朝中可与言兵者，得翰林孟公为副帅。师出不数月，捷问络绎不绝，赐御札嘉激。公率部下乘胜转战，直抵寇所窃邑。邑城漂摇，拔在朝夕。会天大雨，河水暴涨，班师驻溇州。贼出近甸，我师玩而无备，



公马还泞，殁于贼中。天子闻之震悼，诏赠宣政殿学士，赐其子寘谦内供奉班祇候。”

东京事变，天祚命张琳等征讨，找董军事的官员随征，选到孟初，作为张琳的副手，“师出不数月，捷问络绎不绝，赐御札嘉激。公率部下乘胜转战，直抵寇所窃邑。”这和《契丹国志》：“三十余战，渤海稍却，退保东京。张琳兵距城五里，隔太子河札寨。”的记载相吻合。

墓志：“邑城漂摇，拔在朝夕。会天大雨，河水暴涨，班师驻浑州。”《契丹国志》：“越二日，发安德州义军先渡河，次引大军齐渡，忽上流有渤海铁骑五百，突出其傍，诸军少却，退保旧寨，河路复为所断，三日不得渡，众以饥告，谋归浑州，徐图后举。”孟初随张琳攻辽阳京失利，退守沈州。两处记载一至。两相参照，攻城不下，退守沈州的原因更加清晰：一是初攻失利，二是粮草短缺，三是大雨引起河水暴涨。所以孟初张琳等不得已退入沈州城内，徐图后举。

关于孟初阵亡，墓志：“贼出近甸，我师玩而无备，公马还泞，殁于贼中。”《契丹国志》：“檄到浑州，众以渤海诈作此檄，不为备。是日，闻探东北有军掩至，将士呼曰：‘女真至矣’张琳急整军迎敌，将士望见女真兵，气已夺，遂败走入城。女真随入，先据城西南，后纵兵杀戮几尽，孟初、刘思温等死之。”

退入沈州城后，张琳接到女真都统阁母的檄文，众将不以为意，以为是高永昌使诈，没想到女真大军真的兵临城下，张琳率兵出战，辽兵未战先怯，败归沈州城，阁母大军追杀而入，



孟初时运不济，马为泥泞所陷，惨遭杀戮，女真城西南，纵兵屠杀，辽兵死伤殆尽，张琳见大势已去，缒城逃命。

墓志载：天庆“六年，授翰林学士，仍提点大理寺。”是年，孟初随张琳闰正月出征，所授翰林学士，仍提点大理寺官职，应是天祚帝在其出征前，加官鼓励。

墓志说，天祚帝知道孟初阵亡的消息惊愕悲悼，下诏追赠他为宣政殿学士，赐其子孟宝谦为内供奉班祇候。天庆七年（1117）十一月一日，“作招魂辞，具衣衾，葬于良乡县房仙乡重义里。”

墓志通过孟初经历，真实反映了辽末自天庆二年（1112）至天庆六年（1116）年，一段真实的历史。其间，重大历史事件都能得到印证，一些记载，弥补了正史之缺。

“良乡县房仙乡重义里”，为今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大十三里村。辽代，大十三里村属良乡县房仙乡重义里，按照古时以村名为里名的惯例，大十三里村，在辽代村名应为重义村。重义里，后来“义”，改为同音字“义”。里名由辽代历时近千年，直到清代，大十三里村，仍是重义里所在。

关于房仙乡的存在，在学术上一直存在争议。该墓志的出土，证实良乡县确有房仙乡存在。房山境内，辽代的一些乡，大多沿袭唐代而来，比如金山乡。由此看来，房仙乡或许也是自唐代就有，期待未来出土墓志等材料得到印证。

孟初阵亡沈州，尸骨丧于乱军之中。故作招魂辞，具衣衾而葬。为什么葬在良乡县呢？大安二年（1086）授涿州军事判官。



而大十三里村在涿州以北，距涿州城仅 60 里的路程，这或许是其中的原因所在。

孟初是上谷龙门人，他没有葬在上谷龙门，而葬在涿州北的良乡县房仙乡重义里。按照古人归葬的习俗，孟初或是任涿州军事判官时定居此里？

三、载文载行 余庆后昆

墓志最后，数语论其为人。

孟初在当世文章出色，7 岁没少龄，受到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召见厚赏，当朝名士杨辅之、王虚中倍加赞赏。故墓志云：“公生平为文章，敏而有法，自布衣时，声艳□□。”自大安六年（1090）至天庆六年（1116），凡 26 年，孟初先后任应奉阁下文字、乾文阁侍制、授知制诰、拜中书舍人、经历馆阁文字。都是负责起草诏书、执掌诏诰之类的要职。故墓志云：“三十年在台阁，每有大制诏，促召公作。”足见孟初以文章为道宗、天祚两朝倚重，一时堪称国手。近 30 年间，皇帝凡有重要的诏命，必定召孟初起草，而孟初“纸札飞动，若不思虑。既成，则婉约可喜，往往播在人口。”

陈述辑校《全辽文》卷九，收录孟初所撰碑铭一篇，墓志两篇，诗一首。分别是：

1、寿昌二年（1096）《孟有孚墓志铭》。据《孟初墓志》，孟初时任乾文阁待制，权勾当史馆修撰事。



2、寿昌六年（1100）《燕京大昊天寺传菩萨戒故妙行大师遗行碑铭》。

《全辽》文只载《燕京大昊天寺传菩萨戒故妙行大师遗行碑铭》题目，未录碑铭文字及孟初之职衔。《日下旧闻考》卷五九：“按乾文阁待制孟初所撰《燕京大昊天寺传菩萨戒故妙行大师遗行碑铭》”。

墓志：“寿昌元年，起复史馆修撰，迁司勋郎中，尚书左司郎中，俄超授乾文阁待制，权勾当史馆修撰事。三年，迎伴南宋贺生辰人使，授知制诰，拜中书舍人。”

由墓志记载看，孟初撰《燕京大昊天寺传菩萨戒故妙行大师遗行碑铭》的寿昌六年（1100），其完整职衔应该是：文阁待制，权勾当史馆修撰事，知制诰，中书舍人。

3、天庆二年（1112）《萧公墓志铭并序》属“太中大夫左谏议大夫知制诰上轻车都尉平昌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壹佰户赐紫金鱼袋孟初奉敕撰”。

墓志：“（乾统）十年，改授知制诰，加左谏议大夫，进封开国公。天庆二年，提点大理寺，奉使南宋，寻受礼部侍郎，擢翰林侍读学士，□□提点大理寺，别诏经历馆阁文字。”

两相参照，《萧公墓志铭并序》所属职衔，应受职于乾统十年（1110）。《萧公墓志铭并序》应撰于天庆二年（1112）改职进官前，撰此文后任大理寺提点，受礼部侍郎，升翰林侍读学士，经历馆阁文字。

4、寿昌五年（1099）《玉石观音唱和诗》。据《辽文萃》



卷六，其全称是《玉石观音像石刻崇禄大夫检校太师行鸿胪卿普门大师赐紫据唱和诗碑》，由沙门智化作七律二首，孟初等24人，每人各七律一首。孟初为第13位和者，诗排第14。石刻原题“朝议大夫知制诰开国子孟初”。其诗云：

瑞毫辉映紫金台，镂石尊容焕赫哉。山卷碧雲呈玉骨，水摇白月晃珠胎。一枝杨柳光严住，百宝莲花影像来。珍重吾师承道荫，义林高耸豫章材。

这是今天惟一存世的一首孟初诗作。

马元俊和诗有：“天庆寺前一片石，造就观音神在哉。”知唱和诗碑在天庆寺。天庆寺在辽宁省朝阳县凤凰山上，始建于辽寿昌五年（1099）。知玉石观音像造于创寺之日，《玉石观音唱和诗》作于观音像落成之日。玉石观音像和《玉石观音唱和诗碑》均立于天庆寺附近的山坡上。今玉石观音像残存，诗碑已失。

总观孟初撰两篇墓志，墓主孟有孚为大理寺正，在辽代算是地位普通的官员，他督捕庆陵逃民时疽发，死在路上，时年50岁。

墓主萧义，则是赫赫后族，其祖先迪烈宁，乃辽太祖阿保机的姑表弟，阿保机后述律平的胞兄。萧义，字子常，为天祚帝岳父，官至北府宰相。其墓志载：“女三人，长为尼，赐紫，号慈敬大德。今皇帝赞睿德妃。即其次也。第三女适南面承旨耶律珪。乃皇家宗室之裔。”考《辽史》卷七十一·列传第一·后妃：“天祚德妃萧氏，小字师姑，北府宰相常哥之女。寿隆二



年入宫，封燕国妃，生子挾鲁。乾统三年，改德妃”。知萧义《辽史》作萧常哥，卷八十二·列传第十二有传。

寿昌五年（1099），凤凰山天庆寺落成并玉石观音像奉安，当寺住持崇禄大夫检校太师行鸿胪卿普门大师赐紫智化即兴赋七律二首，时僧人3人，孟初等大小官员21人唱和，为一时盛事。

昊天寺，在北京西直门外，西便门西，今圯。为秦越大长公主舍棠阴坊第改建佛寺，又舍香火地百顷，敕宣政殿学士王行己督工，道宗皇帝施钱五万贯缗，赐大昊天寺额，亲书寺碑。该寺清宁五年（1059）始建，清宁七年（1061）落成。孟初撰写《燕京大昊天寺传菩萨戒故妙行大师遗行碑铭》的寿昌六年（1100），大昊天寺落成 39 年。

孟初文迹遍及朝野僧俗，享誉道宗、天祚两朝。其文风质朴简约，娓娓道来，绝少华饰之辞，的确是文墨高手。墓志称赞孟初的文章“婉约可喜，往往播在人口。大率不务艰言苦思，亦常以此语开警后进。”可谓中肯之论。

他的书法也冠绝一时，墓志云：“其书入能书流，当时无与掎角。”可见，孟初是辽道宗、天祚之际屈指可数的书法大家。他喜酒好诗，“性得诗酒逸吟，醉之间别有遐韵。”饮至兴处，乘酒吟诗，意韵悠远，醉醒之间，别有一番情致。

孟初个性恃强，凡事不甘人后，这似乎的豪杰之士的共性。故墓志云：“常怙气，每事不欲在人后。”墓志赞许他“在理寺五年，剖决事讼，廷中服其明敢。”

墓志撰者对孟初战死沙场深感痛惜，赞其“以忠力死事”。



“夫高堂深屋，回辟官使，饮醇茹甘，因以首疾。一旦卧华皖床箠，左手提爱妻妾，右手弄美金玉，长噎而逝，止得没于正寝，谓之得礼，吾不信也。”这付于国家危难而不顾，醉生梦死的丑态，当是辽末契丹贵族生活的真实写照。对比之下，愈见孟初的可歌可泣。墓志这段文字，对后世认识辽末辽金争战之际契丹贵族的社会生态，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孟初娶司农卿吕庠之妹，孟初亡故时在世，封东平郡夫人。

弟孟裾，曾任阜俗县令。阜俗县，唐末契丹渐炽，将奚人迁居琵琶川。统和四年（986）在琵琶川置阜俗县，初隶辽景宗宫卫彰愍宫，后改隶中京道。后置州，仍属中京。统和二十六年（1008），以阜俗县置刺史州，开泰元年（1012）升置利州。仍属中京道，领阜俗县。治所即今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大城子镇。元废。

堂弟孟裕，曾任枢密户房主事、少府少监。户房主事，为枢密院最下级属吏。枢密院，属南面朝官。少府，少府监的简称，辽代中央机构。少府监一般设有：监一人，从三品；少监二人，从四品下。掌百工技巧之政。孟初的堂弟孟裕，由枢密院的一名下级小吏，最终升至少府少监，官至从四品。

孟初之子孟宝谦，内供奉班祇候。内供奉班祇候，《辽史》缺载，似是宫廷侍臣。孟宝谦娶孙氏，故殿中少监英毅之女。孙孟八斤。

孟初有一侄，孟宝臣，官西京神捷军副使。西京神捷军，应是西京大同府军号，副使，为该军副指挥官。应是一个中下



级武官。

四、名动王鼎 志出仲文

墓志中提到的王虚中，《辽史》有传^[10]。王虚中，名鼎，字虚中，涿州（今河北涿州市）人。自幼好学，在太宁山隐居数年，博通经史。辽太宁山，今称云蒙山，在易县城西 25 公里处，山上有古刹净觉寺，自东晋以来即是佛教和旅游胜地，历史上不少名人雅士隐居于此。当时马唐俊是燕、蓟一带著名的文士，适逢三月三上巳节，马唐俊与几位同道士子到河边行祓禊之祭，饮酒赋诗。王鼎偶然到场，唐俊见他土里土气，安排他坐在下首。想以做诗令他难堪，先拿自己的作品，请王鼎也做一首，王鼎提笔而就。唐俊惊叹于他的敏捷颖悟，便与他结为好友。清宁五年（1059），王鼎中进士。授易州观察判官，改涑水县令，累迁翰林学士。一时的制度法令大多出自王鼎之手。他上书进言十项治国之道，道宗皇帝因为王鼎通晓为政的根本，遇事经常向他咨询。王鼎正直不阿，别人有过错，必定当面批评。寿昌元年（1095），升观书殿学士。有一天在家里请客，酒后失态，与客人争吵，报怨皇上不了解自己，因此获罪受审。供状上达，道宗大怒，罚他刑杖，面额刺字，削去官职，流放到镇州。几年后遇赦，惟独王鼎不在赦免之列。适逢守臣召王鼎写贺表，王鼎顺便写诗赠给使臣，诗中有“谁知天雨露，独不到孤寒”之句。皇上听说后怜惜他，当即把王鼎召回，官复原职。乾统



六年（1106）去世。早年，王鼎在涑水任县宰时，在庭中休息，忽然刮起狂风，将卧榻悬到空中，只觉得枕头与床榻都在升高，王鼎毫无惧色，说道：“我是朝中正直之士，邪不犯正，可缓缓放下。”不一会儿，床榻回到原位，风也停了。

王鼎生前，对孟初倍加赞许。墓志云：“故观书殿学士王公虚中亦曰：‘此子不生，如吾道何？’其见重如此。”王鼎清宁五年（1059）进士，孟初大康九年（1083）进士，王鼎早孟初 24 年入仕，是孟初前辈。至王鼎乾统六年（1106）去世，孟初与鼎同朝为官 23 年。孟初天庆六年（1116。）孟初战死沈州，王鼎已已去世 10 年。王鼎称道孟初时，孟初尚为布衣之身，而王鼎为当朝名士。王鼎的话的大概意义是说：“倘若没有孟初，我的文道由谁来传承呢？”足见对孟初的器重和期许。孟初果然不负王鼎之望，其做为可与王鼎比肩。王鼎“当代典章多出其手。”孟初“三十年在台阁，每有大制诏，促召公作”。可惜由于后世史臣之疏，孟初正史无传。由此知，不见史册者，未必没有俊杰英烈，青史留名者，未必没有碌碌庸人，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墓志属：“昭文馆直学士知枢密直学士权翰林学士虞仲文撰”。虞仲文，辽末重臣。《史辽》有零星记载，《金史》有传^[11]。

虞仲文，字质夫，武州宁远县人。今属山西省忻州市神池县贺职乡宰相窠村。虞仲文幼年聪颖，7 岁能作诗，10 岁写文章，学习刻苦，日记千言。中进士第，累仕州县，以廉能称。举贤良方正，对策优等。擢起居郎、史馆修撰，三迁至太常少卿。



有位宰相被贬，同僚避之惟恐不及，惟独虞仲文为他饯行，有人诬他为同党，虞仲文退求养亲。后来被召来，官复原职。宰相在皇帝面前推荐他，称赞他文彩品行第一，权知制诰，除中书舍人。率兵讨平白霫，拜枢密直学士，权翰林学士，为翰林侍讲学士。保大二年（1122），金攻克辽中京（今内蒙宁城县），天祚帝出从南京（今北京）出逃，自鸳鸯泺逃往阴山自保。秦晋国王耶律淳在燕京（今北京）自立，废天祚帝为湘阴王，改元德兴。左企弓守司徒，封燕国公。虞仲文参知政事，领西京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内外诸军都统。是年十二月，金破南京，虞仲文、左企弓等降金，金委虞仲文为枢密使、侍中，封秦国公。金设枢密院于广宁府（治今辽宁省北宁市）。虞仲文、企弓等将赴广宁，途中要路过平州（治今河北卢龙县），金太祖发觉平州守将张觉有判金归辽迹象，要派兵护送，左企弓等人推辞，怕因此促使兵变。路过平州时，虞仲文宿于栗树林下，张觉遣张谦率五百余骑，召宰相左企弓、曹勇义、枢密使虞仲文、参知政事康公弼至滦河西岸，遣议事官赵秘校数十项罪名缢杀。

虞仲文卒年 55 岁。据此，虞仲文应生于辽道宗咸雍三年（1067）。孟初大康九年（1083）进士，虞仲文时年 16 岁，孟初似稍长于虞仲文。虞仲文自述为孟初撰写墓志的原因：“仲文与公旧同史局，知之为详，且从门人耶律少卿请铭。”史局，史书称史馆。原来孟初是虞仲文就职史馆时同僚，所于虞仲文对非常了解，又有孟初门人耶律少卿出面请托，虞仲文于是写



下这篇墓志。

虞仲文传中有“擢起居郎、史馆修撰”，而孟初于寿昌元年（1095），前后数年任史馆修撰。以寿昌元年（1095）计，虞仲文时年 28 岁。这是虞仲文与孟初在史馆为同僚的大致时间。

孟初阵亡的天庆六年（1116），虞仲文 49 岁。虞仲文为孟初撰写墓志的天庆七年（1117），恰逢他 50 岁。此后虞仲文经历的辽上京、中京、南京失陷，至保大二年（1122）年末，降金身死。史官叹道：“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四子者，皆有才识之士，其事辽主数有论建。及其受爵僭位，委质二君，隕身逆党，三者胥失之，哀哉。”（《金史》卷七十五·列传第十三）

附录：

大辽故翰林学士金紫崇禄大夫行尚书提点大理寺上护军平昌县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诸路汉军□□孟公墓志铭并序

昭文馆直学士知枢密直学士权翰林学士虞仲文撰

天庆四年，挹娄渤海秽种，首尾畔换。天子赫怒，方议翦覆，□□国中可与言兵者，得翰林孟公为副帅。师出不数月，捷问络绎不绝，赐御札嘉激。公率部下乘胜转战，直抵寇所窃邑。邑城漂摇，拔在朝夕。会天大雨，河水暴涨，班师驻浑州。贼出近甸，我师玩而无备，公马还泞，殁于贼中。天子闻之震悼，诏赠宣政殿学士，赐其子寔谦内供奉班祇候。天庆七年十一月



一日，作招魂辞，具衣衾，葬于良乡县房仙乡重义里。公讳初，字子元，世为上谷龙门人。皇曾祖彬，不仕。皇祖克忠，不仕。父载，故开远军节度副使，官至将作少监，为时闻人。公生七岁，善属文，读书经目便诵。尝夜于闇室中，见押韵注字，知者以为精神发于文字中，他日不减词翰器。道宗宣懿皇后召试诗，诗成，赐金赏之。当时名公争与推挽，如故翰林学士杨公辅之，称有崖岸，一见许为忘年交。故观书殿学士王公虚中亦曰：“此子不生，如吾道何？”其见重如此。大康九年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大安二年，授涿州军事判官。三年，徙永州观察判官。六年，知劝农县事，举制策入优等，超授右拾遗。未几，授史馆修撰应奉阁下文字，加尚书左司员外郎。丁母忧，差中京银绢库都监。寿昌元年，起复史馆修撰，迁司勋郎中，尚书左司郎中，俄超授乾文阁待制，权勾当史馆修撰事。三年，迎伴南宋贺生辰人使，授知制诰，拜中书舍人。今上即位，诏使高丽，为其国王生日。乾统三年，同知礼部贡举。举人中不逞辈，造作谤语。上虽素知公无是过，不得已而罢所居官。四年，起为乾文阁待制。八年，充昭文馆直学士，职如故。十年，改授知制诰，加左谏议大夫，进封开国公。天庆二年，提点大理寺，奉使南宋，寻受礼部侍郎，擢翰林侍读学士，依前提点大理寺，别诏经历馆阁文字。十二月，管押中京路汉军，戍黄龙府。五年，扈驾东征勾当诸路汉军。六年，授翰林学士，仍提点大理寺。公生平为文章，敏而有法，自布衣时，声艳□□。三十年在台阁，每有大制诏，促召公作，纸札飞动，若不思虑。既成，则婉约



可喜，往往播在人口。大率不务艰言苦思，亦常以此语开警后进。其书入能书流，当时无与持角。性得诗酒逸吟，醉之间别有遐韵。常怙气，每事不欲在人后。在理寺五年，剖决事讼，廷中服其明敢。初朝廷闻公讣，士大夫知与不知，嗟惜惋悼，皆曰：“公以忠力死事，与夫高堂深屋，回辟官使，饮醇茹甘，因以首疾，一旦卧华皖床箒，左手提爱妻妾，右手弄美金玉，长噎而逝，止得没于正寝，谓之得礼，吾不信也。使后世识者覆校史事，必有去取。”娶故司农卿吕庠之妹，今封东平郡夫人。故阜俗县令讳裾者，公之母弟。故枢密户房主事少府少监讳裕者，公之从弟。子宝谦，内供奉班祇候，娶妻孙氏，故殿中少监英毅女。孙一，八斤。侄一，宝臣，西京神捷军副使。仲文与公旧同史局，知之为详，且从门人耶律少卿请铭。铭曰：

物有五材，自天之生。去一不可，谁能去兵。谓不当用，世儒恒评。维公文武，不以之名。翰林大笔，将军长纓。海徽秽俗，鷓张孤鸣。天子赫怒，诏公徂征。我公之来，弓长剑轻。啾啾征车，悠悠旆旌。忠作甲冑，谋为干城。可不数日，犁贼之庭。天未厌乱，殒雨如抨。九仞之功，墮于垂成。凡在有心，谁不涕零。马革裹尸，古人壮之。公今神魂，何斯违斯。敢告文士，为招魂辞。魂之来思，不可度思。传言后来，请刻此诗。

注：

[1] 中华书局出版 1974 年 10 月第 1 版，1974 年 10 月第南宁第 1 次印刷。本文所引《辽史》均为此版本。



[2] 中华书局 1984 年 6 月第一版,2010 年 12 月 5 印。“唐宋史料笔记”丛书之一。许德楠、李鼎霞点校。

[3] 见《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年 12 月第 1 版,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4] 《宋史》中华书局出版 1977 年 11 月第 1 版,1977 年 11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第 10820 页。

[5] 见《辽史》第 326 页。

[6] 见《金史》中华书局出版 1975 年 7 月第 1 版,197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卷二·本纪第二太祖:

九月,太祖进军宁江州,次寥晦城。婆卢火征兵后期,杖之,复遣督军。诸路兵皆会于来流水,得二千五百人。致辽之罪,申告于天地曰:“世事辽国,恪修职责,定乌春、窝谋罕之乱,破萧海里之众,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疏,屡请不遣。今将问罪于辽,天地其鉴佑之。”遂命诸将传挺而誓曰:“汝等同心尽力,有功者,奴婢部曲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进,轻重视功。苟违誓言,身死挺下,家属无赦。”师次唐括带斡甲之地,诸军襁射,介而立,有光如烈火,起于人足及戈矛之上,人以为兵祥。明日,次扎只水,光见如初。将至辽界,先使宗斡督士卒夷堑。既度遇渤海军攻我左翼七谋克,众少却,敌兵直犯中军。斜也出战,哲垓先驱。太祖曰:“战不可易也。”遣宗干止之。宗干驰出斜也前,控止哲垓马,斜也遂与俱还。敌人从之,耶律谢十坠马,辽人前救。太祖射救者毙。并射谢



十中之。有骑突前，又射之，彻扎洞胸。谢十拔箭走，追射之，中其背，饮矢之半，僂而死，获所乘马。宗干与数骑陷辽军中，太祖救之，免胄战。或自傍射之，矢拂于颞。太祖顾见射者，一矢而毙。谓将士曰：“尽敌而止。”众从之，勇气自倍。敌大奔，相蹂践死者十七八。撒改在别路，不及会战，使人以战胜告之，而以谢十马赐之。撒改使其子宗翰、完颜希尹来贺，且称帝，因劝进。太祖曰：“一战而胜，遂称大号，何示人浅也。”进军宁江州，诸军填堑攻城。宁江人自东门出，温迪痕、阿徒罕邀击，尽殪之。

十月朔，克其城，获防御使大药师奴，阴纵之，使招谕辽人。铁骊部来送款。次来流域，以俘获赐将士。召渤海梁福、斡答刺使之伪亡去，招谕其乡人曰：“女直、渤海本同一家，我兴师伐罪，不滥及无辜也。”使完颜娄室招谕系辽籍女直。师还，谒宣靖皇后，以所获颁宗室耆老，以实里馆贖产给将士。初命诸路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酬斡等抚定谗谋水女直。鳌古酋长胡苏鲁以城降。

十一月，辽都统萧紉里、副都统挹不野将步骑十万会于鸭子河北。太祖自将击之。未至鸭子河，既夜，太祖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鸣鼓举燧而行。黎明及河，辽兵方坏凌道，选壮士十辈击走之。大军继进，遂登岸。甲士三千七百，至者才三之一。俄与敌遇于出河店，会大风起，尘埃蔽天，乘风势击之，辽兵溃。逐至斡论泺，杀获首虏及车马甲兵珍玩不可胜计，遍赐官属将士，燕犒弥日。



辽人尝言女直兵若满万则不可敌，至是始满万云。斡鲁古败辽兵，斩其节度使挾不野。仆虺等攻宾州，拔之。兀惹维鹘室来降。辽将赤狗兒战于宾州，仆虺、浑黜败之。铁骊王回离保以所部降。吾睹补、蒲察复败赤狗兒、萧乙薛军于祥州东。斡忽、急塞两路降。斡鲁古败辽军于咸州西，斩统军实娄于阵。完颜娄室克咸州。

[7] 见《金史》中华书局出版 1975 年 7 月第 1 版，197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卷二·本纪第二太祖：

收国元年正月壬申朔，群臣奉上尊号。是日，即皇帝位。上曰：“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国号大金，改元收国。丙子，上自将攻黄龙府，进临益州。州人走保黄龙，取其余民以归。辽遣都统耶律讹里朵、左副统萧乙薛、右副统耶律张奴、都监萧谢佛留，骑二十万、步卒七万戍边。留娄室、银术可守黄龙，上率兵趋达鲁古城，次宁江州西。辽使僧家奴来议和，国书斥上名，且使为属国。庚子，进师，有火光正圆，自空而坠。上曰：“此祥征，殆天助也！”酌白水而拜，将士莫不喜跃，进逼达鲁古城。上登高望辽兵若连云灌木状，顾谓左右曰：“辽兵心贰而情怯。虽多不足畏！”遂趋高阜为阵。宗雄以右翼先驰辽左军，左军却。左翼出其阵后，辽右军皆力战。娄室、银术可冲其中坚。凡九陷阵，皆力战而出。宗翰请以中军助之。上使宗干往为疑兵。宗雄已得利，击辽右军，辽兵遂败。乘胜追蹙，至其营，会日已暮，围之。黎明，辽军溃围出，



逐北至阿娄冈。

[8] 见《辽史》第 333 页。

[9]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卷五十史部六〇别史类。

[10] 《辽史》卷一百四·列传第三十四·文学下。第 1453-1454 页。

[11] 《金史》卷七十五·列传第十三。第 1723-1727 页。

杨亦武，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物考古与鉴定专业。北京史研究会理事，曾从事文物工作、地方志工作、政协文史工作。四十年来从事北京地方文化研究，辽金史研究。著有《大房山金陵考》《房山历史文史研究》《房山碑刻通志》（八卷）。



琉璃河与琉璃有什么关系？

顾梦红 *

自从《房山村落文化》一书问世以来，我在许多乡镇和单位举办《房山乡土文化》的系列讲座。许多朋友特别喜欢探究自己家乡的地域文化，经常听到这样的提问：阎村、闫村、沿村，哪个名字最准确？坨里的“里”是什么意思？琉璃河与琉璃有什么关系？

琉璃河是大石河下游自芦村以下河段的名称。大石河发源于百花山西麓的霞云岭乡堂上村西北二黑林山。经霞云岭、佛子庄、河北庄、磁家务，从辛开口村流出山谷，经过坨里、马各庄、夏村跨过平原，越过城镇，从琉璃河镇的祖村出境，至涿州码头镇与北拒马河汇合注入白沟河进入白洋淀。大石河滋养了两岸的沃土肥田，是房山人民的“母亲河”。

为了探究琉璃河与琉璃的关系，我查阅了相关史籍与今人的著述，寻访当地的乡亲耆老；对以下几种名称进行了初步考证。籍此就教于方家学者。

一、燕水 ——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今天的大石

* 顾梦红：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教师



河古称圣水，琉璃河地区曾经是古燕都城，源于燕山之阳各泉溪之水汇聚于此。琉璃河镇古称燕谷店，因此历史上琉璃河还有燕水之称。

二、刘李河——《房山县志》记载，琉璃河历史上曾经称“刘李河”。因河北岸有刘李店村，宋辽已成村，居住有刘、李二大姓村民，且因为刘、李两姓有人于河岸开店而得名。故称刘李河。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四十里琉璃河镇，亦名刘李河镇，又曰燕古店，把总驻焉，有铺。”这里所说的四十里，是指琉璃河镇与良乡城相距四十里。“有铺”说的是清代这里商旅云集，铺店相连。“把总”指河上运输繁忙，朝廷设的掌管水域及税收机构的官员。此论既有历史依据，又有乡土文化，于情于理都讲得通。

三、六里河——《良乡县志》记载有六里河之称。房山区境内地名、村名中有一些以距离某处的华里数目为名的，如十三里，七里店等等。但是琉璃河距离什么地方六里？既不是良乡，也不是涿州。这个名称应该属于近音讹传之误。其实，在南宋范成大《琉璃河》一诗的诗末有自注：“此河大中祥符间路振《乘轺录》亦谓琉璃河，惟嘉祐中宋敏求《入番录》乃谓之六里河，大抵胡语难得其真。”。“胡语”是古时候对少数民族语音的蔑称。今天分析，是语音的讹传，可能是外来人士把刘李河的谐音而误传为六里河了。

四、回城水——《太平寰宇记》卷 69 云：圣水。《郡国志》云



“俗名回城水，源出县西北玉石山，东流经县北四里，又南流入范阳县界。这里的圣水指大石河，回城水是琉璃河另一个别称。今天琉璃河镇的洄城村，即因水而得名。

五、琉璃河。这是近千年来的通用名称，指大石河自芦村以下的河段。这个名称的来历有以下几种说法。

1、此地生产过琉璃瓦。一位年过花甲的琉璃河本土人士告诉我，他曾经听过北京电视台北京史的节目讲过：“琉璃厂生产琉璃瓦，后来搬到琉璃河，琉璃河由此得名”。这位先生还说，1970年，考古队的人在琉璃河中学给我们学生讲了一堂课，说琉璃河就因为发大水冲出了很多琉璃瓦，才改名琉璃河。

琉璃是古人冶炼青铜时意外发现的，传说公元前493年，越国名臣范蠡为越王督造王者之剑，从矿渣中发现了琉璃，因其色彩斑斓，便与剑一起献给了越王，越王赐名为“蠡”，并将其又赏赐给了范蠡，后范蠡将它制成首饰，赠给西施。西施赴吴时，泪水滴在“蠡”上，日久天长，人们可见首饰中似有泪光流动，故名为“流蠡”，以后讹为琉璃。根据《中国古建筑琉璃技术》介绍：琉璃在古代是琉璃、玻璃料器的通称。《西京杂记》记载西汉后期的汉成帝为宠妃赵飞燕所造的昭阳殿上第一次出现了琉璃在建筑上装饰，可以视为琉璃用作建筑装饰的发端。唐代经济繁荣，是琉璃的烧造技术的黄金发展时期。琉璃瓦被广泛应用于皇家建筑，韦应物《咏琉璃》中有“有色同寒冰，无物隔纤尘”，赞颂了琉璃之美。北宋的釉陶砖瓦烧造技术和产量都有很大提高，金灭北宋时，从汴京掠夺了大批



工匠，1151 年修建金中都，宫殿大量使用琉璃瓦作整体装饰。咱们房山的九龙山金陵遗址也出土了金代龙纹绿琉璃瓦。北京宫殿陵寝建筑大规模的使用琉璃瓦，必然促进了北方琉璃瓦烧造的迅速发展。琉璃瓦大发展的元大都建设时期，元世祖将山西榆次县南小赵村的赵氏琉璃窑迁到北京宣武门外海王村，即现在北京琉璃厂，称为内厂，专门生产琉璃瓦供营造宫殿使用。琉璃厂的生产显然供不应求，于是在北京西部的龙泉镇琉璃渠村建造新的窑场，称为外厂。

明代北京城的营造使得琉璃瓦的制作水平达到巅峰。九龙壁与十三陵都是琉璃瓦建筑史上的杰作。明代修建紫禁城、太庙以及内城城门楼，坛寺，行宫、陵墓都需要巨量琉璃瓦。为此，明代工部专设五大御用厂，即负责筹措木材、砖瓦等施工材料。其时城内的琉璃厂已经失去生产的功能，成为文人墨客的聚集地。明代在京西设置琉璃局，即今天门头沟区的琉璃渠村。而查阅明代史籍及明清时期的房山、良乡县志，并没有在房山设立琉璃瓦窑厂的记载。

2、桥上有霜雪，如琉璃一样光滑，有文天祥的诗为证。确有此事。1279 年初冬，文天祥抗元兵败，从伶仃洋押解大都。途径琉璃河，感怀山河破碎，身世飘零而赋诗：“小桥度雪度琉璃，更有清霜滑马踪。游子衣裳如铁冷，残星荒店野鸡啼。”那时的小桥显然不是今天的大石桥。然而查阅史料，发现早在文天祥赋诗 200 多年前的北宋初期，就有琉璃河的称呼了。

3、琉璃河的名字最早出现在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比文天



祥更早的南宋文学家范成大出使金国时写诗描写北方景物，其中有《琉璃河》一诗，曰：“烟林匆蒨带回塘，桥眼惊人失睡乡。健起褰帷揩病眼，琉璃河上看鸳鸯。”，诗末有自注：“此河大中祥符间路振《乘轺录》亦谓琉璃河。大中祥符是宋真宗年号（公元 1008—1016）。路振的《乘轺录》当年是奉命出使契丹后所写的见闻。文中提到：七日，自涿州北行至良乡县六十里，道微险，有邱陵。出涿州北门，过涿河。河源出太行山，与巨马河合流。五里过胡梁河，四十里过琉璃河，又云“刘李河”。”为什么把刘李河改称琉璃河呢？1000 多年前路振解释说是由于河水“澄清澈底，朗若琉璃”，“以形色相转注”，于是改“刘李河”为“琉璃河”。

至此我们明白了，之所以称为琉璃河，是因为灿烂的阳光照射着清澈的河水，五彩霞光辉映在河面上，朗若琉璃。所以后人以形色艳丽而将刘李河转注为琉璃河。既文雅形象又便于记忆传播。路振的说法距今已经有一千年了。这应该是最早且最权威的解释了。正如《良乡县志》所言：“琉璃河之名古矣，金史刘李河之名可不必从。”



毛一麟碑

赵晓鹏 成 凯 *

房山区不仅是文物大区，还是碑刻大区，目前已发现碑刻达 800 余件，数量居北京各郊区之首。我和成凯同志喜好名碑旧碣，经常踏寻古迹，收集旧碑、摩崖拓片。在共同研究的同时，我们关注到房山区河北镇黄土坡村有一座鲜为人知的清代墓葬——毛一麟墓，当地人称之为“毛公坟”。目前，墓地仅存墓碑，但该碑有几点不同寻常之处：碑文由黄宗羲第三子黄百家撰文；著名书法家陈奕禧书丹；文中提到了榆园农民军张七、吴三桂、“海寇”郑成功等多位著名历史人物；还涉及到清初的行政划分，即：甘肃临洮和陕西的行政关系、江苏、安徽两省的由来等，极具历史研究价值。

毛一麟何许人也？根据碑文所载：毛一麟字瑞趾，号圣兆，辽阳广宁卫（辽宁省锦州北镇市）人，生于 1631 年 6 月，这一年已是后金与明朝发生广宁之战（明天启二年（1622 年）之后的第九年，即明崇祯四年。广宁一战，明军大败，辽西土地

* 赵晓鹏：房山区工业园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综合管理部部长

* 成 凯：房山区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科长



尽失，后金政权将势力范围推到了辽西广宁城（今辽宁省北镇市），也就是毛一麟的出生地一带。这一时期，皇太极为便于管理加入后金政府的汉族人、明军士兵以及汉化的女真人，建立了汉军制度，即用满族的管理模式去管理这一特殊群体，毛一麟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编入汉军旗人之列。所以确切地说，他出生在后金天聪五年。毛一麟的高祖名毛英，曾任明朝指挥僉事。其父高世富，以子贵诰封资政大夫。毛一麟在 17 岁（顺治四年、公元 1647 年）时以贡生授开州知州（从五品）；顺治八年任汉中知府；十三年，任陕西临巩兵备道副使（从四品或五品）；十四年转任山东布政司登莱道参政，十五年，任浙江提刑按察使（正三品）；十六年，迁江南布政使司右布政使（从二品），值清朝初创期间，各省设承宣布政使，并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作为督抚属官，负责赋税、民政等事务。从政期间，毛一麟为官“多有奇猷”，深受当地百姓爱戴。顺治十八年（公元 1661 年），因“会失重臣”，被朝廷罢官，仅 30 岁。当时正值年富力强，但他决计不再复出，此后终身未再出仕。这样的骨气，可算是陶渊明一样的人物。他于康熙康熙十八年六月（公元 1679 年）逝世，年仅 49 岁（实龄 47 岁）。

毛一麟逝世后，其实并未立即下葬，根据碑文，其子毛文铨主持为他立碑时，仅“葬之三年”，即毛一麟卒后九年才埋葬，其缘由已不得而知。按照北方地区习俗，新坟三年内不宜添土、不宜立碑，所以葬毛一麟三年之后，毛家人于康熙三十年才为他刻石立碑。根据《京郊清代墓碑》（杨海山著）一书所载，



毛公坟原不在黄土坡村，而是位于磁家务村庄亲王陵寝的附近，后来因为王坟需要扩建，庄王府与毛家商议，出资将其墓迁至现今的黄土坡村。

毛一麟碑为青石材质，是典型的清代官员墓碑制式，自上而下由碑首、背身、碑担、龟趺和水盘构成。碑首为双螭首造型，碑额无字；碑阳是碑文，碑阴无字，前后均有边框，雕刻云龙纹；碑额、碑阴无字的情况，是由于毛一麟为罢免之官，所以卒后没有受到朝廷赐祭葬、祭文等待遇，因此与官员的墓碑有所区别。碑侧和碑担两侧也为素面，“碑担”就是龟趺与碑身连接的长方形部位，“龟趺”即龟形碑座。龟趺有个专门的名字叫“螭趺”，通常根据龟趺的形制可判断刻碑的年代。毛碑的龟趺造型生动，雕刻细腻，龟趺头部五官端正，造型浑圆，是典型的清早期作品。在石雕墓碑中，龟趺源于东汉，一直延续到宋代，都是贴近写实风格，比较符合自然之形。之后逐渐艺术化、繁缛化，头部的刻画更倾向于龙形。在清代，石雕艺术水平达到顶峰，龟趺基本在康熙时期定型，头部多为闭嘴狰狞状，也有张口怒吼状（王爷陵寝居多）。到乾隆时期造型略显夸张，庞大、突鼻。在光绪之后，雕刻更为复杂，但略显死板。龟趺的尾尖主要有两种形制，一种是分尖尾，比较少见，一种是圆尾，在清代普遍使用，毛一麟墓碑就是圆尾形状。龟趺下是水盘，即石质长方形基垫，上面雕刻海浪、水族等，地位较低的人墓碑则没有水盘。毛碑的水盘已埋没，未知是否有图案。墓碑的形制逐渐成为体现墓主身份的标志，在明清时期，



五品官以上许用碑，龟趺螭首。根据清顺治年间定立的王公百官墓碑之制：二品官与辅国将军同，碑身高八尺，广三尺二寸，麒麟首龟趺，首高二尺八寸，趺高三尺四寸，碑价银三百两。毛碑厚 0.4 米，文字部分高 1.65 米，宽 1.06 米；龟趺首高 1.15 米，长 2.52 米，宽 1.1 米，以尺换算，可以得出结论，该碑是按照二品官规格刻制的。

碑阳正文是陈奕禧所书，全文共 14 行，首题：“皇清资政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圣兆毛公墓碑记”。我们知道，通常墓碑的碑文使用唐楷，以示庄重，而此碑则用行书书写，也是较为少见。历史上，行书入碑古已有之，唐代李世民首创行书入碑之先，后来风气渐开，产生了许多行书入碑的书法碑刻作品，如李邕写的《李思训碑》就为历代书家称道。毛碑上陈奕禧的行书，字体平淡清新，遒逸灵秀，实是一篇难得之作。此碑以行书书写，其实既有它的特殊性，即对毛一麟甘做孤鹤，超脱世事的一种风度的崇敬，也彰显了书法家个人张扬个性的心态。这位陈奕禧是清初很有名的人物，他是浙江海宁人，字六谦，与姜宸英、汪士鋐、何焯被并称为“康熙书坛四家”。他率先提倡学习北碑，追求魏晋书风，在明末清初书风转变中，扮演着承前启后的角色，其书体被称为“香泉体”。康熙帝曾十分欣赏他的书法，破格将他召入南书房，陈奕禧后来出任江西南安知府等职。他好古成癖，收集集大量秦、汉、唐、宋金石书画，并精勤钻研，为书法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一生传世书法、书论很多。他初学董其昌，但下笔却另辟蹊径，后期



学习晋唐、宋人，对米芾的取法尤多。他的书法观念延续着有明一代至清初的特点，即带有很大随意性，写字常常有意欹侧跌宕，但不足之处是只留心字样而缺少对笔法的体悟，故同时期的书法家杨宾评价说：“香泉气味好，作小楷稳称。但留心字样，而不知笔法，故媚而少骨。”但无论如何，陈奕禧延续了明代草书书风，对碑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对后世产生影响是深远的。

黄百家是“中国思想启蒙之父”黄宗羲的第三子，浙江余姚人，原名百学，字主一，号不失，是明末清初的武术家、历法学家、经学家。黄百家深受其父的影响，兴趣广泛，博览群籍，正如他的名字一样，百家都通，百学不失。他在天文学、胚胎学、医学、武术方面均有所建树，《明史·历志》八卷就是黄百家的稿本，他撰写的《句股矩测解原》二卷编入《四库全书》。黄宗羲曾撰《宋元学案》，完成17卷时去世，他和全祖望共同续成100卷。此外，还著有《内家拳法》、《明文授读》、《体独私钞》、《王刘异同》、《夷希集》等。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黄百家进京参加明史的编撰，次年携书回家编写，二十九年（1690年）再次进京编写《明史·历志》，次年四月编成。因为其父年老力衰，黄百家辞职回到南方。从碑文中可知，康熙三十年，黄百家留京编写明史期间，受友人毛一麟之子毛文铨委托，撰写碑文。黄百家在碑文中称毛文铨为郡司马，因在当时毛文铨为候补府知同，为什么称为“郡司马”呢？明清之际，“司马”是“知同”的雅称，“知同”也就是知府的



副职。毛文铨在康熙三十年是候补知同，后于康雍年间先后任江南按察使、云南布政使、贵州、福建巡抚等职，雍正年间，由于受到闽台财政改革与满汉官员权力纠葛的影响，在台湾知县周钟瑄案中受到牵连。

由于毛一麟去世较早，加之当时毛文铨尚幼，所以“遗事散亡”，黄百家仅根据毛一麟夫人口述撰写了他的一些事迹。黄百家在碑文中写到：“这样的文章（指为毛一麟撰写碑文），应该是由官方来做，文铨请范阳布衣杜郊写志，又嘱托黄百家书丹，一定是有所祈求。”这句话流露出些许恭维和善意的解释。毛一麟 30 岁罢官，在乡赋闲 17 年“不计复出”，早已不是官僚阶级中的一员，因此他去世后，不能享受到朝廷恤葬的待遇。但毛一麟曾任二品官员，也曾为国家效力，毛文铨长大成人并建功立业后，有了一定的实力，为缅怀其父，彰显其事迹，仍以同等的墓葬规格对他进行了安葬，但由于不是敕建，就形成了碑额、碑阴无字的情况。

碑文中提到江南省分治，是源于毛一麟的建议。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清代有着“天下英才，半数尽出江南”之说，所谓江南，指的是江南省。蒙元时期，实行行省制度，明朝延续，江南省在明朝时名为“南直隶”，清政权建立后，改南直隶为“江南省”。其范围相当于今天的江苏省、上海市、安徽省以及江西、湖北、浙江等省的部分地区。在当时是全国经济最繁荣、文化最昌盛的地区之一，不仅一省赋税居全国之冠，而且全国每期科考近一半的上榜人员均来自江南省，于是就有了“天下英才，



半数尽出江南”之说。清初期，国家尚未完全统一，女真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根基不稳。南明政权的势力不容小觑，民间组织“反清复明”的抵抗运动使清朝统治者感到压力。江南省作为全国的主要财源和人才库，其稳定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为了改变“逋积会淆，吏缘中饱，官民交困”的处境，毛一麟提出了分治的方案，经上级官员奏请后，顺治皇帝决定将江南省分而治之，将江南省拆分为“江南右”与“江南左”。加强管理，防止有势力利用江南省的富裕作大作强危及朝廷。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江南右”取江宁府（今南京市）、苏州府首字，改称为江苏省；“江南左”取安庆府、徽州府（今黄山市）首字，称为安徽省，可以说对两省划分，使“江南无鞭长之虑”，毛一麟有着很大的贡献。

毛一麟碑是带有清早期特点的一座官员制式墓碑，碑文的文学和书法艺术代表了那一时期的特点，从碑中也可见清朝初创时期的一些历史史实、改革事件以及清代的官制变化，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

附：皇清资政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圣兆毛公墓碑记

圣兆毛公既葬之三年，为康熙辛未。姚江黄百家以史事留京师，子郡司马文铨俾记公墓石。谨按，公讳一麟，字瑞趾，号圣兆，辽阳广宁卫人。高祖讳英，起家指挥僉事。父讳世富，诰赠如公官，母蔡封夫人。公生而颖敏，顺治丁亥十七以贡授开州知州，剔抉猾蠹，震慑豪强。剧盗张七作乱，公身练士卒，且剿且抚，卒讨平之。辛卯迁汉中知府。汉中时为吴三桂所镇，



兵马络绎，民苦徭役，公议请浚驿，费岁万金。丙申擢陕西按察司副使，整饬临洮道。丁酉移山东布政司参政，防海登莱。戊戌迁浙江提刑按察使。公甫行，值海寇破镇江、寇江宁，人情汹汹，公不为少沮，慷慨击楫，进舟丹阳，思召募，为声援。会贼败拒任成平，欲藉民屋以居，白昼鼓噪，上下束手。公持牛酒，密结大将军，严令禁之，民获安堵。江南财赋号天下半，左右藩并驻会城，逋积会淆，吏缘中饱，官民交困。公议剖上下江地，俾两藩分理之，督抚上公计于朝。于是移右于苏，两藩分设自公始。辛丑会失重臣。意罢归时，公年甫壮，即不计复出，怡然自海。见二十一史多残□，补而序之。康熙己未六月 日卒，距生于天聪辛未六月 日，得年四十有九。元配张氏封夫人。公天性仁慈，才识敏达，历政所至，多有奇猷，故其罢归江南也，百姓多焚香涕泣送之。逝世时，嗣子尚幼，遗事散亡，所得于母夫人之口者，仅如此。顾公之知开州也，当国家初建，民志未孚，开为畿甸地，东西连接豫兖，巨寇出没剽掠，远近骚然。公以英年筮仕，即能以弹丸之力，使渠魁授首，三辅用宁。暨江南又能创兴硕画，分藩分臬。顺治十八年移右布政使，驻苏州；康熙三年又分南北按察使；五年奉停按察使，南北布政使左右之名，改左藩北臬为安徽等处，右藩南臬为江苏等处。俾江南无鞭长之虑，是公之设施。即此足以略睹其概矣。子一，即文铨，副室杨宜人出，候补府同知。女四，长适汉川知县佟世茂，次适江□府同知迟炳，次适候补州同知杨威，次适候补笔帖式赵玠。孙女二。窃思文章之事，当世必归台阁。



公之葬，文銓既求范阳布衣杜郊为之志，而丽牲之石复属于百家，文銓必有取尔也。百家不敢辞然滋惧矣，敢以浮词相诘乎。

直隶保定府祁州深泽县知县海宁陈奕禧书。



一代高僧姚广孝在房山的足迹

赵永祥*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文脉是城市历史记忆的延续，也是城市发展的导向。随着《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发布，推进“长城文化带”“运河文化带”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作为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交流展示窗口，“西山文化带”有着极高的历史地位与综合价值，被誉为北京的“文明之源”“历史之根”和“文化之魂”。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对推动“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人文历史和北京史的研究、发挥拥有巨大潜质的文化资源的优势和影响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房山区作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西南起点，历史文物众多，文明积淀厚重，有着“人之源”、“城之源”和“都之源”之称。虽然区内文化元素和承载主体有着多元化、散布广的特点，很难有效地凝聚，但如果我们把各个孤立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节点串联起来，归纳成有效的知识体系，梳理出清晰的文化脉络，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和

* 赵永祥：房山区政协副主席



政治文化发展状况。

2019年，在区政协组织“实施文旅融合发展战略，打造房山国际旅游金名片”重点协商议题的考察、调研工作中，我注意到，明代僧人姚广孝的名字在本地史志、碑刻中多次出现，这位有着“黑衣宰相”之称的神秘人物，在房山的土地上留下了诸多遗踪，如：奉旨视察石经山，题诗雷音洞；奉诏修护金太祖陵，感而作诗；辞归山林，隐于太湖山；受赐香光寺，作为别墅；卜地西山，石府村东原（常乐寺东）砬石建塔；造访佛教圣地上方山，咏诗《上方》；驻足拒马河畔，留下《拒马河》诗等等。由此可见，他与房山有着特别的情缘，所留下的遗迹也充分抒发了他对房山这片京西奇境的热爱。

姚广孝（1335—1418），明初谋略家、政治家、高僧。他的故事广泛存在于史书、笔记以及评书、民间传说中。他生于元末，原籍江苏长洲（今江苏省吴县），医家出身，十四岁在苏州妙智庵削发为僧，法名道衍，后拜灵应观道士席应珍为师，学习阴阳术。精通三教及兵、医、卜等诸家之学并善诗文。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8月，值朱元璋为马皇后超度法事的机缘，时年47岁的道衍与22岁的燕王朱棣相遇，此后追随朱棣步入政治生涯，“先几效谋，出入帷幄”，成为“靖难之役”力助朱棣称帝的第一功臣。朱棣许以高官，被他婉言谢绝，仅出任僧录司左善世（六品）之职。朱棣于心不忍，特授其资善大夫，又加太子少师，复姚姓，赐名广孝。姚广孝在迁都规划北京城、纂修《永乐大典》、监修《太祖实录》等事件中发挥



了重大作用，并在很多行业也都有所建树。他功成名就却淡泊名利，低调行事，不蓄发，不置房屋、妻妾，常居僧寺，袭缁衣，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靖难”之后，姚广孝年近古稀，实现了人生理想，可谓志得意满。永乐二年（1404）六月，朱棣有意让他借苏湖赈灾之机衣锦回乡。一路上“钦奉朝命，威声赫赫，车从甚盛”很是风光。然而还乡的兴奋，也带来了怅然。途中他被人“丑诋”；两次看望姐姐，姐姐拒不相见；拜访友人王宾，王宾也不肯相见，后来虽然见面，却受到“致宗室伤残，血流漂杵……皆由汝佛口蛇心”的切齿谴责。至使他“闻之面赤，赧然求退……怏怏自恨而去”。这多方面的刺激，直击灵魂的拷问，他无言以对，难辞其咎，委屈和忏悔交迭，其煎熬的心境可想而知。在时人眼里，“靖难之役”中姚广孝虽未亲自指挥征战，但他不遗余力为燕王效劳，篡权谋位，无疑是助纣为虐，悖逆民心；另一方面，在民众看来，他身为僧人，不守清规，贪图功名，不耐清静，不讲仁义，其行为显然与佛理背道而驰，虽然未直接杀人，然挑起三年战争，间接伤人之多又何止百万。《建文皇帝遗迹》中说“广孝初心既许文皇谋图帝业，功既大扩，事业已定，然居常辄自悔以咎”。回乡的打击，特别是见过王宾后，对姚广孝内心触动很大。此后他反省自己，心性收敛，很少上朝，而是潜心著述，在佛理中寻求安逸。这也许是他逃避纷扰的现实社会，选择深山幽谷隐居的原因。然而他心系尘缘，却身在朝廷。出仕与退隐的矛盾仍然不可调和，选择在京城附近隐居



显然是折中的办法。房山这块地方有什么吸引他的，使得他身居燕地期间隐于斯，死后又葬于斯呢？那还得从房山的地容地貌说起。房山自古以来就以环境秀美安静而著称，大房山属于燕山山脉，位于所谓“中华北龙”主龙脉之上，因其明秀挺拔、林木掩映，古称：“幽燕奥室”。（民国十六年房山县志载：“幽燕奥室，又曰峻而且阔、望之明秀异常，宛然如室。”）在明代，房山还是北京通往南方的必经之路。姚广孝担任僧录司左善世，掌管天下佛教事务，选择在房山居住，既有利于避世，又有利于清理教务的交通方便。如今，时过境迁，我们已无从考证其晚年的心态，不妨来探讨一下他的所经之处：

一、房山石经山

石经山在云居寺东二里处，本名白带山，又称芯题山，唐时名涿鹿山，俗称小西天，是房山石经刊刻的起源地，也是佛祖舍利出土之处。自从魏武周武先后灭法后，佛门弟子深恐书籍易毁，佛经失传，隋代僧人静琬决意继承其师南岳慧思大师的遗愿，誓言刻经卷成石碑，遂于大业年间（605～617），在隋炀帝皇后及其弟萧瑀的协助下，于涿州白带山（今北京房山）山麓开凿岩洞，并在石室四壁刻上经文。静琬圆寂后，其徒玄导、僧仪、惠遵、玄法等人依次在云居寺继续刻造石经，“凡五代焉，不绝其志”。由于受到皇亲贵戚大力资助以及燕地百姓集资刻石影响，刻经事业历经隋、唐、辽、金、元、明



六个朝代，绵延 1039 年。刻佛经 1122 部，3572 卷，14278 块，分藏于石经山 9 个藏经洞和云居寺地穴之中。这部浩瀚的石刻佛教经籍世称“房山石经”，或“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它在金石、书法、美术、古代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那么道衍和尚何以奉旨到云居寺观瞻呢？

明太祖朱元璋早年出家的经历，使他对佛教有着特殊的感情，也对佛教的利弊有着切身的认识；在长期的军事、政治斗争中他深受李善长、刘基、宋濂等人的儒家思想影响，推崇“以儒治世”。明朝建立后，出于封建统治的需要，他对儒释道三教均有所抑扬，也有所取舍。他大力提倡尊朱崇儒，确立儒家思想——程朱理学统治地位。同时，为了摆脱儒学的日益僵化，更是大搞神道设教，扶植佛教和道教。拨出巨资，修缮、重建一批寺院和宫观，扩大佛、道的影响。云居寺以《房山石经》闻名于世，更以隋朝大业年间入藏雷音洞的佛舍利在北方佛教界名声大振。洪武二十一年（1388），明太祖朱元璋听闻房山石经的事迹，命随侍燕王朱棣的高僧道衍禅师（即姚广孝）奉旨前去观瞻。根据《房山石刻大藏经记略》中所述：房山石经“刻经事业及金而止，至元时已石户摧圯……入明而益衰”，明嘉靖年间宛平人于奕正在《云居寺游记》中记述：“……至山下，构云居寺焉。唐玄宗第八妹金仙公主修之。我洪武二十六年又修之……”。由此可见，洪武年间朝廷对云居寺予以关注，并且进行了修缮，道衍奉旨视察是朱元璋对云居寺现状做的一番



调研。这里，还需要提及佛家经典《大藏经》。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国泰民安的时期，朝廷总要刊刻大藏经，以示天下太平。朱元璋洪武初年就有刻藏的准备，在洪武五年（1372），征集各地有德僧人集合于南京蒋山寺点校藏雕刻（《金陵梵刹志·钦录集》卷二）。《大藏经》是汇集佛教一切经典成为一部全书的总称。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经典日渐浩繁，内容非常庞大，经后人整理成藏，是为“大藏”。雕刻刊印大藏经是非常费时、费工的，洪武初开刻的《大藏经》后来称之为《洪武南藏》，雕刻时间大约经历了30年，共收集各类佛经1520部、5620卷，到建文三年才基本勘校完毕，于永乐元年（1403）开印。据《金陵梵刹志》记载：“永乐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午时，本司左善世道衍一同工部侍郎金忠，锦衣卫指挥赵曦于武英殿题奏天禧寺藏板，有人来印的合无要他出些施利，奉圣旨问他取些个，钦此。”可见，大藏经的雕版、校勘，道衍至少是参与的。不同时代雕造的大藏经版本由于种种原因存在着差异，云居寺《房山石经》“以石存经”保留了北宋以前的大藏经，对于编校那部《洪武南藏》还是能够起到一定借鉴作用的，由此看来，道衍的到来，是为佛经而来，很可能还带着编校大藏经的使命。

当年53岁的道衍和尚于正月二十一日奉旨视察石经山，并即兴撰诗纪事，刻于雷音洞石壁，高度推崇了静琬法师的护法盛举：

“石经山在燕之范阳郡，峰峦秀拔若天竺山，故称曰小西天。隋大业间，有法师静琬者处是山，惧圣教有难，不能流通，



于是发愿募缘，敦工凿石为板，刊造一大藏经，储积于山，以备其后。法师首刊，至唐贞观初，仅成《大涅槃》一部，而法师乃卒。其后子孙绳绳化亿万人，乞钱粟刊造余部，历辽与金，然后完。此一大藏贮于岩洞者七、地穴者二，洞以石门闭之，穴以浮屠镇之。自隋、唐、辽、金及元，碑碣森列，照映岩野，然而累经干戈，无秋毫之犯。洪武二十一年岁在戊辰春正月晦一日，余奉旨往观，念法师之愿，力宏大坚固。是山之泉石，灵异清胜，故赋是诗，镌于华严堂之壁。虽未足彰法师之幽光，庶以纪兹行之岁月，而托其不朽也。”诗曰：“峨峨石经山，莲峰吐金碧。秀气钟太题，胜概拟西域。竺坟五千卷，华言百师译。琬公惧变灭，铁笔苍苍石。片片青瑶光，字字太古色。功非一代就，用藉万人力。流传鄙简编，坚固陋板刻。深山地穴藏，高从岩洞积。初疑神鬼工，乃著造化迹。延洪胜汲冢，防虞犹孔壁。不畏野火燎，讵愁藓苔蚀。兹山既无尽，是法宁有极。如何大业间，得此至人出。幽明获尔利，乾坤配其德。大哉弘法心，吾徒可为则。”

二、房山金陵

在大房山山麓的周口店镇车厂村，隐藏着一处规模宏大的皇家陵寝，这就是著名的金陵。它占地面积约 60 平方公里，经过金海陵王、世宗、章宗、卫绍王、宣宗五世 60 年营建而成，埋葬着金朝有名号的 17 位皇帝。金陵主陵区在九龙山，占地



面积约 65000 平方米。九龙山北接连山顶，连山顶处于西北—东南向的半环形地势之中，根据堪舆家的说法，追山脉逆推，有明显的“行龙”痕迹，可见“少宗”、“少祖”、“太宗”、“太祖”等龙脉。虽然金朝只统治半个中国，海陵亡后仅存六十三年，但其所营建的帝王陵，却在中国皇家陵寝文化中堪称经典。

对于前朝帝王陵墓，历代王朝有义务进行严格保护是个约定俗成的惯例，有的保卫规格不低，甚至和本朝陵寝守护相仿。从中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讲，尊重先人，保护前朝帝王陵墓是大多数人的共识；另一方面，从政权交迭的角度看，保护前朝帝王陵墓，对现政权的实施有着积极的作用，可以稳定人心，获得民众支持，同时也是胜利者的“政治自信”。对于金陵，明初也是按惯例派人保护并定时致祭的，虽然目前在史籍中未发现有关方面的详细记载，但在《古今禅藻集》（明 正勉、性通编）中却有一篇《金太祖武元帝陵久经荒圯近奉诏修护岁时致祭感而有作》诗，为道衍（姚广孝）所作，记述了他奉诏修护金太祖陵这一事件。至于何时，已不可考。据《明史》记载：“洪武三年，遣使访先代陵寝，仍命各行省具图以进，凡七十有九……每陵以白金二十五两具祭物。陵寝发者掩之，坏者完之。”洪武二十一年，仍“令每岁郊祀，附祭历代帝王于大祀殿。”又规定每三年中派人祭祀各陵的那一年，停止庙祭。根据诗文中“金太祖陵久经荒，奉诏修护”等语，可推测道衍到达金陵祭祀的时间应在洪武年间，且是明朝官方首次对金陵进行修缮。诗曰：



金源古肃慎，太祖当龙兴。
灭辽如反掌，想见武且英。
呜呼大宋国，在德不在兵。
未遂并吞志，五国即殒崩。
瞻彼涿鹿山，埋玉起高陵。
长松拥夜台，重峦蔽佳城。
秋风嘶石马，夜雨泣山灵。
芜没已百年，今幸遇皇明。
葛藟不敢入，楸梧喜再青。
岁时营一祭，亦足慰幽冥。

诗中阐述了对金朝的历史起源和对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武且英”的评价，也对重文轻武的大宋感慨颇深，对元朝虽立国九十八年，没有善待金陵，和明朝进行了潜在的对比，因此有“芜没已百年”“今幸遇皇明”之说，这说明明朝建立后，对于金代皇陵还是维护的，并且按时祭祀。只是到明末，因清军所至克捷，兵取辽阳，明帝惑于“形家之说”，疑与金代陵寝旺气相关，遂对金陵进行了大规模破坏：于天启元年罢金陵祭祀；二年，拆毁山陵，割断地脉；三年又建关庙于其地为压胜之术（康熙二年（1663）圣祖仁皇帝御制碑记），导致金陵地面建筑受到大肆破坏。



三、房山太湖山华严寺

“太湖山”这个名字很奇怪，它位于房山区韩村河镇圣水峪村，与佛教圣地上方山相对，因山上有湖（即积水成潭的沟谷）而得名。“太湖”之名始现于辽，疑为“台湖”的讹音。《房山县志》记载：“永乐初（记述有误，应为洪武年间），遣（道衍）往石经山，观静琬所刻经藏，有题咏。爵封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辞归山林，隐于太湖华严寺，恩赐香光古刹花园为别墅”。又载：“太湖山，城西南五十里，在圣水峪南，白云山北麓，有华严寺，明姚广孝隐此。”

元末，圣水峪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隘，处于经霞云岭、三流水、九口鞍、青银沟、圣水峪、孤山口、乐深村（皇后台村）、天开村的一条穿越太行山到华北平原的通道上，在这条通道的周边，曾分布着众多寺院。俗语讲“天下名山僧占多”，是说出家人出于修行的需要，往往避开闹市，选择山清水秀、清幽之地，依山就势建立庙宇。由于上方山一带景色秀美，独具特色的喀斯特地貌构成了“九洞十二峰”奇观，有着“南有苏杭、北有上方”的美誉，也就吸引着历代僧人到此开山建寺。至明代已形成“幽燕古奥室，兜率居中岩，花宫七十二，上下东西嵌”的规模。姚广孝曾留下《上方》一诗：

莲宫据山椒，嵒峽去天咫。

风香花雨新，僧行白云里。



幽沉树乐静，萧散烟钟起。

人登石路迷，依依缘涧水。

据元代碑刻和乾隆本《上方山志》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年（公元34年）印度梵僧华严宗慧晟来东土传播佛法，并于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创建天开寺。随着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以天开寺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天开寺院群，所属的寺庵达百余座。也许是因为慧晟法师在上方山的华严洞修行居住的原因，后来的天开寺主持也选择在上方山居住，因为住持居住之所称方丈，也称“上方”，人们对它居住的寺院也就叫做“上方寺”，故山因寺得名为“上方山”。东魏武帝天平二年（535年），禅宗高僧百咏南禅师到上方山结庵清居，并由上方山将禅宗传播到幽州各寺。唐代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696-697年），华严宗高僧华严和尚在潭柘山开山建寺，使华严经在北京地区广为传播，禅宗和华严宗在北京地区并行，也因唐武宗灭佛等事件，各有起落。最早记载在房山的传播是辽代，在房山城关西十五里的几条山脉的交汇处，有一座巍峨挺拔的高山，山势东西走向，因两侧山峰呈猫耳状，故名“猫耳山”，也因它像一道屏障，可以阻挡游牧民族的侵扰，秦朝曾称大防岭、大防山。到金代，因其主脉“望之明秀异常，宛然如室”，更名为大房山。在这坐山上，有一座始建于隋唐时期的寺院，名为“灵峰寺”，目前仅存遗址，根据残碑，该寺在唐僖宗光启二年（886年）进行了重建。辽兴宗重熙十五年（1046年），钦赐寺额“灵峰寺”。取灵山鹫峰之义，“灵山”，原指印度“灵鹫山”，



因山顶形状似鹫故名“灵鹫山”，是佛祖释迦牟尼讲经说法的地方，说明这个地方在佛教信徒心中占有极高的地位。当时的华严大师喆公得到朝廷“官赐紫袍”的殊荣，在此传颂华严经，使华严经的传播在房山地区日益兴盛。金代以后，禅宗和华严宗在上方山一带并行传播。至元代，华严宗逐渐形成气势，更加兴旺，到了明朝，由于宫廷宦官崇佛建寺的积极影响，上方山寺迅速发展壮大，且与中院天开构成上方三院，由此上方山诸寺庵发展到一百二十余座，形成一脉相承的华严宗体系，其规模之庞大，堪称北京之最。

华严宗融合了各宗各派及教内教外的“大一统”思想，具有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内涵，契合中国人包容的心态，得到了上至帝王、下至僧俗的一致推崇，有着“不读《法华》，不知如来救世之苦心；不读《华严》，不知佛家之富贵”的德言。使得以“华严”命名的寺院遍布全国各地，取《华严经》“慈悲之华，必结庄严之果”之意。在圣水峪，曾存在过三座华严寺，分别是白云山华严寺、青银沟凤凰山华严寺和太湖华严寺，它们与上方山关系十分密切，使华严宗在上方山一带传播，一千多年来一脉相承，成为名副其实的华严圣地。

如今，在太湖山西北的山崖下，被村民称为“北宅”或“北庙”的太湖华严寺早已坍塌，遗址仅存石头砌起的高台，和一些散落的石件。直崖下有两处摩崖石刻记载着华严寺的历史和明代重修华严寺的经过。



四、房山大韩继香光寺

香光寺，位于房山区周口店镇大韩继村。太湖山华严寺西侧的摩崖石刻记载了香光寺与它的关系：“御马监太监张其重修太湖山华严寺佛殿僧房，置买山场，立其四至。东至念佛石，南至清风岭，西至佛髻峰，北至主山，四至分明。其香光寺自太湖山华严寺流出，原一脉也。刻石于此，以为永远云尔。明万历戊申（1608）春吉日，信官张其、孔良才、敕赐香光寺住持真奉同立。”。在《房山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赵润东同志撰写的《大韩继香光寺由来》一文中，对香光寺有着详细分析：香光寺原名为“护国香光寺”，位于房山城关大韩继村，原是唐代宝积禅师所创的一座古刹，后来名为“香光园”。当姚广孝走回佛堂，在太湖山华严寺隐居后，永乐帝赐予他大韩继香光寺作为别墅，因为姚广孝曾任太子少师，故人们也称其为“少师园”，在此不再赘述。

结合香光寺内《福德庄严碑记》和《顺天府涿州房山县韩吉村香光寺重修缘起碑记》梳理分析，我们了解到“琉璃河桥北头施茶海潮观音庵”“西直门高粱桥西方三圣庵”和“俱系香光寺下院”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据《福德庄严碑记》载：“奉旨在京西直关外高粱桥修建西方三圣庵一所，置地一百二十二亩，坐落在昌平区地方，外有园科洼地，系内官监与三圣庵香火之需，其庵地土园科，俱系香光寺下院。及琉璃河桥北头施



茶海潮观音庵一所，并地二百七十亩，亦是本寺下院。”，另《顺天府涿州房山县韩吉村香光寺重修缘起碑记》载：“三十一（1603）年春，内官监太监何江，奉圣旨修琉璃河石桥成，并修施茶观音庵一所于桥侧，治买随庵香火地二百七十亩，以供本庵施茶香火之需。何监题准（皇帝批准），礼部给札与香光寺住持真奉兼领琉璃河桥头观音庵施茶。别于在京西直关外高粱桥，修建西方三圣庵一所及园地，为之香光寺下院，一体焚修……”。文中的“下院”指的是大寺院的下属庙宇，往往充当喝茶解困、接待住宿的作用，而别业又是寺院僧人单独居住的场所。那么可以推断，太湖山华严寺与大韩继香光寺、观音庵、三圣庵这一脉络，应该是自姚广孝开始，具有“内官”背景的一套独立的寺院体系，即：太湖山华严寺是主寺，香光寺是其下院，万历年间重修香光寺后，观音庵和三圣庵又是香光寺的下院。而且它们与上方山诸寺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使得这条上方山的佛教文化脉络延伸很广，在明代进入全盛时期。华严寺北接上方山，向南就是流急如巨马的拒马河，姚广孝也曾造访留下诗篇。

姚广孝逝世后，少师园也慢慢荒废。明万历时进行了重建，成为一座五进六重规模宏大的寺院，香火十分旺盛。随着时间的变迁，香光寺几经磨难，尤其“七七事变”后，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风光。解放后，这座寺庙成为了学校，大殿一度改为生产队仓库、加工厂，加上“文革”期间的破坏，古刹已面貌全非。改革开放后，随着对文物古迹的保护与重视，该村逐渐清退了



占庙住户，对香光寺进行完整的修缮，并加强了管理，又使其恢复了往日的壮观景象。

五、房山姚广孝墓塔

姚广孝是永乐十六年（1418）三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庆寿寺病逝的，终年八十四岁。临终前曾作《临终诗》一首：“一夜小床前，灯花雨中结。我欲照浮生，一笑生灭灭。”表达了他早已看破生死的豁达态度。四月六日姚广孝遗体按佛教仪轨火化，“以火浴之，心舌牙不坏，坚如金石，得舍利皆五色”，六月十一日，葬于房山已落成的墓塔中。

姚广孝墓塔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豆各庄村西北，为八角九级密檐式砖塔，高约 33 米。塔身最下面是八角形基座，基座上立有两层八角形须弥座。须弥座的束腰部分雕有寿字、万字和花饰造型图案，座上方由三层砖雕仰莲承托塔身。塔身中间四个正面砖雕仿木隔扇假门，其它四面砖雕仿木棂假窗。正面门楣之上嵌方石一块，其上楷书：“太子少师赠荣国恭靖公姚广孝之塔”。塔刹为铁制。形似葫芦，莲花形刹座，仰莲承托球形刹身，刹杆串相轮、圆光、仰月和宝珠。

我们常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就是音译的佛塔之意。在佛教中，七层的佛塔是最高等级的佛塔，造越高的宝塔，所积功德就越大，而姚广孝的墓塔有九级之多，象征至高无上，足以表达朱棣对于姚广孝的感激之情。当时成祖闻



噩耗不胜悲痛，特为他辍朝两日，并追赠他为推忠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荣国公，谥恭靖，这是明朝第一个有谥号的文臣。通常，公、侯、驸马、伯及一品官去世，皇帝才辍朝一日，以示哀悼，但是姚广孝去世之后，朱棣竟辍朝二日，并亲自为其撰写神道碑，据《明史》记载：“明初，文武大臣薨逝，例请于上，命翰林官制文。立神道碑。惟太祖时中山王徐达、成祖时荣国公姚广孝及弘治中昌国公张峦治先茔，皆出御笔。”可见这都是极为少见的荣誉。

塔前所立的神道碑为明成祖朱棣撰写：“敕建姚广孝神道碑”，该碑立于宣德元年（1426年），高4米，宽1.1米，厚0.33米。为明代唯一连中“三元”、曾任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太子少保的商辂撰文，杨真书写。那么，为何此碑是永乐皇帝撰写却在宣德年即朱棣之孙朱瞻基的时代刻立呢？据《明实录》记载：“（宣德元年五月）辛丑，立故少师荣国公姚广孝神道碑。初广孝卒，太宗皇帝亲制碑文，命有司营葬，并树碑神道。时碑已具而文未刻。至是，其养子继以请，上谕行在工部臣曰：‘广孝从皇祖最久，靖难与有劳勤，其卒也，恤典特厚。’遂出永乐中御制文，付之曰：‘其即为刻碑，以成皇祖嘉念功臣之志。’”由此看来，该“御制神道碑”其实并未在姚广孝下葬之后立即雕刻碑文，“碑已具而文未刻”，可能因某种原因未最后定稿，所以刻碑的事就一直耽搁下来，直到宣德元年，姚广孝的养子姚继请求为父刻碑时方才树立。因此“姚广孝神道碑”末尾所书“永乐十六年八月十三日立”，其实并非立碑的实际时间，



大约应是成祖朱棣成文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实地碑文与《续藏书》《明成祖御制集》《日下旧闻》等文献记载的《姚广孝神道碑》的全文还多有歧异。如：碑刻中姚广孝“永乐十六年三月来朝于北京，仍居庆寿寺”，而文献中则为“永乐之六年三月”来北京，随即去世。还存在“柱国”（碑刻）与“上柱国”（文献）两个明显不同的品秩。但根据《明史》：“凡文勋十。正一品，左、右柱国。从一品，柱国。”并没有“上柱国”的勋位。可能是由于时间之久，刻碑者使用原稿付刻，而后来编辑《明成祖御制集》时使用的是宫中所存的修改未定稿。以后的明清文献、文人墨客在辗转抄录中皆源自后出的《明成祖御制集》，以致其中存在的明显错误数百年讹误相传。也使一些重要文献如：《房山县志》、《万历野获编》、《帝京景物略》、《明史》等将文献所载当作为碑刻之文，对后世的研究者们产生了严重误导。

姚广孝早年就常以元初佛家出身的名臣刘秉忠自咏，从后期的表现看，二人的确有很多共同之处，同样对政治做了一系列贡献。“姚广孝”是后期朱棣赐名，“秉忠”和“广孝”相对，是否朱棣有意为之呢？“靖难之役”中姚广孝曾辅佐为世子的朱高炽坚守北平，后来又辅佐太子朱高炽监国，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太子朱高炽继位后，姚广孝更是得以入祀太庙，成为当时唯一以文臣身份入明祖庙之人。然而，姚广孝鼓动藩王造反的争论在民间一直没有停止，其晚年所著的《道余录》更是因对程朱理学有所批判，招致广大儒生和当朝文官阶



层“识者鄙焉”。在后来杨荣和杨士奇在编纂《明太祖实录》时，也故意淡化姚广孝的功绩，说姚广孝不通军事，将他的功劳予以抹杀。万历年间，文官阶层兴起了一股同情建文帝的政治潮流，他们将对朱棣的不满发泄到姚广孝身上，对他口诛笔伐。终于在 1530 年，在文官阶层的要求和嘉靖皇帝的默许下，将姚广孝移出了太庙。

姚广孝是个复杂的人物，通过对他一系列历史点滴的拾遗，既可辅史学之证，匡史书之误，也让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历史，了解事实真相、了解史实细节，对明朝初期的情况有一个系统的认知。他的个人经历，也对后人有所启迪。更为重要的是，姚广孝在房山的足迹恰好印证了房山区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于我们深入研究房山文化的核心价值，打造文化大区，提升房山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进而实现打造“国际旅游金名片”的目标有着重要意义。



奕绘、顾太清的河北镇诗词

潘惠楼*

房山区河北镇地区，山青水秀，风景优美，人文丰厚，古迹众多，从古至今，都是旅游胜地。许多文人骚客，在游览之后，还留下诗文，记其所见所闻，抒发感怀之情。其中，留诗最多者，当属清代的奕绘、顾太清夫妇。两人吟诵河北镇地区风物的诗词，几近 30 余首。

一、奕绘、顾太清其人

奕绘，姓爱新觉罗氏，生于清嘉庆四年（1799 年），是清高宗乾隆皇帝第五子纯亲王永琪之孙，荣恪亲王绵亿之子。荣亲王府，家学渊源，文风昌盛，历代相传。清嘉庆二十年，荣恪亲王辞世，奕绘降袭多罗贝勒，赏戴三眼花翎，官至内大臣，为正白旗汉军都统。主要管理宗学事务，管理御书处及武英殿修书处，监顺天乡试，暂管观象台事务等。奕绘承继家学，博学多才，著述很多，有《子章子》《妙莲集》《写春精舍词》

* 潘惠楼：中国煤炭杂志社副总编



《集陶集》《明善堂文集》等，辑有《清韵斋宝翰录》，并与王引之合著《康熙字典考证》等。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奕绘因病去世，终年40岁，葬于房山区坨里镇的大南峪奕绘贝勒园寝。

顾太清，生于清嘉庆四年（1799年）姓西林觉罗氏，名春，原名为西林春。满州镶蓝旗人，是清代雍正、乾隆两朝重臣鄂尔泰之重孙女。祖父鄂昌做过甘肃巡抚，因涉入文字狱被乾隆赐自尽。从此家道中落，父亲鄂实峰只得以游牧为生。西林春成年后，曾入荣亲王府为女眷做家庭教师，与奕绘诗词唱和，相互倾慕，遂生爱意。因西林春为罪人之后，依清规制不得为王室成员，遂假冒荣王府护卫顾文星之女，于道光四年（1824年）与奕绘成婚，为奕绘侧室。顾太清能赋诗填词，书法绘画也有专才，著述有《天游阁集》《东海渔歌》《子春集》等。顾太清的诗词，后人曾予以高度评价，清代即有“男中成容若（纳兰性德），女中顾太清”之说，学界誉为“清代第一女词人”。顾太清与奕绘同庚，一生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卒于光绪三年（1877年），终年77岁，也葬于大南峪奕绘贝勒园寝。

奕绘、顾太清婚后共同生活14年。顾太清虽为侧室，却与正室妙华夫人一样，深得奕绘宠爱，视为红颜知己，感情甚笃。道光九年（1829年），妙华因病去世后，奕绘没有再娶。顾太清受奕绘专宠9年，出则同游，入则诗词唱和，共享金石书画之收藏，充满闺房之乐。因奕绘在房山的大南峪建有园寝，



二人经常到大南峪小驻，并从大南峪出发，到房山地区游览。二人并辔而行，双飞双棲，寻访名胜，考察古迹，不要说是古代，就是近现代，也是令人十分羡慕之事。奕绘去世以后，顾太清多次到大南峪为其夫上坟，多次在大南峪修养。此期间，顾太清也曾多次带领子女和闺中好友游历房山的山川风物。奕绘、顾太清在房山的旅游，多有采风性质，咏志抒情，或吟诗，或填词，虽是个人观感和所见所闻，却为我们留下了当时房山地区的时代风貌。奕绘园寝所在地大南峪，与河北镇山岭相连，与磁家务村道路相距只有 10 余华里。河北镇地区，古迹众多，风光秀丽，路近方便，更成为奕绘、顾太清二人寻幽探秘、经常光顾之地。河北镇的名胜古迹孔水洞与万佛堂、王禅洞、背阴洞、潜真洞、张良洞等地以及流经河北镇的大石河，都留下了奕绘、顾太清的足迹，并留下了记载的诗词。

二、奕绘、顾太清游孔水洞、万佛堂诗

其一，奕绘诗：同太清联骑游石堂，观孔水

廿四，同太清联骑游石堂，观孔水，得开元残碑一，吴郡卢襄诗碣一，载归，而大历碑已不复观矣，赋诗二首。

南谷西盘低复低，梨花万树接幽溪。
寒泉古洞飞仙鼠，大历残碑没壤泥。
久坐浑忘身是客，再来安得路能迷。



参差苕藻游人影，水碓声中白日西。

二

渡水穿云联骑归，鸳鸯属玉背人飞。

晚风十里梨花雨，快马同过独石矶。

故旧渐看前辈少，登临肯使寸心违。

卢襄诗与开元碣，许我相携出翠微。

其二，顾太清：同夫子联骑渡慈溪，游万佛堂观孔水洞

丙申（1836年）二月廿四，同夫子联骑渡慈溪，游万佛堂观孔水洞，得开元刻石一，吴郡卢襄刻诗一，遂以十金易于山僧载归，而大历碑已不复观矣。

风雨杏花稀，残英没马蹄。裹粮探古迹，联辔渡慈溪。

阴洞投龙壁，高碑失旧题。归途逐流水，苕藻碧凄凄。

注：以上奕绘、顾太清诗均作于大南峪，记载了夫妇二人联骑游览孔水洞、万佛堂的过程。时间为清道光十六年丙申二月二十四日（1836年），时奕绘、顾太清均37岁。当年二月，二人携儿女春游，十九日至潭柘寺，二十日游戒台寺晚住大南峪，二十四日游览孔水洞、万佛堂，二十六日奕绘再游孔水洞，二十八日午离开大南峪晚住云岗，二十九日返京家中，前后计春游十日。此次出游，奕绘、顾太清写有关于潭柘寺、大南峪的风物、孔水洞与万佛堂以及大石河的诗词20多首。

二人诗题目中的孔水洞、万佛堂，是房山名胜，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民国十七年《房山县志》卷三“古迹”载：“孔水洞，县北二十里，在磁家务南，又名万佛堂，亦邑人祈



雨处”。清人黄百家《北游纪方》载：“云濛山，直上皆石壁，下有水涌出为孔水洞，俗名水帘洞。旧有龙泉寺，唐大历中建，今四壁刻划佛像，又名万佛堂”。诗题目中的慈溪，即大石河，因从磁家务村流过，奕绘、顾太清二人将其谓之慈溪。

二人诗前小序中都记载的开元残碑，为唐代大历年间的《大房山投龙壁记》碑。此碑中记有唐代往洞中水潭内投金龙、玉壁求雨的过程。《清一统志》引胡詹记“孔水洞——开元时每旱，必遣史投金龙玉壁”。1981年，天大旱，河北镇曾组织人员探勘孔水洞水源流量，在洞口内下方原潭水退后露出的部分洞底挖掘，获得金龙七条，上交文物部门，现仍在首都博物馆展出。但玉壁至今还没有发现。民国十七年《房山县志》卷三“金石”载：“《大房山投龙壁记》，唐刻，已佚，在孔水洞”。后人也曾多次寻找此碑，不果。中国诗词学会副会长、原河南省焦作市市长、抗日战争前就已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张璋先生，集数十年之功，对奕绘、顾太清的诗词研究、汇总、整理，编辑成《奕绘、顾太清诗词合集》，1998年出版。书中收录有奕绘、顾太清游孔水洞、万佛堂的诗，从顾太清诗的序中，发现记有“得开元刻石一，吴郡卢襄刻诗一，遂以十金易于山僧载归，而大历碑已不复观矣。”从而得知，唐代《大房山投龙壁记》碑，已于此次奕绘、顾太清游览孔水洞、万佛堂时，被奕绘以十金从寺中山僧手中买走，先存于大南峪，又“家人好事买碑还，百里毡包入城市”。将此碑用毡子包好，运到京城奕绘府邸，终解开《大房山投龙壁记》碑已佚之谜，难怪民国年后人多处



寻访不得。

二人诗前小序中都记载的卢襄诗碣，同开元碑后果一样，也被奕绘运到京城府邸，后不知所终。诗碣作者卢襄，明代吴县人，字师陈，嘉靖进士。累官兵部郎中，后升任陕西右参议，自号五坞山人，著有《五坞草堂集》《石湖文略》。所幸的是，在奕绘购买碑碣、将其运走之前，曾有清铁帽子王之一的葬于磁家务的庄亲王后人奕赓，在为其先人上坟之余，到孔水洞、万佛堂游览，抄录了卢襄诗碣全文。并对此碑刻年代进行了考证，认为此碑明刻无疑，且在万历丁亥年万佛堂龙泉宝殿重修以前所刻。记入了其编纂的《佳梦轩丛著》一书，为我们留下了这一资料。卢襄诗碣文为：

“乙酉闰月（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雪后游房山龙泉寺，观水帘洞。

晨兴北走三十里，小舆格磔石齿齿。
昨来房山五月雪，万磧千峰玉争倚。
樵苏未出狐兔潜，斫路行行我伊始。
闭门耻学袁氏卧，蹶冰已补王生履。
沙溪诘屈窍忽通，石梁凌兢仄且移。
鸳鸯惊飞属玉避，颇惟前驱载弧矢。
招提寂历唐时寺，大历残碑尚能纪。
山椒离立见浮图，山下伏流出孔水，
水帘古洞深莫测，雷电闻有蛟龙起。
洞口奇书莫能辩，又言曾栖鬼谷子。



海田岸谷知几迁，房山苍苍只如此。

雪中之游勿勿嗤，明发驻车又城市。

吴郡卢襄题，县丞任璋命工勒石”

在奕绘的第一首诗中，有“水碓声中白日西”之句。此水碓，是孔水洞口下方百余米处安装的水磨，元代既已有之，为寺中僧人所有，以孔水洞流出之水作为动力，民国《房山县志》中有载。水磨使用的木轴，虽是上等结实木材，但长期受石磨转动摩擦，也需经常更换。民国初年，房山运煤高线铁路通车，线路从万佛堂上方经过，经过协商，高线公司派人出料，将水磨木轴更换成铁轴，使磨轴使用寿命大为延长。20世纪50年代，有了电磨，此水磨即废之不用，磨房成了住户。至今，水磨的石碾盘，还在磨房的墙边存放。

其三，奕绘：游万佛堂

廿六，独游石堂，坐开元沈（沉）龙壁处，遂由山背过东庵，甚荒陋。

前日梨花已盛开，桃花开日客重来。

石堂独坐岩溪水，阴洞亲移太古苔。

白壁投龙君惑矣，春衣跨马兴豪哉。

野人指引东庵路，过往能无此一回。

注：此诗名为编者所加。此诗是隔清道光十六年丙申二月二十四日一天之后的二十六日，奕绘再游孔水洞、万佛堂时所作。诗序中“坐开元沉龙壁处”，指唐代《大房山投龙壁记》碑记有开元中（713年—740年）遣吕慎盈往孔水洞三投金龙、



玉壁求雨之事。

诗序和诗中都提到的东庵，位于磁家务村与其所属自然村煤岭之间，与大南峪实为一山之隔。大南峪在山阴，东庵在山阳，所以记为“由山背过东庵”。东庵虽为庵庙，民国年间尚有和尚在此出家。20世纪50年代庵废。东庵路，是大南峪通往孔水洞、万佛堂的又一条道路。大南峪至孔水洞、万佛堂，有两条道路。一条路是出大南峪后往南，经辛开口、漫水河村，至磁家务村地界，过大石河到达。此路沿大石河左岸而上，基本是坦平大道。另一条路是出大南峪后往北，经北车营村走煤岭，过东庵到磁家务村，过大石河到达。此路基本是山路。诗中有“野人指引东庵路，过往能无此一回。”可以看出，奕绘还是第一次走此路，并不熟悉路况。这两条路，一条可看水，一条可观山，各有特色，都易引人诗兴。

其四，奕绘：石堂

久忆石堂水，重坐龙泉岩。春风骑马处，回头忆陈迹。
峰峦晚愈秀，行藻秋更碧。骊珠探窠穴，胡麻饭香积。
溪光照须鬓，余霞万山赤。虫声起长峡，笼灯送归客。

其五，奕绘：龙泉归途见新月作。

日暮岚气清，桃源迷洞口。新月正如眉，微风动杨柳。
水鸟避人飞，肩舆互前后。新月正如梳，掺掺玉人手。

注：此其四、其五两诗，是奕绘又来孔水洞、万佛堂游览所作。奕绘多次到孔水洞、万佛堂考察游览，可见其对此地的喜爱。孔水洞、万佛堂所在地，风景优美。现庙中存有的清嘉



庆九年（1804年）《重修龙泉庙功德主碑》记载，“其山则有六聘九龙紫云红螺之秀，其水则有拒马忙牛漫石琉璃之奇。层峦叠障，分派奔流，诚上游之形胜，天下之名区也”。万佛堂中的唐代石刻“万菩萨法会图”，是国家的石刻珍品。堂前小岗上辽代咸雍年间建造的花塔，其形式如同花束，在全国寥寥无几。

两诗体现出奕绘对孔水洞、万佛堂的恋恋不舍。“溪光照须鬓，余霞万山赤”，仍不愿离开。至“虫声起长峡，笼灯送归客”，才乘月色返回大南峪园寝。诗中的“新月正如眉”，“新月正如梳”，形容别有新意，给人以明月送归人的乐趣。

三、奕绘、顾太清用卢襄诗韵作诗

其一，奕绘：唐碑用卢襄韵

南谷之西约十里，两水相依若唇齿。
就中孔水源更清，唐碣诗碑高下倚。
开元已古称石堂，壁刻万佛迷甩始。
寒泉汨汨阴洞森，仙草灵芝谁敢履。
却看彼岸不逾丈，略口危仄渔梁移。
东风白日鸣丹蝠，正字千年画金矢。
大历残碑落何处，于今但见卢襄纪。
儿女可时毕婚嫁，飘笠真堪老山水。
东风晓日映晨妆，南谷仙人从定起。



从好吾将法仲尼，斋物安能效庄子。
孔水之游已一再，孔水之歌歌若此。
家人好事买碑还，百里毡包入城市。
其二，顾太清：游孔水用吴郡卢襄石刻诗韵
溪去山楼凡七里，平坦不烦折屐齿。
下有源泉上石堂，万佛妙相参差倚。
青台亘古不见日，森森浓绿疑无始。
龙泉古壁何年失，虎尾春冰岂可履。
夕阴水鸟上渔梁，倒影山容碧滩移。
人生行乐须及时，花外光阴去如矢。
开元残碑嵌绝壁，幸得卢襄刻诗纪。
出山一路又看山，二水合流成漫水。（水名）
马耳东风拂面香，鸳鸯属玉惊人起。
归途借问今何时，梨花桃花才结子。
渺渺春波万古闲，悠悠天地长如此。
偕隐何辞挽鹿车，云水遨游胜朝市。

注：此奕绘、顾太清的诗，题目中都记有是以卢襄诗韵而作。可见二人对卢襄诗碣，十分偏爱，因此将其与《大房山投龙壁记》碑一起以十金易走，运往京城府邸进行研究。时孔水洞碑刻林立，二人偏偏钟情此二碑并购买，也可见此二碑之价值。卢襄诗碣，记载了自己从房山县城出发，到孔水洞、万佛堂的游览过程。奕绘顾太清二人以卢襄诗韵所作之诗，也是记载游览孔水洞、万佛堂的过程，都是所见所闻所想。



奕绘的诗中，体现出自己厌恶官场，寄情山水的愿望。“飘笠真堪老山水”“从好吾将法仲尼，斋物安能效庄子”，说明奕绘有着深深的老庄思想。顾太清诗中“人生行乐须及时，花外光阴去如矢”“渺渺春波万古闲，悠悠天地长如此”。体现出顾太清的人生观，天地之大，人生苦短，应抓住有限人生，及时做事，笑对生命。

卢襄、奕绘、顾太清三人，是两个朝代的人，用相同诗韵，各自成诗，记载孔水洞、万佛堂，抒怀三个人的思想感情，真是孔水洞、万佛堂的荣幸。风物以文传名，文以风物增色，真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压十二韵成三首诗同咏一地，在古今诗坛中也是十分难得的。

四、奕绘、顾太清游王禅洞诗

其一，奕绘：探王仙洞望宝泉

龙泉已至清，宝泉更清冽。玲珑三洞口，上有太古雪。
道人九十余，了无长生诀。但饮此泉水，满面桃花色。
下望桃杏林，红霞半空列。春风吹鬓丝，此乐超言说。

其二，顾太清：登王仙洞望宝泉

传有神仙窟，清晨特一游。桃花迷洞口，雪瀑挂山头。
磴道生春草，高峰豁远眸。疏钟风外度，心为白云留。

注：此奕绘和顾太清诗，应作于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年）春。诗题中的王禅洞，亦称王仙洞，位于孔水洞、万佛堂的西



部一华里处山腰中，坐北朝南，为一组岩洞群，最深者约 20 米，面积最大者有五六十平方米，其最大者称王禅洞。传说是战国时期军事家王禅隐居之处，此当然不实，但流传较广，当地人多能讲一段王禅在此修炼的故事。洞前现存有《王仙洞庆寿庵记》碑，为清嘉庆九年（公元 1804 年）所立，碑座及碑身高 2.5 米，碑身宽 0.8 米，碑身厚 0.3 米。碑文记载了在王禅洞前建庆寿庵的经过。旧时农历四月十八日，是王仙洞的庙会。1937 年，日本侵占平西后，庙会停止，王仙洞的道士四散。20 世纪 50 年代庙宇坍塌。在民国《房山县志》中记有“王禅洞，城北二十余里，在河套半壁店村南”。站在王禅洞观望，至今仍可体会奕绘诗中“下望桃杏林，红霞半空列。春风吹鬢丝，此乐超言说”的意境和感觉。

诗题中的宝泉，在王禅洞上方云濛山的半山腰处，泉水甘冽。旧时，泉水溢出泉池，犹如白练飞下，远看十分壮观。近年天旱，偶尔逢雨季，才能侥幸观得此景。宝泉附近，在民国初年建有房山运煤高线的万佛堂站台，站台曾建有浴池，以宝泉之水作为洗浴之用。1962 年高线停运之后，房山煤矿一员工在此居住，饮用此泉水生活。现高线站台已成废墟，泉水也已干涸，留有站台废墟和浴池遗址。

由此二诗内容来看，奕绘、顾太清都是远观宝泉而未亲至宝泉。



五、奕绘、顾太清游背阴洞诗

其一，奕绘：背阴洞

磴道缘绝壁，洞门朝太阴，黄花与赤枣，得地同萧森。
燃灯入高险，连臂探幽深。却出叩石鼓，铿铿闻妙音。
悬崖太古雪，可年留至今。苍苔蚀仙篆，寂寞古人心。

其二，顾太清：背阴洞题壁

中秋二十（日），访背阴洞道士他出，留题壁。

山穷忽有路，骑马入天台。仙犬迎人吠，幽花背日开。
风吹双翠袖，雾冷古苍苔。不见玄都客，留题拟再来。

注：此奕绘和顾太清诗，应作于道光十六年丙申（1836年）八月奕绘、顾太清夫妇驻大南峪期间。二人于中秋节后的八月十六日住大南峪，十七日经房山县城冒雨到云居寺游览，夜晚住云居寺，十八日游云居寺的水源头，十九日回大南峪，二十日访背阴洞，二十一日在大南峪视察田园，二十二日经云岗回京城，前后历时七天。

诗题中的背阴洞，在磁家务村半壁山北的半山腰处，洞口上方嵌有乾隆八年（1743年）汉白玉石额，阴刻楷书“背阴洞”，洞前曾有庙宇。洞深约30米。20世纪50年代，庙宇被毁。20世纪70年代庙中建筑拆除。从顾太清诗的序中“道士他出留题壁上”，可知背阴洞为道教庙宇。从奕绘诗中的“苍苔蚀仙篆”，可知洞壁有前人题刻文字。清康熙年《房山县志》有“背



阴洞在磁家务西北山岩中”的记载。

六、奕绘、顾太清游潜真洞诗

其一，奕绘：探潜真洞（俗呼迷仙洞）

斯山凡洞八，潜真最幽寂。柳色绿参差，杏林红幕孀。
绝壑临涧阴，石柱支仙宅。悬崖垂钟乳，森森似剑戟。
内门不可入，野老贪所获。中行入自穴，云有千间辟。
为我采石髓，甘润如玉液。乃知古人书，往往多实迹。
归途望南岭，冰雪千尺积。平生亦何幸，得遂山水癖。

其二，顾太清：访潜真洞

入谷探幽邃，春光正及时。山溪流水慢，老杏做花迟。
一自仙人去，千年钟乳垂。浮生容易过，行乐且题诗。

其三，顾太清：潜真洞：

传有真人乘鹤去，空余老杏亲手栽。
至今深洞悬钟乳，终古阴崖长碧苔。
大道无为且游戏，谷神不死或归来，
秋风落日仙潭静，涧草崖花到处开。

其四，顾太清：游潜真洞晚归度梅儿岭口占

夕阳西下乱山围，缥缈遥村暮霭霏。
游兴最嫌秋日短，马头明月照人归。

注：此四诗中的第一首和第二首，是奕绘和顾太清同去潜真洞游览所作。第三首和第四首，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



顾太清携子女游潜真洞所作。潜真洞，即位于河北镇南车营村的石花洞，现是北京旅游胜地。此洞于元代由全真教道士刘志厚开创，时刘志厚被封为三山洞主，潜真洞为其一。潜真洞，因洞口外石壁上和洞中有石佛像，当地人称其为十佛洞，或石佛洞。因洞中有精美石钟乳，民国年《房山县志》，记其为石花洞。20世纪80年代，房山区将其开发为旅游景观，遂以石花洞风景名胜区命名。潜真洞之名，非考察为文者，已很少提及。奕绘诗名中的注释有潜真洞“俗呼迷仙洞”之句，是因此洞深奥，分有数层，各层曲折迂回，有的至今不知其底，进洞后容易迷路，因而谓之“迷仙洞”。当地人曾言，古时有人入洞后，未见出洞。在20世纪80年代开发此洞时，确实在洞中的深井处发现过骸骨。

顾太清诗题中有“游潜真洞晚归度梅儿岭”，梅儿岭，即煤岭，因此岭有露头煤可采而得名。清时为磁家务所属自然村，今为河北镇三福村的自然村。位于大石河东，是河套沟出沟入京的便捷山道。煤岭之东，是北车营村，与奕绘的大南峪园寝相连。由潜真洞至大南峪，走煤岭道路距离为最近。

南车营附近有杏园村，煤岭往东的北车营村，都是产杏之地。尤其是北车营村的“五月鲜”，五月即可成熟，在京城最早上市，颇有盛名。清《日下旧闻考》引《北游纪方》云“车营岭小冈叠阜，起伏连绵，居民以种杏为业，环十数里，峰头涧底，皆是杏林”。因此在奕绘和顾太清游潜真洞的四首诗中，有三首都有吟咏杏的诗句。其中，奕绘诗中有“柳色绿参差，



杏林红幕孀”；顾太清诗中有“山溪流水慢，老杏做花迟”“传有真人乘鹤去，空余老杏亲手栽”。可见诗人对杏的偏爱尤其是对老杏的偏爱，也可见当地的杏花、杏林之美。

七、奕绘、顾太清游玉室洞天诗

其一，奕绘：玉宝洞天读刘真人志厚塔铭（丘祖弟子）
行寻桃花林，登山复入谷。玉室之洞天，石穴深且复。
阴风冷毛发，白日须秉烛。仙花秀岩口，寒泉滴山腹。
双碑远林际，搜剔得实录。豁达刘真人，人间姓名熟。

其二，顾太清：探玉室洞天

缓步上层巅，岩花加倍鲜。悬崖开洞户，玉窦饮清泉。
云浸衣裳冷，风吹鬓发偏。紫纒归路急，溪水晚生烟。

注：此二诗诗题中的玉室洞天，在河北镇檀木港村的白石口沟北的半山中。当地谓之曰张良洞，意为汉代张良隐居之地，实是传说附会。明《永乐大典》卷一三〇七四有“玉室洞”条，援引《房山县志》记为“玉室洞，在北京顺天府房山县西北三十里，石路险峻，人少有至者，故老相传昔汉张子房隐栖于此”。民国年重修《房山县志》卷三“古迹”中记为“张良洞，旧志言：县西北七十里，乃张子房辟谷之所，洞中有独桥十八滩，称为玉室洞天”。

奕绘诗题中的“刘真人”，名刘志厚，字伯淳，道号广阳子，确如诗题所记，为全真教丘祖丘处机的弟子，曾参加丘处机的



会葬。其跟随全真教第三代弟子、第六任掌门人尹志平多年，被皇家赐予玄靖达观大师称号。刘志厚曾在元代的神宁乡、主要是今之河北镇地区，开创黄山玉室洞天、大房山潜真洞、仙都山仙君洞，做为全真教道场，并被全真教命之为“三山洞主”。

奕绘诗中有“双碑远林际”之句，双碑中除刘志厚塔铭外，还有《黄山玉室外洞天记》碑，记载全真教开发玉室洞天的过程。今碑仍在原地。

玉室洞天所在地，旧时“人少有至者”，就是在交通畅达的今天，也要翻山越岭才能到达。清代奕绘、顾太清夫妇，能够到此寻幽探秘，可见其搜求掌故之瘾极大，求学问道之心极强。

八、奕绘、顾太清游大石河诗

其一，奕绘：慈溪渔梁行

慈溪孔水相合流，流浅可涉不可舟。

渔父为梁布石头，纵横八阵排中洲。

其鱼细小不上钩，但识溯源逆且浮。

启闭有法妇子谋，敝笥颇足升合求。

我行渔梁叹且讴，江海之大鲛鲸游。

利益巨网乘船楼，大取小取各有由。

川上一笑吾归休。

其二、奕绘：饭后游慈溪万佛堂洞泉二水汇处



南谷山前转山后，慈溪通骑不通车。
行穿红叶千林底，饱看黄花七里余。
水汇明沙清入画，岩阴怪石秀江书。
匆匆过客匆匆去，输却渔人日钓鱼。

其三，顾太清：游慈溪

丁酉年上巳同珊枝、素安、云林、家霞仙游慈溪修禊事
上巳同游天气新，山头晓日笼朝云。
风吹杨柳绿如染，人映桃花艳不分。
曲水何如今日乐，赏心难共去年群。
落霞归鹭慈溪路，回首西山日已昏。

注：此奕绘、顾太清的三首诗，均是记载游览慈溪的过程。慈溪，即大石河。因大石河水流经磁家务，与奕绘在大南峪的园寝很近，奕绘、顾太清遂将其命名为慈溪。大石河古称圣水，得名于战国时在河下游的今董家林所在地建有侯国的都城，都城为圣聚之所，流经圣聚的河水遂得名圣水。北京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其最早的城市即为房山董家林的古城圣聚。大石河古时还被称为龙泉河，因其发源于百花山下的龙门台，一路奔流，汇入多处被称为龙泉的泉水，流量逐渐加大。大石河又被称为清水河，因水质清澈透明洁净，尤其是河北镇地区，水质最佳，所以河北镇地区多称其为清水河。河北镇之名，即得于大石河。

此奕绘的两首诗，都是记游览“慈溪万佛堂洞泉二水汇处”。此汇合处，在磁家务村与漫水河村的交界地河滩。大石河水一



路穿山越岭而来，至此已近出山之口，河床骤然宽阔，恰有孔水洞之水汇入，整个河流水势无所阻挡，水流开始沿河床四散，恣意漫溢，纵横无忌。河岸上的村庄，也因之称为漫水河村。由漫水河村至对岸的口头山下，河床最宽处约有半华里。所以奕绘诗中有“水汇明沙清入画，岩阴怪石秀江书”，正是描写此地。奕绘诗题中的“慈溪渔梁行”中的“渔梁”，也在此处。“渔梁”，当地人也称其为“鱼亮子”，是在河的浅流处，用石头垒成“八”字型水坝，在“八”字两笔的相交处，预留出下叠出水口，口旁放一竹制或荆编的鱼篓。鱼有溯水上游之习，上游时被水坝所阻，急寻上水之处，均拥至叠水口上抢起跳，有跳不上坝口者就易掉入鱼篓之中，被捕渔者获。此种捕鱼方法，最宜水浅河宽之处，做好鱼梁之后，即可守株待兔。

此顾太清的诗，前有小序为“丁酉年上巳同珊枝、素安、云林、家霞仙游慈溪修禊事”。丁酉年，即道光十七年。上巳，为三月三日。珊枝、素安、云林，为顾太清闺中诗友。霞仙，为顾太清之妹。修禊事，是事先有约定的。即顾太清事先约好诸闺中诗友及其妹，共同到大南峪小驻，并游览美丽的大石河。

顾太清与闺中诗友游大石河，奕绘给予了大力支持，并与之同游。顾太清游大石河诗成之后，请奕绘览阅，奕绘又依顾太清所作诗韵，写成《诗既成复次太清修禊诗韵》，诗为：

人心天气两鲜新，满涧桃花望若云。

湛湛龙泉洽龙井，朦胧春雨过春分。

晋唐故事真能继，王谢风流迥不群。



水荇岩沙澹将口，归途纤月代斜曛。

奕绘认为春日诗女结伴郊游，是难得的风流雅事，因此又作《流水修禊事也四章六句》，诗为：

泌彼流水，涣涣其澜。溯彼慈溪，至于胜泉。
胜泉何有，有鲫有口。胜泉之流，汇于孔水。
孔水之源，洵清且美。采采苹藻，猗兰及芷。
穆穆春风，灼灼夭桃。惟士与女，以游以邀。
阴壑如晦，酌彼一瓢。一瓢之饮，卓尔颜回。
今我不乐，日月其催。采采山花，相劝一杯。

九、顾太清游大石河词

其一，浪淘沙：同夫子游石堂回经慈溪

春日同夫子游石堂，回经慈溪，见鸳鸯无数，马上成小令。
花木自成蹊，春与人宜。清流荇藻荡参差。小鸟避人栖不定，飞上杨枝。

归骑踏香泥，山影沉西。鸳鸯横破碧烟飞。三十六只花样好，同浴清溪。

注：题目浪淘沙，为词牌名。词写于道光十六年春（1836年），时顾太清 36 岁。此词记载了顾太清与其夫奕绘游览孔水洞、万佛堂回大南峪时路过大石河所见。欢快之情，溢于言表。其中，看到河面上鸳鸯无数、同浴清溪，想到自己和奕绘，双飞双栖，联骑郊游，充满幸福之感。此词在顾太清的闺中诗



友也是清代著名女词人沈善宝所作的《名媛词话》中，被评为“巧思慧想，出人意外”。

顾太清词中记载大石河上鸳鸯无数，在奕绘和顾太清其他游览大石河的诗词中，也曾多次记写河中鸳鸯。如，顾太清有“马耳东风拂面香，鸳鸯属玉惊人起”。奕绘有“渡水穿云联骑归，鸳鸯属玉背人飞”。明卢襄诗碣中有“鸳鸯惊飞属玉避，颇惟前驱载弧矢”。北宋诗人范成大过大石河时也有“琉璃河上看鸳鸯”的诗句。可见，在百年前的历史长河中，大石河曾是鸳鸯等水鸟的天堂。

其二，暮山溪：慈溪看捕鱼作

垂杨枝外，一片桃花水。临水野人家，好生涯、叉鱼活计。疏篱草舍，三五自成村，称鱼市，儿童戏，也效叉鱼技。飞花万点，乱卷东风起。晒网趁斜阳，射金波、落霞影里。言斤论两，鱼价细评量，同妇子，谋生耳，此外无余事。

注：题目暮山溪，为词牌名。《慈溪看捕鱼作》，写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此时顾太清44岁，奕绘已去世三年半，顾太清从怀念悲痛之中已然走出。从春天的大南峪驻地来到大石河边，看渔家生活，心情顿时开朗。“垂杨枝外，一片桃花水”。开篇两句，就给读者一幅美丽的画面。又往前走，看到“临水野人家”，从事“叉鱼活计”。再往前走“疏篱草舍，三五自成村”。还有“鱼市”，儿童学习叉鱼游戏。又见杨柳絮“飞花万点”，迷乱天空。晚上渔家晒网，斜阳映照水面，金波万点，落霞倒影，又是美丽画面。鱼市上“言斤论两，鱼价细评量”，



充满生活气息。最后是“谋生耳，此外无余事”，反映的是渔家乐，也表现出作者对劳动人民艰辛生活的理解和同情。

此诗明白如话，生动鲜活，通俗易懂；句句入画，有景有情，情景交融。如一卷长长的画轴，徐徐展开，步步深入。让我们如临其境，体会渔家生活，虽然从事的是艰辛的捕鱼生计，却让我们看到的是苦中有乐，知足长乐，人生美好；人与山、与水、与大自然的生态和谐。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当年大石河渔民生活的真实写照。顾太清的词，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清代女词人第一之称。由其上述之大石河的这两首词，即可见其词作非同一般。

写到这里，作者也不禁想起自己的少年生活。作者是河北镇人，少年时也曾随兄长到大石河叉鱼。时兄在河中以哨刀砍鱼，我在岸边手舞小哨刀比划，“也效叉鱼技”，犹如顾太清词中所记情景再现。叉鱼，受叉齿距离所限，只能叉大鱼。叉中之鱼，每条至少也应重半斤四两的，小鱼只能网捕，叉不到。我初中的宝壮同学，是大石河畔佛子庄村人，他讲小时随其爷爷到大石河捕鱼，曾见到爷爷从村对面南崖的水洞中捕获一条有成人手臂长的鱼，可以想见当年大石河的鱼之多、鱼之大。我们读初中时正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在河南中学课间之余，到大石河捕鱼、摸虾、捉蟹是平常之事。我有一同学名宝玉，其母早亡，与父相依为命。父为售货员，忙于工作，有时来不及做早饭，宝玉只好早晨饿肚子上学，中午课间休息，宝玉就邀我去河边摸鱼。将捉到的小鱼在河边烤着吃，并抹上随身带



的盐末儿，当时我觉得太香了，简直是天下的最美食物。可惜，经五十年时间，大石河水几近断流，更不用说顾太清诗词中所记的“叉鱼活计”以及“鸳鸯横破碧烟飞”的景致了。生态变化之大、之快，令人难以想象，不胜唏嘘，扼腕长叹。

奕绘、顾太清的著述众多，很多还流落到国外。仅诗词，目前已发现奕绘留有 1000 多首；顾太清有诗 826 首，有词 333 首。其五世孙，满学家、清史学家、内蒙古大学教授金启琮先生，倾其毕生精力，研究其家族历史和文化，搜篋寻匮，辩识伪讹，为清代历史研究和其荣府家族史的研究做出巨大贡献。中国诗词学会副会长、革命老干部张璋先生，集数十年之功，编辑成《奕绘、顾太清诗词合集》，除附录中的珍贵研究文章外，收录有奕绘、顾太清的诗词两千多首，可说是奕绘、顾太清诗词的集大成者。其中，记载房山地区的诗词约有 70 余首，可能是中国古代撰写房山地区诗词最多的人。尤其是记载房山区河北镇地域的诗词几近 30 首，应该是中国古代撰写河北镇地域诗词最多的人了。

本文使用的奕绘、顾太清诗词，均出自张璋先生编校的《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第一版。本文作者特向张璋先生表示感谢。



房山新出土民国石碑的刊刻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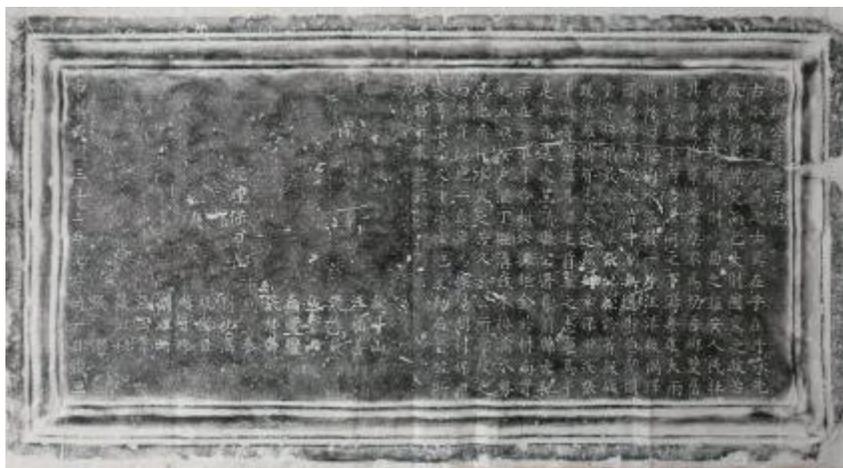
马 垒 *

公元 2019 年初在房山区长沟镇双磨村南出土一石碑，该碑现保存于双磨村委会院内。汉白玉石质，长方形，长 123 厘米，宽 65 厘米，厚 19 厘米，原镶嵌于墙壁之上，自右向左竖刻楷体字，共 33 行，满行 15 字。据双磨村村民今年已 84 岁的张毓梁讲述，此碑的碑文由其父亲张启严题写，碑文中提到的双磨小学就是他曾经就读过的学校。今学校虽早已不存，但此碑的出土揭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陈年旧事。



倡办公益垂示记碑

* 马 垒：门头沟区文物管理所



《倡办公益垂示记》碑拓片

现将碑文整理如下并略作考释：

倡办公益垂示記

古今賢達有為之示奚在乎承先
啟後防患捍災而已大則國家之政治
官府操其權小則鄉曲之謚安人民壯
其事然非羣策羣力不為功吾鄉雙磨
村地勢乎行居灌河之下游每逢大雨
時行之際山水漲發一片汪洋幾同澤
國西疇南畝禾苗冲涮無遺街巷間閭
室宇坍塌最慘前輩張公松齡等擬欲
設法維持有志未逮茲何幸保甲長張
斗山等頗能善繼述前輩之志事焉于
是年春迭次呈請縣公署蒙前縣長批
示在案准予合村公攤鉅金於村南買
地五畝按戶撥丁掘溝伐木排淪水勢
庶免桑梓水災之苦又於公所學校之
西添買隙地一處擴為操場閭村保甲
長等深恐久湮無據也爰勒石於公所
以昭示來茲云

經理保甲長 張斗山 汪福善
張傳巖 張宝山 張 張靜
劉泰 劉柱高 段 趙子珍
劉 張萬青 張玉和 張滑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初一日穀旦

据碑文记载“吾鄉雙磨村地勢乎行居灌河之下游，每逢大雨時行之際山水漲發一片汪洋幾同澤國西疇南畝禾苗冲涮無遺街巷間閭室宇坍塌最慘。”因双磨地勢低洼，所以在民国常遭洪水侵袭。

双磨村南有灌河，今称南泉水河。灌河起自石窝镇水头村，



其特点是山洪水量大，沿河泉眼众多。据《房山县志》载：“灌河，源出自西域寺西北之水头。东南经西域寺之东，其支流引入寺内，又南復折而东，经下庄村又东南流，三岔水、东城寺水先后注之，三岔水有泉。又东南经前后石门东，又南流经高家庄东南，白玉塘水，自西北经四座庙、高庄、万泉庵北，有大泉数眼涌出，灌稻田三顷余，产稻甚美，俗谓玉塘米。又东南经下营北来汇，又经崖上、独树村南，又东南经纸房北，至半壁店经清行宫前，又东经南正、双磨南，至良各庄北，再东南至长沟西而南入涿县界。”^{<1>}

其实早在清朝末年这一地区的洪水就已不可控制，一遇山水涨发，便形成洪灾，据清光绪九年四月立《双磨村重修石桥碑记》载：“畿辅之地西接太行每夏秋之交山泉涨发惊湍湍溜震荡汹涌……双磨村居房邑西南为西陵御道實近太行之麓”^{<2>}至民国二十八年（公元 1939 年），这一地区遭遇了极为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其洪水之凶猛，受灾之惨烈，世间罕有。

因为双磨村地势低洼，一遇暴雨山河暴涨时常受洪涝，碑中虽未特指何时发生洪涝，但通过有关记载来看离公元 1943 年立碑时间最近的那场洪涝唯有公元 1939 年特大洪涝灾害。正如碑中所描述的那样“山水漲發一片汪洋幾同澤國”，显然是经历了一场即为罕见的洪涝灾害，因而迫使该村痛下决心治理河道，排洪泄水，以致在今后几年中沿河受灾村落开始了重建家园，防洪减灾的工程建设中。

巧合的是在房山区琉璃河镇务滋村同样有一通记载着民国



二十八年（公元 1939 年）特大洪灾的石碑，务滋村与双磨村地貌相同，亦处于大河沿岸，民国时期也曾遭遇洪水。今村内存有一通与《倡办公益垂示记》刊刻于同一年的石碑，即《创修云显真泉寺工程告竣碑记》，该碑是村内古刹云显真泉寺内遗物，对研究佛、道、儒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及民国水患具有一定价值，石碑立于民国癸未年菊月即公元 1943 年。

据碑文载：“民国廿八洪水氾滥土房二十余间□其冲到破坏□□□至」首同众復修一新而四方首领恐其復有洪水之患难以延年莫若修成庙宇永垂不朽……”^{〔3〕}可知在公元 1939 年务滋村遭遇一场水灾，洪水肆虐冲毁古寺，沿途村庄被洪水淹没，损失惨重。

关于民国二十八年的特大洪水，文献记载更为详细。

1、据王培秀《房山历代大灾及赈灾略记》一文载：“公元 1939 年（民国二十八年）七月下旬，连日大雨，永定河水暴涨，铁路均被淹没。房山、良乡水灾亦很严重，良乡城进水，沿小清河，琉璃河下游二十多村庄受灾，良田被淹三万多亩，很多民舍被冲塌，大批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据房山县东班各庄不足二百户的统计有八十三户因为灾荒而讨饭，二十七户被迫卖儿女，六十三户逃荒到张家口一带，先后饿死八十三人。（北京师专史地科师生调查。）”^{〔4〕}

2、另据《河北省水利志》记载：“民国 28 年（公元 1939 年）特大洪涝灾。海河流域从南到北普遍发生大水，尤以潮白河、北运河，永定河为重。主要有三次连续暴雨。……永定河卢沟



桥七月二十五日洪峰流量 4390 立方米每秒，洪水冲倒卢沟桥石栏杆，桥面过水，并以小清河漫溢 2580 立方米每秒入大清河系。永定河下游多处决口，洪水在武清县境漫过京山铁路，北运、永定两河洪水在铁路两侧一片汪洋，大清河系各支流多处漫越京汉铁路。”^{〔5〕} 该年洪灾特点是次数多、范围广，暴雨中心比较稳定。

3、《1928—1949 年河北省大事记》载：“1939 年 8 月，由于大雨连绵，山洪倾泻，加之日本侵略军不顾河北民众死活，多处决口，使河北人民遭遇了空前的天灾人祸。进入 7 月后，河北省海河流域从南到北普遍发生大水，尤以潮白河、北运河、永定河三水系为重。8 月 23 日，日本侵略军将大清河、子牙河、滹沱河堤防扒开，决口 182 处，各河无不泛滥，洪水被淹，一片汪洋，秋禾淹没，房屋倒塌，浮尸横流，触目皆是。”“卢沟桥栏杆被冲塌，桥面过水。潮白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潞龙河、滹沱河、胡卢河、滏阳河、古漳河等大河及其支流，均被决口，而以潞龙河、滹沱河两河决口最多，泛滥所至，尽成泽国。”^{〔6〕} 受灾民众食草根、树皮、野菜，饥寒交迫，无以为生。

4、《房山区志》载：“民国二十八年（公元 1939 年）七月二十四日 暴雨倾盆。翌日，卢沟桥下右岸约 1.5 公里处石坝被毁，洪水泄向小清河，直趋长辛店、南岗洼、长阳等处，良乡县 80 余村受灾，受灾 4.3 万户。良乡城内水深丈余。房山县大石河、拒马河均出现 20 年——100 年一遇洪水。沿河农田



被淹，房屋倒塌。人畜伤亡无计，仅下石堡村冲走 19 人。”^{<7>}

5、《河北水利大事记》一书也记载有北京、河北、天津等河道沿线的受灾情况。“本年度大水，各河漫溢决口，水淹天津。日本帝国主义炮轰大清、潞龙、桑杆、滹沱、滏阳等河大堤，并残无人道的对抢险民众施以飞机扫射。总计各河堤防溃决 200 余处，重要险工 43 处，决口 185 处，总共长达 30 余公里，永定河梁各庄决口改道，淹没面积达 55.5 平方公里，受灾人口 800 多万，淹死和冻饿而死的 13000 多人。仅在冀南就淹地达五万顷，水深一两丈。天津市 70—80% 的地区水深达 1—2 米，最深达 2.4 米，大水整整泡了两个月。洪灾之惨烈，可谓近百年来所未有。”^{<8>}

这次特大水灾皆因连续暴雨所致，碑文内容是对民国二十八年房山县遭受水患灾害的真实反映，与史料记载一致。

文曰：“前辈张公松龄等拟欲设法维持有志未”当指张松龄设法维持却能力有限，未能实现大志。碑文中提到的张松龄是清末民初当地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人物。曾在南正行宫当差，清朝灭亡后回村，因善于交际，能迎合官员，颇得赏识，被村民推举为村长，主理村中大小事务。双磨村原有一通功德碑，由临里乡党感念张公善行所立，发起刻碑记文，记载了张松龄的功绩，此碑原立于张松龄墓前方，现埋于地下。笔者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查到了此碑拓片，书载：“张松龄功德碑，京 4257 民国三十年（公元 1941 年）正月刻。碑在北京房山区长沟双磨房。拓片阳、阴连额均通高 155 厘米，



宽 60 厘米，焦毓桐撰康缙正书，刘柱高篆额，阴题名。”^{〔9〕}

碑文竖刻楷体字共 19 行，满行 33 字，文曰：“张公松龄功德碑」左传云太上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备而名……发起人嘱余为文以记之余观此举」美之至也亦何乐而不为乎是为记……中华民国三十年正月穀旦”^{〔10〕} 碑文记载，若想名垂不朽，需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兼备方可。张公因疾没世，恐其事迹无考，房山县怀玉乡双磨村张公松龄有君子之道六焉，张公兼备，其待人忠厚，信其出言，直其见利，兼办公益事业，勇而不怯劳而不倦功德可称者，碑文详细记载张公功绩，其大致内容包括：

一、创办公所，兴办学校。

文曰：“该村向无公所，经公手始探买地基建筑房屋七八间乃倡办学校教育人才附设于此。”因该村尚无公所，由张公创办，购买地基建造房屋七八间，并倡导兴办学校，教育人才亦建于此处。据张毓梁回忆村里最早有一个南大屋叫官房子，房子的西边有一个小房，即公所，这里是主理村内大小事务之处。

民国教育事业处于去旧立新的转折时期，《房山县志》载：“学校前清末季变法图强裁科举立学校新旧学制迥然不同然三代治民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其学制虽略有不同而其讲明伦理造就人才之旨则一也旧制不可从略新制尤不可不详人心之趋向世道之隆污胥于此有关系焉掌教育之责者其留意焉可”^{〔11〕} 房山县的地方教学虽较为艰难，但并未停止。《房山区志》载“民



国前期，县以下按行政区设学区：良乡县设八个学区，房山县设五个学区。学区下辖乡村初级小学称国民小学，完全小学称中心小学。”^{〔12〕}张松龄兴办的学校既是后来的双磨小学，关于该学校《县志》记载房山县五区学校村庄列表中，双磨小学属于第三学区所属公立初级小学校。现村委会后东北角就是原双磨小学所在地，据曾在该学校就读过的张毓梁回忆，双磨小学坐南朝北，民国初期建立，建立之初请南正唐先生教书，学生是本村招来的，五间房中一间是老师宿舍，4间用于教室，授课内容以论语、孟子等内容为主。《倡办公益垂示记》碑在学校门口的影壁墙里镶着。日本统治时期开始分年级并建立了东西屋。公元1948年后学校校舍逐渐废弃不用，房屋拆除，石碑遗弃于乱石堆中，解放初期双磨小学迁至南边地主院内继续教学，请了长沟高庸教书，至此原双磨小学彻底废毁不存。

二、治理河道，修桥通渠。

文曰：“村南襟带灌河，旧有桥梁每逢山水涨发人多病涉公于民国十二年春倡议重建长桥。”村南有灌河旧有桥梁，建于道光十六年，因一遇春夏之交，山水涨发，水势泛滥，至此桥屡修屡毁，有记录的如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张公于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春提议重建长桥增至五空，两端再添石料，甬道十余丈，往来行人无不称便，全赖张公倡导建立。

三、剿灭贼匪，百姓安枕。

文曰：“光绪末年贼匪纠众扰害闾阎公则亲帅壮丁剿捕送



官，俾根株净尽密尔村庄始得安枕顷于丁丑年事变之后公復成立村民自卫团。”光绪末年，这一地区贼匪流寇盛行，时常骚扰祸害百姓，张公亲率壮丁剿捕送官，铲除贼寇，使村庄得以安宁，后于丁丑年事变（公元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张公成立村民自卫团，于六道街口安放栅栏，安户拨丁分持枪械，昼夜巡逻，与邻村相比大不同。

另外在《张松龄功德碑》中提到的发起人“赵子珍、张斗山、张宝山、刘柱高”亦在《倡办公益垂示记》中出现，印证了“兹何幸保甲长张斗山等颇能善继述前辈之志事焉”前后呼应，功成名就。

文曰：“兹何幸保甲长张斗山等颇能善继述前辈之志事焉于是年春迭次呈请县公署蒙前县长批示在案准予合村公摊钜金於村南买地五畝按户拨丁掘沟伐木排淪水势庶免桑梓水灾之苦”即指本村保甲长张斗山等人继承前辈未完成的遗愿呈请县公署批准，准予集资治理河道，买地掘沟，伐木泄水铲除水患。文中提到的公署，即县公署。《房山县志》记载：“县署在城内西大街路北明洪武四年主簿胡同宾修建其后知县王敌曹俊李琮陈庭训马永亨张肇林相继修葺”^{〔13〕}县公署是民国时期主持县内行政事务的办公地点。

值得注意的是碑中提到的“保甲长”为何职呢？其实这是民国政府推行的保甲制度，始于公元 1934 年，是国民党的基层政权组织，保甲长通常由当地地主，土豪，玩劣担任，兼政治警察之任务，国民党对保甲长人选极为重视，以通过此制度



控制民众，维护国民党的统治。

碑文最后提到：“又於公所學校之西添買隙地一處擴為操場”即指将前辈张松龄创办的双磨小学扩建操场一处。据张毓梁回忆建立操场的大概位置在原双磨小学南屋西边一块空地上，即今村委会西北角位置。

双磨村新出土的这通民国石碑真实记载了民国时期洪水肆虐，特别是公元 1939 年的特大水灾使村庄一片汪洋，生灵涂炭。在张松龄的大力倡导下，创办基业，后人张斗山等人继承前人遗志，挖沟放水治理河道，排洪泄水，减轻了灌河水患，使当地百姓受益，村庄得以发展，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此碑为我们揭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民国往事。建国后这通命运多舛的石碑曾辗转漂移多地，公元 1980 年张毓梁见碑遭遗弃，恐丢失村落历史便无从考证，后将碑转运至家中保存。公元 2004 年有人出高价欲买此碑，被张毓梁拒绝，为了妥善保护这通石刻文物，张毓梁决定将碑推至地下掩埋，公元 2019 年双磨村村庄建设，需修地下管道刚好经过石碑掩埋之处，遂将石碑出土，这一段传奇的护宝故事逐渐被世人知晓，现在已经成了当地的一段佳话，村民都称张毓梁是“护碑卫士”。

注释：

<1> 马庆澜等修，高书官等纂，民国十七年编修《房山县志》卷之二·河流。

<2> 据清光绪九年立《双磨村重修石桥碑记》，碑现存房山区长沟镇双磨村。



<3>据民国三十二年立《创修云显真泉寺工程告竣碑记》，碑现存房山区琉璃河镇务滋村。

<4>王培秀《房山历代大灾及赈灾略记》。

<5>河北省水利厅水利志编辑办公室编《河北省水利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81、82页。

<6>河北省国家档案馆编《1928—1949年河北省大事记》，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第209、210页。

<7>北京市房山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市房山区志》，北京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95页。

<8>河北省水利厅水利志编辑办公室《河北水利大事记》，天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0页。

<9><10>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49页。

<11>马庆澜等修，高书官等纂，民国十七年编修《房山县志》卷之四·政治。

<12>北京市房山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市房山区志》，北京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49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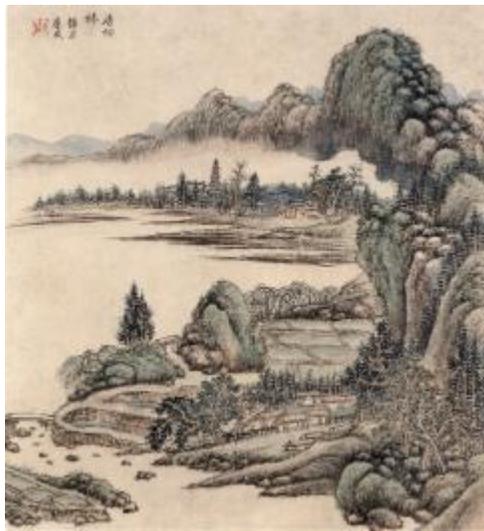
<13>马庆澜等修，高书官等纂，民国十七年编修《房山县志》卷之四·政治。



清代宫廷画家唐岱其人其画

赵思敬*

2016年5月13日，为纪念房山云居寺创建1400年，我区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其中从沈阳故宫博物院借来了清代宫廷画家唐岱的《大房选胜图》册页最为亮眼，这个册页描绘了十三幅大房山秀美的风景，其中的一幅《香树林》画的就是远眺古刹云居寺的风景，画面



《大房选胜图》中的香树林，就是今天的云居寺。

上茅舍俨然，红墙碧瓦，古塔耸立，远山含翠，小溪穿流，田畴点缀其间，好一派清新自然的画图。

唐岱的这个册页，创作于清代康熙五十年，也就是公元1711年，至今已有三百多年。那么，唐岱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

* 赵思敬：原房山区文联秘书长



么要画这个册页，他是给谁画的，他所画的大房山名胜还有迹可寻吗？这里边有什么故事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穿透笔墨丹青的烟云，寻着他们的足迹，在蛛丝马迹的文字记载中，撩开笼罩在北京西南这片神奇的面纱，在拔地秀拥的大房山群峰中寻找答案吧。

一、唐岱其人其画

说起清朝的画家，尤其是生活在康雍乾三朝的画家，在一般老百姓眼里，第一个恐怕要数江苏兴化人郑板桥了。他享年 72 岁，应科举 24 岁为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秀才，雍正十年（1732 年）39 岁为举人，乾隆元年（1736 年）43 岁为进士。官任山东范县、潍县县令。第二个恐怕要数意大利人郎世宁了。他享年 78 岁，清康熙帝五十四年（1715 年）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来到中国，随即入宫进入如意馆，为清代宫廷画家。曾参加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历经康、雍、乾三朝，从事绘画 50 多年，参加了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极大地影响了康熙之后清代宫廷绘画和审美趣味。第三个就要数唐岱了，他字叫毓东，自号有静岩、知生、爱庐、默庄，是一位被康熙皇帝誉为“画状元”的画家。

关于唐岱的文字介绍，人们知之甚少，就是对画画感兴趣的人，恐怕也是看了近年印制的唐岱和沈源、冷枚等人奉乾隆皇帝之命，历经十一年之功绘成《圆明园四十景》图册后才知



其名。在近年的艺术品拍卖中唐岱偶有露面，公元 2016 年北京保利大厦举行的秋季拍卖会中，有一幅唐岱的《仿云林笔意山水》作品，拍卖了 287500 元。据统计，唐岱的作品现存近百件，还可能有很大的升值空间。

（一）唐岱的生卒年

唐岱的生卒年，画史没有明确记载，只有通过有关文献和画作题记等线索推论。唐岱在一幅创作的《晴岚浮翠图》上题写：

晴岚浮翠岛，积雨暗深村。寂寂无车马，溪流自到门。乾隆丙寅夏日，拟大痴笔法写此，时年七十有四。”

丙寅年为乾隆十一年，即公元 1746 年，这一年唐岱七十四岁，结合出生就记 1 岁的惯例往回推算，唐岱应为康熙十二年出生，即公元 1673 年出生。

清宫《内务府各作成活计清档》：

乾隆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张明交“古稀人瑞”匾本文二张，上用缎四匹，龙油泊如意一柄。着怡亲王、内大臣海望俟正月十五日唐岱生日派员赏给。钦此。

乾隆七年正月十五日，司库关福盛将龙油如意一柄、本文一张、上用缎四匹持去赏唐岱，讫。

按照这个记载，乾隆赏赐唐岱“上用缎匹”八匹，还有龙油如意等物。乾隆七年为公元 1742 年，唐岱虚龄正好 70 岁，唐岱的生日为正月十五，这一天乾隆皇帝还为他题写了“古稀人瑞”的匾额，可见对他画艺的欣赏。

唐岱的卒年，现在没有发现明确记载。在画史上有记载说，



壬申作《青山白云图》，这幅画的质地和规格都没有明确记载，也不知收藏于何人何处。壬申年是乾隆十七年（公元 1752 年），唐岱刚好八十岁，此后不知所终，学界一般推断为不久后去逝。

（二）唐岱的旗籍

唐岱出生的那一年，京师发生大地震，平西王吴三桂起兵反清，杨起隆伪称朱三太子在京师作乱，朝廷危机四伏。有关唐岱家族的档案，即使有记载也难以保存。关于他的旗籍，就出现不同记载。清朝陈焘《读画辑略》说：

唐岱，字毓东，号静岩，又号默庄，知生等，生于康熙十二年（公元 1673 年），满洲正蓝旗人，旧系红兰主人宗室蕴端属下。

清朝李放《八旗画录》收入八旗画家达 200 多人，对唐岱介绍说：

唐岱，字毓东，号静岩，一号默庄，满洲正白旗人，由荫生官至内务府总管。

唐岱是正蓝旗人，还是正白旗人？仅凭这两个材料，不敢下结论。那么，就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八旗吧。八旗制度起源于满族的军事和生产相结合的组织，努尔哈赤于公元 1601 年建立了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公元 1615 年又增加了四旗，将原有黄、白、红、蓝四旗镶以白边，即成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这就是满族八旗，后来，人们习惯称为旗人。唐岱的先祖居住长白山，本应是汉人，后有“择主之明”，跟随清太祖、太宗皇帝起兵创业。加官进爵为光禄公，授世袭爵位。



唐岱曾任骁骑参领，“身膺武职，从军塞外，万里奔驰”，官品为正三品。

唐岱的先祖是谁？清代弘昼、鄂尔泰、福敏、徐元梦等奉清高宗弘历之命编纂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有一段记载：

八达巴颜，正蓝旗人，岱图库哈里同族，世居扎库木地方，国初来归，其曾孙劳翰，由闲散攻取抚顺，首先登城克之，后攻义州阵亡，赠骑都尉。其子萨拉奇承袭，遇恩诏加一，云骑尉卒。其子萨喜承袭，原任步军副尉卒。其子唐岱袭职时，削去恩诏所加之职，现袭骑都尉……

这里所说的扎库木地方，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新宾县境内，有一个叫八达巴彦的人归顺了正蓝旗，他的曾孙劳翰应征入伍，在努尔哈赤率军攻取明朝抚顺的战争中奋勇当先，率先登城。后来在攻起义州就是今天锦州市属的义州城时战死。追赠他为骑都尉，他的儿子萨拉齐承袭了爵位。此后其孙萨喜承袭，其玄孙就是唐岱，到他承袭时已经削去了恩诏所加之职，承袭为骑都尉之职。由此看来，唐岱应为满洲正蓝旗人。

（三）唐岱的老师王原祈

唐岱在《绘事发微》自序中说：“幼赋性疏野，读书之暇，有志画学”。按照唐岱晚年自叙，年青时他曾经参加科考，但“两试不收售”，两次都名落孙山。从军期间也没有建功立业。这一生放不下的只有痴迷于绘事。正因如此，他才“得交于东南之士”，认识了影响他一生的名师王原祈，成为他的入室弟子，这时他还不到二十岁。



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列传二百九十一》记载：

唐岱，字毓东，满洲人。康熙中，以荫官参领。从王原祁学画，丘壑似原祁。

王原祁这个人可不得了，他师承董其昌，创造了“娄东画派”，对宫廷和后世画坛影响甚大。他是江苏太仓人，其家收藏书画巨富，他爷爷王时敏，是明朝万历二十九年（公元 1601 年）进士，为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的高足。王时敏晚年竭尽所能将绘画技艺传授给孙子王原祁。据说，有一次王时敏看到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幅画，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是什么时候画的，直到小孙子王原祁笑出声来，才吃惊地发现这幅自己难辨真伪的画，竟然是 13 岁的孙子画的。

王原祁很快成长为远近闻名的画家。康熙九年（公元 1670 年）二十八岁的王原祁考中进士，由于康熙皇帝推崇董其昌的书画，很快，王原祁由知县擢升给谏议，这个职务，主要是负责鉴定皇宫收藏的古今书画。后又入翰林院担任供奉画家，补春坊。春坊指太子居住的宫殿，可见他还负责皇子们的教育工作。从此供奉内廷的王原祁创作了许多流传至今的作品。

由于王时敏家住在太仓，太仓也称娄东，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始发地，也是昆曲和江南丝竹的发源地。又因为王时敏、王原祁为核心的画家都居住于此，所以人们便称他们为“娄东画派”。王时敏开创了“娄东画派”，后人将他与王鉴、王翬、王原祁并称四王，外加恽寿平、吴历合称“清六家”。随着历史的进程，“娄东画派”也开始成为众人追随、引领中国画坛



的第一画派。

娄东成为一个流派，是在王原祁取得显赫地位，影响逐渐扩大，追随者日多的时期。公元 1931 年孙俔工编著的《中国文艺词典》，在王原祁词条下列有一个入室弟子名单，依次为：

华鲲（字子千，无锡人）、金永熙（字明吉，苏州人）、唐岱（字静岩，号毓东）、王敬铭（字丹思，号味闲，嘉定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曹培源（字浩修，上海人，麓台赘婿）、李为宪（字匡吉，号巨山，麓台之甥）、温仪（字可象，号纪堂，三原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赵晓（字尧日，太仓人）王昱（字日出，麓台族弟）黄鼎诸人。就中王敬铭、李、金、曹有四大弟子之目。麓台的著作有《雨窗漫笔》一书，足为后学的矜式。

可见，王原祁弟子多是政坛高官、艺苑高手。

据记载，王原祁在康熙南书房为内廷鉴定书画之余，还与孙岳颁、宋骏业、吴璥、王铨等纂辑了中国书画史上的一部类书巨著——《佩文斋书画谱》。这部清代书画类书共计 100 卷。分论书、论画、帝王书、帝王画、书家传、画家传、历代无名氏书、康熙皇帝御制书画跋、历代名人书跋、历代名人画跋、书辨证、画辨证、历代鉴藏等。所引古籍 1844 种，其中对书画家传记的引证，均注明出处。保存了许多重要的资料，为中国第一部集书画著作之大成的工具书。

清康熙四十一年（公元 1702 年）的一天，康熙皇帝带着许多文武大臣，到整修一新的朝阳门外东庙参加落成法会。皇帝为庙宇题写匾额后，又专门为王原祁题写了“谷谿堂”三个字，



这种殊荣使他备受荣宠，从此官运亨通，地位显赫。70岁以后，王原祁荣升翰林院掌院学士、经筵讲官，画名大噪朝野。

（四）唐岱师承王原祁

俞建华编著的《中国古代画论类编》有王原祁《雨窗随笔》，其中说：

作画但须顾气势轮廓，不必求好景，亦不必拘旧稿，若于开合起伏得法，轮廓气势已合，则脉络顿挫转折处，天然妙景自出，暗合古法矣。画树亦有章法，成林亦然。

临画不如看画，遇古人真本，向上研求，视其定义若何？结构若何？出入若何？偏正若何？安放若何？用笔若何？积墨若何？必于我有一出头地处，久之自与膺合矣。

这是王原祁重视观摩古画，从中继承技法，开创自家门径的方法之一。唐岱便是这样随王原祁学习绘画技艺的。不仅如此，王原祁还与弟子们挥笔合作，以便相互观摩学习交流。

王原祁长唐岱三十二岁，师徒二人何时相识，怎样拜师学画，我们现在一无所知。所幸的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张王原祁和王翬带领唐岱、黄鼎、禹之鼎、杨晋等三十多个弟子，为被誉为四大布衣诗人之一的徐兰合作的一张《芝仙书屋图》，此图画心高130厘米，宽68厘米，现藏广东省博物馆。通过这幅作品我们感觉到王原祁借这次笔会，为唐岱创造了一次与师友们交流画艺的机会。

清末学者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记录了《芝仙书屋图》雅集的盛况：



康熙戊寅之夏，翠下诸名人合写《芝仙书屋图》，画者三十人：王原祁、宋骏业、禹之鼎、顾士奇、张振岳、杨晋、顾昉、沈坚、黄鼎、刘石龄、郑淮……唐岱，而始写树石未，复补远山一角者，石谷子王翬也。诗者六十者人，皆余思祖为之书，姚奎、袁启旭……。慈眎也。题识者孔毓圻，而陈奕禧为之书。是图不知今落何许，录之足存国初雅人姓字，并以见皇畿才彦之盛也。

在这里，陈康祺有一处误记，观看这张作品的落款是“丁丑三月”，按照干支推算时间为康熙三十六年，不是他记录的“戊寅之夏”康熙三十七年，此时唐岱二十四岁。

我们推断，笔会当以王原祁首先开笔。清人张庚在《国朝画徵录》中记录了一段王原祁作画的过程：

……展纸审顾良久，以淡墨略分轮廓。既而稍辨林壑之概。次立峰石层折树木株干。每举一笔，必审颇反复而日已夕矣。次日复招过第。取前卷少加皴擦，即用淡赭入藤黄少许，渲染山石以一小熨斗贮微火熨之，干再以墨笔干擦石骨，疏点木叶而山林，屋宇、桥渡、溪沙了然矣。然后以墨绿水，疏疏缓缓渲出阴阳向背。复如前，熨之干再勾、再勒、再染、再点，自淡及浓自疏而密，半阅月而成。发端混仑，逐渐破碎，取捨破碎，复迅混仑。流灏气粉虚空无一笔苟下，故消磨多日耳。古人十日一水，五日一石，洵非夸也……。”

从这段叙述看，王原祁强调意在笔先，经营位置，以淡墨画出山水轮廓，反复叠加以后，再皴擦点染，步骤由淡及浓，



将笔、墨、色融合于圆融之中。这就体现了王原祁“熟不甜，生不涩，淡而厚，实而清”的作品风格。

《芝仙书屋图》的创作风格，显然不是这种风格，他是以王翬写的风格为主，否则，这次笔会将持续十多天。这幅作品画风秀雅，近景为水岸，疏林秀木，舟船停泊；中景屋舍明丽，树木滋荣；远山清爽，隐隐在望。这幅作品笔墨简洁，格调统一，笔墨浑然一体。唐岱在这幅画的中景左边山石间，画了水阁和小树，属于点景之作。并在上方题写了“长白唐岱补水阁傍树”。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题字下的这方印章为“臣岱”，这说明此时他应该进入清朝宫廷，为专业画师奉旨作画。

（五）唐岱与宫廷绘画

唐岱何时进入清廷作画，多数学人倾向于雍正年间，但他的画名在康熙朝就已远播海内。

我们现在见到唐岱较早的一张作品是他 19 岁（公元 1692 年）所作绢本《青山放舟图》，这幅作品规格为高 116 厘米，宽 52.6 厘米。画面近景为山坡双松挺立，杂树交织，远景为青山飞瀑，两艘小舟掩映在树荫之下，两位老者相对而坐，一个童子撑篙欲行。右上方题款识：依迟放舟楫，惆怅出松萝，忍别青山去，其如绿水何。康熙壬申立秋后二日，静岩唐岱写。钤印：唐岱之印。这幅作品在 2008 年 12 月 20 日在敬华（上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底价人民币两万到三万，成交价不得而知。2017 年 8 月 2 日保利公司中国古代书画夜场，拍卖一幅唐岱于乾隆十二年（1747 年）为多罗宁郡王仿董巨山水立轴



水墨纸本，规格为 189 厘米 × 104 厘米，估价为二百八十万到四百八十万。成交价不得而知。几年之间，价位长势很快，可见人们对唐岱作品的认识有了突破性的认识。

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列传二百九十一》记载：

唐岱，字毓东，满洲人。康熙中，以荫官参领。……供奉内廷，圣祖品题当时以为第一手，称“画状元”。历事世宗、高宗。高宗在潜邸，即喜其画，数有题咏，后益被宠遇。唐岱专工山水，以宋人为宗。少时名动公卿。直内廷久，笔法益进，人间传播者转稀。着《绘事发微》行世。

清人陈康祺所撰《郎潜纪闻》说：

圣祖天纵多能，艺事无一不学，亦无一不精。凡暇作画赐廷臣，今海内旧家，尚有宝守者。时满洲参领唐岱，号静岩，工山水，尝召入内廷论画法，因御赐画状元。

康熙皇帝对他的画赞叹不已，称其为“画状元”。唐岱应该受宠若惊。唐岱在宫廷经历雍正、乾隆两朝，创作了多少作品，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查阅由乾隆皇帝命令大臣编纂的《石渠宝笈》初编、续编和三编，和嘉庆朝胡敬编辑的《国朝院画录》，可知宫廷所藏唐岱的作品数目。这四本大型工具书各收入唐岱多少幅作品？《石渠宝笈》初编收入 17 件，续编收入 10 件，三编收入 13 件。《国朝院画录》收入 25 件。这些作品大多是唐岱独立创作完成，也有奉旨为乾隆皇帝之作补景或与其他画家合作的作品，还有根据悬挂位置以宋元画家笔意创作的作品。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乾隆元年记载：



内大臣海望奉上谕：将画画人冷枚传来，照慈宁宫画画人赏给钱粮。令伊将圆明园殿宇处所照画过热河图样，每处画一张，绘总画一张。钦此。

四月十六日，员外郎常保传旨：“冷枚现画圆明园殿宇处，俟绘总时，令郎世宁、唐岱、沈源绘画。钦此。”

乾隆三年正月初六日，（如意馆）司库图拉来说，太监毛团传旨：圆明园着沈源起稿画册页一部，沈源画房舍，着唐岱画土山树石。钦此。

清代皇帝喜欢用图画这种形式，记录重大事件和园林建筑，乾隆元年（公元 1736 年）正月，乾隆皇帝传旨画师冷枚，按康熙朝绘制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为圆明园各处建筑起稿分景画样。不久又改令唐岱、沈源合作。由沈源画房舍，唐岱画土山树石。后来经过乾隆六年和乾隆九年两次增加 7 幅，形成《圆明园四十景图》。图册为绢本彩绘，各幅图分别附有汪由敦所书乾隆皇帝题诗，共计 40 对幅。每幅图的绢心为高 64 厘米，宽 65 厘米，连装池绫边为高 83 厘米，宽 75 厘米。全图分为上下两册，配楠木插盖匣盛装。首册画页之前分裱雍正书《圆明园记》和乾隆书《圆明园后记》。在上下册各最后一景的图、诗末尾，分别款书“乾隆九年甲子九月奉敕，臣唐岱、沈源恭画”和“工部尚书臣汪由敦奉敕敬书”字样。这套四十景彩绘图，直至乾隆十一年四月，才最终裱成呈进。公元 1860 年这套珍贵的彩绘图被侵略者掠走，现存法国巴黎博物馆，直到近年被发现才得以在公元 2004 年出版面世。图册中唐岱



画的山水无论远近皆工细有度。但只有“淡泊宁静”这幅画落款为“敕臣唐岱，臣沈源恭画”，虽然是合作，但图册风格一致。例如第三景——九州清晏。是雍正继承大统前所建花园，其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康熙皇帝将此园赐名“圆明园”，康熙帝御书三字匾牌，就悬挂在圆明园九州清晏景区圆明园殿门额上方。对“圆明”二字，雍正帝解释：“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在这幅画面上，一组组建筑排列有序，鳞瓦参差，唐岱所画山石树木，攒聚疏散，以浓阴浅深笔法，分出近远。又以浓淡的墨色，点缀枝叶，极具重叠深远的趣味。前景平湖满目，周围水环山绕，渐行绕过纵横建筑群，水映远山，俨然浔阳九派，天然图画。再如圆明园较早建成的一组清静建筑——碧桐书院。建筑由错落有致、形态各异的大小院落组成，共三进院落。画面前景为平桥接引，其后坡石水亭，梧桐清辉，绿茵如盖，山间瀑布飞流，树木掩映。使人想起唐岱所著《绘事发微》“水口”篇所论：“画水口垂瀑，须从流水之两旁皴染，使阴凹黑暗，以显石面凸出，水向峡中流出。水口之上，垂瀑源头，宜加苔草遮映，一派一滴，皆要活泼，似有潺湲之声。”还有绝尘中的雪景——别有洞天。画面屋舍俨然，山头的白雪与屋顶白雪相互衬托。草木清疏，犹如世外。湖水平波，曲桥接岸。近景曲桥亭榭，唐岱不画水波，只用笔墨勾勒渲染水岸，雪景意境全出。翻阅这本册页，深感唐岱等画家对自然的观察之细腻，创作之精工。也是我们在三百多年后，了解和认识圆明园提供了宝贵图画资料。



唐岱在奉旨创作之余，还临摹了许多先贤之作。他对临摹古画，在《绘事发微》中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凡是临摹旧画，须细阅古人名迹。先看山之气势，次究格法，以用意古雅，笔精墨妙者为尚也。而临旧之法，虽摹古人之丘壑梗概，亦必追求其神韵之精粹，不可只求形似。诚从古画中多临多记，饮食寝处，与之为一，自然神韵浑化，使蹊径幽深，林木荫郁，古人之画，皆成我之画，有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之叹矣。故临古总要体裁中度，用古人之规矩格法，不用古人之丘壑蹊径。诀曰：落笔要旧，境界要新，何患不脱古人窠臼也。

临摹古人旧作，唐岱提出三个心得，一要专心研究古人真迹，从中找出规律；二要追求古人神韵，笔墨合乎法度；三要融会古人之法，创作属于自己面目的作品。这些观点至今适用，是金针度人之论。那么，唐岱都擅长古人的那些古人的技法呢？

《墨妙珠林》（申册）著录唐岱《仿二十四家山水》册页24对幅，设色山水。每幅纵一尺九寸，横一尺二寸六分，全幅二尺八寸。共仿山水画家24人：仿曹知白、仿董源、仿范宽、仿高克恭、仿关仝、仿郭熙、仿黄公望、仿慧崇、仿江贯道、仿巨然、仿李成山、仿李思训、仿李昭道、仿米芾、仿王维、仿倪瓚、仿王蒙、仿王诜、仿吴镇、仿许道宁、仿燕文贵、仿赵伯驹、仿赵令穰、仿赵孟頫。可见，唐岱对于各家门派技法都了然于心，可以随意临摹或创作。结合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仿王蒙山水》、《仿倪瓚清音阁图》，和收藏于广州市美术馆的《仿大痴山水》，



以及收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仿李成山水》，就可以看出唐岱对前人的继承和崇拜，同时也说明在坚持传统技法的同时，将绘画风格融于皇家富丽豪华气派的本领，令人叹服。

唐岱经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即使从雍正朝进入宫廷，乾隆十七年离开宫廷，创作初期从以继承其师王原祁单纯的“仿古”技法，走向“脱古”技法，最后走向“升华”的新路，他的作品给人一种清新温润的印象。

二、《大房选胜图》有关人物

我们知道，《大房选胜图》是沈阳故宫公元 1962 年从上海荣宝斋购买，册页为纸本，高 36 公分，宽 29.5 公分。画心高 26.5 公分，高 23.3 公分。封面封底为金丝楠木板，封面有“唐岱大房选胜图，十三页，丙子冬月，棠村藏”字样，国务院文物专家鉴定组鉴定为唐岱精品。现在我们探讨唐岱为什么要创作《大房选胜图》，好在他在第十三开上的题记，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线索。题记如下：

匡山老人既遂初服，闻友人言，牟山间静，将欲卜居。庚寅秋仲同余及可青钱子、大钵山人，往返五百余里。见牟山风景未能遣俗，遂遍历西山、大房选胜，得瀑布崖侧丁家洼村，民风淳沕，水石清莹，乃定筑居之志。命余绘作长卷，昭示世人。又择其景物之最超逸者，各绘一图，作晏闲欣赏，谊不能辞，聊就所识于心目者，图成十三幅，以副高踪，知必相赏于牝牡



骊黄之外也。康熙五十年，岁在辛卯首春谷旦，题于拙存堂。
静岩唐岱识。

很显然，唐岱这个册页《大房选胜图》，是为匡山老人创作的，这里涉及到三个人：匡山老人、可青钱子、大钵山人。这三个人中，可青钱子的身份是个谜，一直没有查到有关记载，我们首先可以确定是大钵山人——马长海。

（一）大钵山人马长海

清末掌故专家震钧（1857-1920）所撰《天咫偶闻》，收录有一篇李锴的《马山人传》，使我们脑洞大开：

马长海氏那兰，字汇川，清痴其号也。先时为乌拉部长，其高祖苏伯海，率所部归我太祖高皇帝，授都堂。父马期累官都统，以平滇功，晋镇安将军，守滇。伯叔兄弟并后先登显秩。山人初肄举子业，非所好，去。继以镇安功予荫，又不就。其伯氏为之请补民部后库。使檄下矣，山人始知之，复坚卧不肯起。母太夫人怪之。山人曰：“库使司帑，藏岁丰入，惧及焉，逃死非逃富也。”太夫人贤，听之，遂布衣终其身。山人冲远任真趣，囊括一切，了无容心。遇佳客每娓娓谈，再叩之则忘之矣。杖笠有所如，行辄遗之，不觉也。博古多识，辨金石器往往而中。酷嗜画，当意则倾筐购之。尝裘衣裘往吊所亲刘氏丧。刘氏贫，事不办。山人济之，解其裘。归途见未见书，买之。解其衣，由是中寒疾。乃夷然伏枕曰：获多矣。山人既不事生产，家遂中落。然衣食或不给，而所好殊未移，臧获别有所之者，听大司寇巢可托寄斋、牧山居士图清格月坡，并有别墅据



佳胜。每迟山人至，辄林泉水涯相探索。或篝镫命酒，商榷所闻。长安传之，举以为佳事云。山人中岁爱易水之雷溪，筑大钵庵，自号雷溪居士、大钵庵主。晚入长安，居委巷，又颜其阁曰“玉衡”。悬画四壁，对之吟讽。其诗矩矱古人而不胶于固，断句尤冠绝一时，声藉甚。王公贵游争欲识之，而山人落落任放如故云。乾隆九年三月卒，年六十有七。

鄂文端公云：汇川生于勋旧，高爵厚禄，其所自有。乃好读书，浮云富贵，胸襟浩浩。不知有王公贵人，亦不知有山农石隐。盖嚼然不滓之怀，魁杰崛宕，擅秀孕奇，发于流峙之间。球鍠激韵，露生以灵，冲襟以旷，有自得其为汇川者。

先说说作者李锴，他字铁君，字眉山，号廌青山人，雅好诗文，奉天铁岭人。与马长海、景元，并称为“辽东三老”。可见作者对马长海非常熟悉，有资格为其作传。

从这篇传记中，我们知道马长海，字汇川，号清痴。工诗画，好收藏，喜禅悦。在易州雷溪建造草屋，命名为大钵庵，自号大钵山人。一生爱书，好接济人，自己的斗笠随手丢弃，也没有感觉。家里的仆人偷盗东西，却听之任之。晚年回到京城，将自己的阁楼命名为“玉衡”，有冰壶玉衡的感觉。生于清康熙十六年（公元 1677 年），卒于乾隆九年（公元 1744 年）。满洲镶红旗人，镇安将军马期之子，一生辞荫不仕，以布衣终老林泉。他所建造的大钵庵，就在易县东南 80 里的雷溪，雷溪就像黄河上游的壶口一样呈现奇观，它是徐水河的上游。发源于五回岭，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诗篇。雷溪在历史上属



于易州管辖，“雷溪春涛”为易州十景之一。

(二) 谁是匡山老人

在马长海的这篇传记里，还有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大司寇巢可托寄斋”有别墅；二是“牧山居士图清格月坡”，也有别墅，两人的别墅“据佳胜”。马长海经常到两人的别墅做客，“每迟山人至，辄林隈水涯相探索。或篝镫命酒，商榷所闻”。这件事令人羡慕，在京都传为美谈。

那么，这两人是谁呢，先说巢可托，字素侯，又字寄斋，官至刑部尚书，满洲正蓝旗人。再说图清格，字牧山，号月坡，又号牧山老人，满洲正红旗人。前面唐岱题识长文曾说“匡山老人既遂初服”这位匡山老人极有可能就是巢可托，既遂就是已经完成的意思，初服就是脱下官服穿上以前的衣裳。源于《楚辞》：“进不入以尤离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屈原的意思是说，在官场中，既然我的进言不被听从、采纳，自己反而获罪，倒不如脱下官服退居草野，把我的旧服重整起来。从这一句可知匡山老人官场刚刚失意，听友人说牟山风景闲静，于是四人结伴游览，往返了五百多里地，感觉牟山风景不如人意。这个牟山在哪里呢？

查阅有关地理词典，有两个牟山。一个是浙江余姚市的牟山镇，位于宁波的最西首，被誉为“姚西明珠”，这里背靠青山，面对绿野，境内有宁波第二大天然淡水湖——牟山湖。牟山湖三面环山，传说此处有金牛出水露角，故称牟山湖。湖西的千年古樟树底下就是五夫营房。据传南宋岳飞部将牛皋曾在这里



扎营练兵，留有岳王庙古迹。另一个牟山在河南鹤壁市区西北，其山海拔高度 764 米，素有小泰山之称，其山势奇崛雄伟，高耸入云。站在山顶远眺，太行雄姿，淇水风光尽收眼底。我以为，如果他们从马长海在易县雷溪出发，游览的应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前者即使距离北京也有两千多里地，而后者只有五百多里地。

匡山老人选定在房山丁家洼建造别墅后，应该有了新的称谓——房山老人。

(三) 房山老人巢可托

国家图书馆藏有马长海的诗集抄本《雷溪草堂集》，1991 年被李树田编入的“长白丛书”第五辑，其中不乏咏房山之作。现在我们就欣赏几首：

房山道中晓行

林密星疏湿水涯，一天霸气结须眉。
月浮人梦寒流夜，雪压鸡声冷出篱。
老去更多儿女累，贫来仍有路途悲。
骡纲仿佛商山道，四皓高眠总不知。

这首诗显然是作者从丁家洼房山老人家中出来，赶路途中观看丁家洼村边瀑水涯的感悟。中四句描写了天气之寒冷，感慨人生老去多悲的现实。末句的“四皓”是个典故，说的是秦朝末年的四位博士：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角里先生周术，他们的年龄都超过八十岁。四人晚年隐居于商山，后人用“商山四皓”代指年高有名望的隐士。这里是说，



赶路的骡队行走时遇到的困难，也像行走在隐居的路上一样不容易，这个甘苦在商山高眠的“四皓”哪里知晓？

再看马长海为巢可托尚书作了一组房山名胜诗歌，这里透露出许多历史信息，为三百多年前房山名胜提供了宝贵资料：

房山六绝句，为巢尚书寄斋赋

挹岚登

峨峨大房山，依杖一时眺。

雪霁数峰青，风吹暮寒到。

留云坞

手携青布囊，时贮白云影。

醉枕白云眠，山风吹不醒。

独树庵

三峰露远光，一树遮兰若。

时与山僧期，婆娑明月下。

天 桥

秋水饮垂虹，扶杖过桥去。

回望四山云，隔断人来处。

柳 泉

寒泉石壁闲，古柳秋云冷。

道心集虚无，悠然与之静。

石 阙

夕阳淡远天，岚影昏石阙。

采药独归来，青林吐初月。



现在我们对这些景点进行考证。第一首“挹岚登”，写的是丁家洼村北的幽岚山，人称雾山、大象山，详细介绍容当后叙；第二首“留云坞”，是指丁家洼村西，今天燕房大件路公路桥下所处水流。双泉河在此形成瀑布，水流飞溅，形成凹槽。巨石上有“白云大隐”篆书大字“留云坞”，近年桥梁加固时埋入水泥基础中。第三首“独树庵”，写的是大石窝镇的独树村，这个村名见于北魏酈道元著的《水经注》卷十二，称“独树水”，即今南泉水河。独树村名也见于云居寺内唐代石经题记《佛说造立形象福报经》，称“独树合村经主名”题记，可见独树村已有 1500 多年的历史。这里所说的“独树庵”应与云居寺僧刻经有关。第四首“天桥”，写的是原燕化公司迎风五里邮局对面家属区的“天桥沟”此为一条南北山沟，约有二里地长，雨季沟中多水，沟上自然形成一座花岗岩石桥，站在桥上可以远眺大房山。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民工炸山凿石毁了天桥沟。桥头山岗多风化巨石，有隋代雕刻的一佛二菩萨造像，俗称猴头石。1986 年燕化公司开辟生活区，将一佛二菩萨造像石移入燕山公园，成为公园一景。当然，这个天桥也可能指的是红螺三险第三险的“天桥”。第五首“柳泉”，指的是丁家洼村东南石壁间一股常年不竭的“水泉”。泉边有古柳树。此水近年断流；第六首“石阙”，当指房山老人从雾岚山采药归来，背后大山犹如石门相对送客。这组诗既写了房山景色，也记录了房山老人的日常生活。那么，怎么证明巢可托就是房山老人呢。请看下一首：



秋日访房山老人不值

居处林泉伊画屏，尚书清节号仪型。
 月来古屋生虚白，云去秋山出淡青。
 几卷诗传辽海雪，一家禅诵大雷经。
 昔年曾与香山社，惭愧狂歌许性灵。

题目“秋日访房山老人不值”，说明大钵山人这次白跑了一趟，只留下一首七律。首先他夸赞丁家洼村林泉高致，犹如画屏一样。接着称他为“尚书”，这一定是巢可托了。接着点出“古屋”，透露出巢尚书买的是“二手房”，生“虚白”源于庄子的“虚室生白”，说明屋里空旷，主人生活简朴。“诗传辽海”说明他是东北人，据记载巢可托有《花雨松涛阁诗集》，可惜未见。否则，我们会了解更多信息。“大雷经”，一般指诵念佛经，声如雷震。“香山社”指的是当时文人墨客结社聚会。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另一首推断巢可托对于官场失意的无奈：

与巢寄斋尚书

朱华替春风，炎羲薄青林。
 倏焉变时序，天地初无心。
 君子济川舟，万斛其所任。
 风波阻前修，荐止免溺沉。
 愴焉抱幽素，修洁如邴愔。
 仕已无愠喜，忧患何能侵。
 湖穷牛角涯，山挟幽岚岑。



弋钓寂可托，林庐孚所欣。

悠悠人闲世，回睇无古今。

沧溟引遐想，万物等蹄涔。

开篇点出，山野的“朱华”即红花，代替了官场的得意“春风”，不知是一件什么“无心”的事，引起了政坛“时序”突变。突变的“风波”阻止了刑部尚书以往的志向，其中隐情可能与刑事案有关。这里的“水”有多深，尚书自己恐怕也不知晓。现在面对退归林泉，已经没有仕途上的幽怨和惊喜，所以也就没有了往日的忧患缠身。回首人间的是是非非，许多事情都是一样，无所谓古代也无所谓今天。这是好意规劝昔日的巢尚书，在“悠悠”人世间要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所经历的事都会象雨水中的“蹄涔”一样消失得了无踪影。读到这里，自然明白马长海是一个“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桃花园中人。

(五) 唐岱两画房山名胜图

至此，我们已经基本明白，唐岱、大钵山人马长海、可青钱子和巢可托四人在游览了河南的牟山之后，感觉那里的景色一般，在“未能遣俗”的状态中，又在路过房山途中，请注意，那时出京城后，从长辛店向西进入云岗，过王佐，奔南四位村、北四位村、大石河渡口，然后到羊头岗、丁家洼，进入房山县城。所以丁家洼相当于南北交通的驿站。在这里他们决定游览房山名胜，按照唐岱所画之图，往北边游览了佛子庄的龙神庙，南到云居寺香树庵，顺便还到涑水釜山一游。经过实地考察，巢可托决定不走了，就在丁家洼村买了一套“老屋”。他向唐



岱提出了一个要求，为其画一长卷。以“昭示世人”，不用问，唐岱可能没用几个月就为他画好了。个人猜想，这个长卷应该以丁家洼村为主，然后画了金陵、雾山一



唐岱《大房选胜图》甲子峪图

带的风景。一年之后，唐岱将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房山名胜，在脑子里筛查了一遍。将其中最“超逸”的名胜，绘成十三开图册。才有了我们看到的《大房选胜图》。

唐岱在题记的最后提到一个人：高惊，这个人应该懂得绘事，又了解唐岱所绘房山名胜景点。因为唐岱的技法师承“南宗”，与实际风貌有很大差距，所以他说高惊知道绘画的道理，必“相赏于牝牡骊黄之外也”。牝牡骊黄是什么意思？典出《列子·说符》：善于相马的伯乐年老了，推荐九方皋代替自己为秦穆公访求骏马。九方皋领命奔走四方，三月后在沙丘寻找到了骏马。回到朝廷后，秦穆公问：你见到了什么样的马？九方皋回答说是“牝而黄”，黄色的母马。秦穆公马上派人去一看，却是“牡而骊”，黑色的公马。于是责备伯乐怎么带出这样的徒弟。伯乐喟然叹息说：“若（九方）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九方）皋之相马，乃有贵乎马



者也。”意思是说，九方皋所注意的是马的风骨品性，那些外表他已不去留心，这正是他善于相马的证明。等到从沙丘将马取来，果然是天下稀有的一匹良马。这就



唐岱《大房选胜图》后题跋。

告诉我们，艺术创作和现实风景有一定的差距，不要生搬硬套的用图画对照实景的风貌。唐岱的这个提示，符合艺术创作规律。

唐岱在《绘事发微》中有论述山水画的“丘壑”一章，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创作主张：

画之有山水也，发挥天地之形容，蕴藉圣贤之艺业。如山主静，画山亦要沉静。立稿时须凝神澄虑，存想主山从何处起，布置穿插，先有成见，然后落笔，使主山来龙起伏有环抱，客山朝揖相随，阴阳向背，俱各分明。主峰之肋，傍起者为分龙之脉，右耸者左舒，左结者右伸。两山相交处，可出流泉。峦顶上宜攒簇窠丛。悬崖直壁，势虽险峻，而宜稳妥，矫树垂藤，悬披斜挂。山麓坡脚，须置大树长松，三之五之，或欹斜而探水，或耸直而凌云。沙水穿插，滢洄石间，危桥渔艇，相景而作。村墟烟火，宜在藏风聚气之所。孤亭草阁，水涯岩边，参差间出。主山来龙，不过三折；客山迤邐，只用两层。飞瀑向



冈峦窄狭中陡落。山腹旷阔，须有云烟缭绕。古塔殿脊，树丛中微露一二。孤峰要瘦，遥瞻主山。画远山，远则低，近则高，但不可越出主山，以损气势，用一层，用两层，衬靠近山，并以有情为妙。诀曰：岑峦辨明晦，林木须高下。以树根之参差，分坡脚之远近。至于烟岚云霭，或有或无，总在隐没之间写照。一草一木，各具结构，方成丘壑。知此中微奥者，必要虚中求实，实里用虚，然后四时之景，由我心造，山川胜概，宛然目前。学者能运用规矩之中，神明规矩之外，庶几其得之矣。

关于一幅画的构图，主山的位置、走向，两山间的瀑布，近景坡脚的远近，树根的参差，虚实的要求，皆有心造。这样一来，就能将自然风景运用于“规矩之中”，神来之笔便能达到“规矩之外”了。正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唐岱还论述了“村寺”的绘画要求：

凡画山寺殿宇，宜作重檐飞梢，浮图插云，在高岩绝壁之处，松杉掩映，似有高僧隐士，栖止其上，使观者顿生世外之想。谷内村墟，宜有深林遮蔽，少露屋脊，樵径斜穿，盘纤曲折而下。山麓茅店，可当途小亭，踞林麓幽绝处。至两峰狭窄之间，宜筑关隘，只一路可通。磴道断崖，须以栈补。涧水奔流，则搭危桥，以通行旅。城垣惟画古堞烟墩，或在岭巅峰畔，山缺处用城堞接连，望之真似人迹不到处也。或雁度寒云，或马嘶古道，或崇山峻岭，陡开大阳，旷野平林，烟火攒簇，樵斧耕锄，隐约在目，是隐遁所居也，在北地则有之。虾房蟹舍，或采菱，或捕鱼，小舟荡漾，来往浓阴之下，柳堤花坞，尽在春光骀荡



房山文史资料

之中，水乡人家，桔槔声起，牛背笛声，两两归来，此耕田凿井余风也，在江南则有之。能画者品四时之景物，分南北之风俗，明乎物理，察乎人事。禽鸟之类，如黄鹂白鹭，晚鸦征鸿，随时点缀，生意盎然。聊举规模，会心不远，有才思者，得此参悟，可用标山水之胜概云尔。

了解唐岱对“山村”和“寺庙”的构图要求，有助于读懂唐岱所画《大房选胜图》的创作内涵和美学观点。但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看到唐岱为“巢可托尚书”，或者称为“房山老人”所画的那个长卷，使她们像姐妹花一样重逢于今天的房山盛世。关于《大房选胜图》所画每处景点，容当另文考辨。



爱国华侨——黄锦茂

武冀平*

崂山遇险记

1956年盛夏，我还在师范（首都师范）上学，怀着对大海的情景，跟亲友们借了路费，与同班同学李道鹏去了他家乡青岛。道鹏的家坐落在贫穷的东镇。每天清晨，道鹏的母亲便在灶上蒸一屉大馒头，而锅里则是一锅稀粥。吃罢早饭，每人揣上一个馍，就去海沿泡海澡；傍晚返家后，住在家里狭窄的阁楼上。两点一线的生活，天天乐此不疲，兴致高得很。

一天，我们走在街上，忽然遇见师兄黄锦茂。他已然在北京工作了。那次他是随北京教师旅游团到青岛旅游的。随团我还遇见了熟悉的师姐武文秀。在他们盛情邀请下，我身无分文，第二天欣然与他们一起去崂山潮音瀑一游。由于头天下了一场雨，崂山发了山洪，河水涨得漫过石头桥面，所以旅游车过桥时，

* 武冀平：儿童文学作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1958年至1962年曾经在房山区史家营乡曹家坊中学任教，和黄锦茂是北京师范学校同学。



游人需要下车携手蹚水过桥。旅游车呢？空车过桥后游人再上车前行。崂山一带石桥，当时没有石栏，蹚水过桥，河水看似只深及小腿，且水质清澈，但水的冲击力很大。过桥时抬不起腿，只能双脚踏着桥面前行。有些家住附近的志愿服务的老乡，在桥边护卫着过桥人，倒也觉得安全。

可是，在过另一座石桥时，大家依然手拉着手，谁承想，黄锦茂不慎一脚踩空，失足跌入桥下，而武文秀和我险些被一同拽带河里，衣服鞋袜都被冲走了，不知去向。这时候，人们大呼小叫，忙着抢救黄锦茂。后来，师大女附中的一位体育教师，一下子摸到了黄的双手，使劲往上拽。在这千钧一发时刻，体育教师身后，又有几个人像拔萝卜一样，给予助力，这才把面如紫色的黄锦茂拉上桥面，不由人们出了一身冷汗。黄说，再拖几秒钟，他就没了一点力气，任桥洞将他吸进去。如果，人被吸进桥洞，那就死定了。可是，他却死里逃生，真是福大造化大呀！

时光逝去了六十二年，每想起此事，恍如昨日。在老北师建校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各年级同学参加聚会时，黄锦茂激动地对我说：“生死之交，生死之交呀！”我说：“师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人生，这样的事情不能有第二次，但在黄锦茂却实实在在又发生了一次，说明他的劫难还未结束。



第四代侨子

黄锦茂父亲的爷爷于一百多年前，从广东蕉岭县漂洋过海到南洋群岛谋生。母亲是当地华侨，生下了兄弟姐妹 10 个孩子，黄锦茂是最小，属第四代华侨。

黄锦茂出生于家境富裕的商人家庭，父亲在砂拉越（现马来西亚）古晋市西连镇拥有房地产、橡胶园、胡椒园等，是当地的侨长，享有很高的威望。小时候，他就在父亲创办的学校念书。当然，所受教育是陈旧的，灌输的是好好念书，长大发家致富，光宗耀祖之类的观念。殖民地色彩很浓，心里不知道“祖国”是什么。1949 年，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喜讯像春风吹遍了南洋群岛，唤醒了华人社会。这时黄锦茂已是初中生，受学校进步教师的影响，经常看诸如“中华公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等进步报刊户籍，思想起了变化。觉醒觉悟了，就勇敢地走向社会，积极参加当地庆祝新中国成立的爱国运动。一次，在一所小学聚会，黄锦茂勇敢地升起五星红旗，一方面博得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一方面用实际行动表达了他对新中国的热爱。在他的脑海里，已经逐渐有了祖国——中国的概念，并向往新中国。

1950 年，黄锦茂父亲去世，他产生了回国的想法，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认识到，旧中国由于自身腐败无能，



任帝国主义列强宰割，被人侮辱为东亚病夫；而华侨在国外，也沦为海外孤儿、二等公民。新中国的成立表明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并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想，国家要富强、作为爱国华侨，就应该回“家”报效祖国。他想起了李白的一首诗，不由轻轻吟诵来：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故乡——祖国”她是什么样？她将怎样接待自己这个海外游子？自己将在“故乡——祖国”的旗帜下怎样涂上重重的一笔红色。

穿越热带丛林

在当地地下革命组织帮助下，黄锦茂加入了组织，并分配给她一个任务是，组织中学生罢课运动，反对殖民教育，反对从香港派来的国民党校长所实施的反动教育。

1951年10月，黄锦茂等罢课领导小组，组织的罢课运动坚持了3个多月，结果，反动校长被革职，对当地社会影响很大。

1952年初，为躲避一次军警人员的抓捕，他和10几个同学，没来得及告别家人，就匆忙逃离了家乡，徒步穿越热带丛林泥泞小路，向印度尼西亚边境逃亡。在丛林中，渴了喝生水，饿了吃椰果，大家互相帮助，克服了黑夜的恐惧，总算躲过了军警的追捕。走了一个多星期，才到达边境。在印尼进步华侨的



保护下，他们被安顿下来。黄锦茂为了生存，在印尼坤甸中华中学谋了教书的职业，不幸又遭到了围捕。他乘敌人不注意，从高脚屋窗户跳下逃走脱险。

1952年，黄锦茂在我驻印尼使领馆帮助下，买了船票、衣物、生活必需品，于1953年夏回到了祖国温暖的怀抱。从此，告别了南洋，告别了家人。

回到祖国 历经坎坷

回国后的黄锦茂，受到当时侨务政策“同等条件，优先录取”的照顾。1953年9月，在众多师范学校中，他选中了北京师范大学并被录取，当时吃住皆是公费。1954年，黄锦茂加入了团组织，还于当年第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55年，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被分配到京西山区斋堂沟三家店小学工作。1956年，先后在桑峪中心小学、东辛房小学当教导主任。

天有不测风云。1957年，他在反右运动中受到冲击，被打成“右派”，就是说，他一下子从天上掉进了深渊，成了历史反面人物。1958年，被遣送到房山县百花山河套沟李各庄、辛庄、西坟村等地进行劳动改造，干起了大炼钢铁、开山修路、筛石子的重体力劳动。同时，还要接受无休止无根据的批斗。批斗会上，他抱着正确对待群众的心态，接受批判。此时的黄锦茂，他相信总会有一天，党会搞清楚他的爱国之心。当年他



背叛了家庭，参加了革命，回国建设新中国，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他相信自己所选的道路是正确而光明的。

总之，他虽然身背沉重的政治包袱，却坚信美好的未来。他扛住了常人难以经受的苦和累，他笑对劳动和与人为善的众乡亲。有一次，他突然得了脑膜炎，乡亲们及时把他送进城里的友谊医院，他身体很快康复之后，又重返山里，任劳任怨，继续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参加政治运动。村老支书说：“你努力劳动，继续和群众打成一片，改造思想。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总有一天会还你清白的。”

在百花山河套沟劳动改造八年后，经国家华侨委员会有关领导地过问和关怀下，又由于 1969 年实行干部解放政策，恢复了黄锦茂的教学工作。领导分配他先后到没有电、交通不便的深山区南窖小学、北庵小学工作。他二话没说，高高兴兴地进了大山。1974 年，他调到磁家务中学教英语，后又调到房山师范学校教专业班英语。学英语的学生，大多来自百花山河套沟。他知道，这些学生经过几年后，要回到深山老区，去培养革命接班人，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他回忆说，我曾先后走过山区的三家店（地名）、桑峪、河北（地名）、李各庄、辛庄、三福村、南窖、北庵、河南（地名）、磁家务、大石河师范、房山城关等 14 个村镇。我在哪里经受了艰苦劳动的考验，度过了寂寞无亲人的苦恼，我初心不该，写了 7 次入党申请书，最后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又说，1983 年，全国教育工会，市总工会，文教工委、中央统战部、市委统战部领导，先后到



家看望慰问，使自己深感温暖、备受鼓舞。在房山县委书记李永芳的关怀下，终于实现了自己几十年要求入党的梦想。李书记称赞说：“黄锦茂是爱国华侨的一面旗帜。”

永远跟党走

1980年，黄锦茂当选为房山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领导找他谈话，表示组织上安排他担任副县长一职。

根据工作需要，黄锦茂最终担任了北京市侨办副主任。1998年，离开侨办，他被推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同时被委任为港澳台侨委会副主任，直到1988年退休。

黄锦茂在职期间，依然保持着原来的习惯，认真学习，努力掌握并宣传党和国家的侨务政策；深入侨界，为他们排忧解难得到了侨界的一致好评。

1998年，黄锦茂退而不休，在组织内，被党员推选为侨办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为不负众望，他热情关心和服务于老同志，受到老干部的一致称赞。他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依然关心侨界事物。还受邀兼任一些社团的顾问，副监事长、副秘书长、常务理事等职务，工作上量力而行，为社团建言献策，凝聚侨心。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2004年，黄锦茂被中组部授予“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2011年，被北京市委市



委组织部、市委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市老干部局评为“老有所为先锋，创先争优旗帜”先进个人。市侨办离退休党支部在他的领导下，先后被评为市级先进集体。

黄锦茂回顾在房山的百花山地区 28 年的工作生活的历史时，动情地说，在房山县党委和政府以及山区人民的教育帮助下，使自己在艰苦环境中得到了考验，加入了党组织，享有 35 年的党龄，48 年的工龄。担任党支部书记 27 年。自己回国 65 年，作为一名爱国华侨，我知恩、报恩。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感恩、奉献是无限的。

是的，黄锦茂这位爱国华侨、中共党员，有着永远跟党走坚定信念，他是爱国华侨的一面旗帜，我们写他赞他，是为了更好地学习他。侨办老主任初世敏说，你的故事我多次拜读，很受感觉，你的实际行动，是我学习的榜样。

泰国归侨联谊会长庄志说，你退休后一直热心侨务工作，为你点赞。

马来西亚侨联，归侨乔小蓓说，要学习黄锦茂爱党爱国的精神。88 岁的黄伯伯——超棒！

老北师大同学梅洁予说，黄锦茂也是我们北师的光荣，满满的正能量，为有你这样的老同学而骄傲！

蕉岭联谊会康秘书长说，你真是老黄牛，你的事迹和奉献精神永远影响着我们！